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劉祥光教授

呂祖謙的舉業教學

研究生：呂宜軒 撰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

## 呂祖謙的舉業教學

### 摘要

南宋（1127-1279）科舉產生了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這種教育又被稱為舉業，是考生們平日的訓練課程。從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開始，舉業的課程受到道學運動的影響，道學思想漸為主流大宗。道學思想與舉業課程之間相互作用，影響了由宋至清（1616-1909）的中國士人。在南宋，道學家自願負起改善社會的責任。他們想透過書院教育提升學生的德行，又想防止舉業對考生造成負面影響。然而很少有人注意，某些道學家曾經積極地利用舉業推廣道學並藉其實現理想。呂祖謙（1137-1181）是位帶有道學色彩的舉業教師，他提供了一套考試訓練課程。本文將分析呂氏設計的舉業教學，藉此瞭解 12 世紀中葉考生的訓練課程以及呂氏利用舉業課程為推廣道學所作的貢獻。

關鍵詞： 呂祖謙、道學教育、舉業、科舉。

## 目次

目次	I
圖次	III
<b>第一章 緒論</b>	<b>1</b>
一、 研究動機	1
(一) 宋廷的考試規定對舉業課程的影響	2
(二) 舉業教師對舉業課程的影響	3
二、 研究回顧	5
(一) 科舉與教育制度	5
(二) 道學的教育	8
(三) 學術傳統對課程的影響	10
(四) 博碩士學位論文	12
三、 研究材料	14
(一) 文章範本	14
(二) 考試用類書。	14
(三) 課堂口說講錄。	15
(四) 模擬考題與出題範圍整理用書。	15
四、 預期成果	16
<b>第二章 呂祖謙的教學生涯</b>	<b>17</b>
一、 宋代呂氏家族	17
二、 呂祖謙的科舉生涯	21
(一) 準備考試：紹興十六至三十二年（1146-1162）	21
(二) 考試高中：紹興三十二年至隆興元年（1162-1167）	25
(三) 宦游時期。乾道三年至淳熙六年（1167-1179）	27

(四) 舉業教學：乾道三年至淳熙八年 (1167-1181) .....	29
三、 教學成就 .....	33
(一) 學生數量 .....	33
(二) 學生的地域分佈 .....	36
(三) 學生中舉率 .....	37
四、 小結 .....	38
<b>第三章 減輕備考重擔：呂祖謙的舉業課程 .....</b>	<b>40</b>
一、 考題範圍的界定 .....	41
(一) 北宋前期，太宗至仁宗朝 (976-1064) .....	41
(二) 轉變期：熙寧至元豐至元祐。 .....	44
(三) 延續期：元祐更化 (1086-1094) 與紹聖之後 (1094-1125)。 .....	46
(四) 再興期：南宋初 (1127-1180) .....	49
二、 呂祖謙的備考方式 .....	51
(一) 博覽群書的習慣 .....	51
(二) 刪節 .....	55
(三) 分類 .....	57
三、 小結 .....	63
<b>第四章 為何而教？舉業教學的目的 .....</b>	<b>64</b>
一、 推廣學術 .....	64
二、 招徠同志 .....	69
三、 從考生到官員 .....	74
四、 從考生到考官 .....	77
五、 小結 .....	83
<b>第五章 餘論 .....</b>	<b>84</b>
<b>附表 .....</b>	<b>90</b>
〈表一〉 呂祖謙學生名單 .....	90

〈表二〉 呂祖謙學生的地域分佈.....	145
〈表三〉 南宋婺州歷年進士名單.....	147
〈表四〉 北宋初期（973-1063）殿試歷年考題.....	156
〈表五〉 南宋孝宗朝（1163-1189）省試考官名單.....	160
〈表六〉 南宋光宗朝（1190-1194）省試考官名單.....	163
〈表七〉 南宋寧宗朝（1195-1224）省試考官名單.....	164
〈表八〉 南宋道學家（朱陸張呂）弟子擔任考官次數表.....	167
徵引書目.....	168
一、 中日韓文徵引書目.....	168
(一) 史料.....	168
(二) 專書.....	177
(三) 期刊論文.....	182
(四) 博碩士論文.....	186
二、 西文徵引書目.....	187
(一) 專書.....	187
(二) 期刊論文.....	188

## 圖次

圖 1 〈讀史綱要〉組織圖.....	59
--------------------	----



## 第一章 緒論

### 一、研究動機

1910 年內藤湖南（1866-1934）指出，中國從唐代（618-907）中葉至宋代（960-1279），在政治、經濟、學術、藝術諸多方面皆出現了明顯的變革，並從中世邁向近世。<sup>1</sup>其中，科舉文化的勃興是相當令人注目的歷史變化。因此諸多學者便從制度、社會、教育或是文學等角度著手進行科舉研究，而成果頗盛。甚至有學者對這些研究成果綜稱為「科舉學」。

<sup>2</sup>

科舉的確是宋代許多士人生活中的重要活動。科舉考試初設於隋煬帝大業元年（605）<sup>3</sup>，但要到宋代才成為士人們晉身的重要管道。11 世紀初參加科舉的宋代考生大約 2 至 3 萬人，到了 13 世紀中葉便成長至 40 萬人之數。這個數據顯示，從北宋（960-1127）至南宋（1127-1279），

<sup>1</sup>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0-18。

<sup>2</sup> 科舉學的性質，及科舉學與諸學科研究的關係，見劉海峰，《科舉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13-16，23-27。從制度的角度進行科舉研究者，例如荒木敏一，《宋代科舉制度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9）。而科舉的社會功能研究，多著重於社會流動功能。例如賈志揚（John W. Chaffee），《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有關科舉的文學研究者，常針對考試制度對文風的影響。例如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有關科舉的教育研究，則多研究官學與書院之教育職能。例如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Linda A. Walton, *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sup>3</sup> 科舉可分廣狹兩義。廣義指分科舉人的考試制度；狹義專指設置於 605 年的進士科考試。劉海峰，〈科舉制的起源與進士科的起始〉，《歷史研究》6 (2000.12): 3-16。

有越來越多人為了官位而投身於競爭激烈的考試之中。<sup>4</sup>這些考生被宋人稱作舉子，他們平時所進行的考試訓練則被稱為「舉業」，有時又被稱為「進士業」。<sup>5</sup>

舉業相當重要，因為它可能會影響士人的思想。舉業是種以通過科舉考試為目標的教育訓練。政府依賴科舉選拔官員，考生則靠教育通過考試的窄門，兩相結合的產物就是以考試為導向的舉業。可是舉業的課程並非一成不變，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它的內容。當舉業課程改變時，考生吸收的思想也會隨之不同。吾人可將舉業課程比作一種知識的媒介，左右了聽眾的知識。當媒介傳播的訊息產生變化，聽眾所接受的知識亦隨之變動。因此，研究舉業課程將有助吾人理解某一時代士人思想的變化。

影響宋代舉業課程的因素中最重要者可能有二，一是政府的考試規定，二是舉業教師的教學。透過觀察這些因素，吾人應可了解考生的課程內容。

#### (一) 宋廷的考試規定對舉業課程的影響

宋初，朝廷並未規定考生需以一種「正確」的學說應答。景德四年（1007），宋廷的考試評分標準是「詞理」或「文理」。

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學識優長、詞理精絕為第一；才思該通、文理周率為第二；文理俱通為第三；文理中平為第四；文理疎淺為第五。<sup>6</sup>

所謂的「文理」，只是文章的條理，而不是指某種特定理論。五種等級的分別，也不是考生對某一學說的理解程度，而是運用文字的能力

<sup>4</sup> 賈志揚（John W. Chaffee），《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56。

<sup>5</sup> 袁采，〈子弟當習儒業〉，《袁氏世範》（《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卷 2，頁 22-23。

<sup>6</sup>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55〈選舉志一〉，頁 3610。

高低。這項規定意味著宋廷並未強行規定某種考生必讀的學說，只要求考生磨練優良的文字技巧。

南宋剛開始對考試亦採類似規定。在淳祐元年（1241）以前，宋廷無意推行特定學說為科場標準。高宗紹興六年（1136）曾宣示推行「大公之道」，拒絕偏袒任何正統學說。<sup>7</sup>

南宋的大公政策大約維持了 100 餘年，直到 13 世紀中期才結束。接著，宋廷開始宣揚特定學說作為課程標準。淳祐元年（1241）發佈了《道統十三贊》，認可了道學的正統地位，並給予朱熹（1130-1200）從祀孔廟的待遇。<sup>8</sup>景定二年（1261）另兩位道學家張栻（1134-1180）與呂祖謙（1137-1181）亦獲享同等待遇。<sup>9</sup>宋廷的新規定增加了課程中的道學思想比例，甚至讓道學思想漸有壟斷舉業課程之趨勢。而且，即使宋代滅亡，此趨勢依舊在元朝重開科舉之後持續增溫。<sup>10</sup>

## （二）舉業教師對舉業課程的影響

相對於政府的影響力，舉業教師對課程的影響可能較為有限。但在宋廷實行大公政策的期間（1136-1241），舉業教師顯然是塑造考生課程的重要角色。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曾指出 12 世紀中葉的舉業課程

<sup>7</sup> 「大公之道」是一位左司諫陳公輔（1077-1042）的建議。在奏章中，陳公輔批評朝廷由於偏袒王學或道學而使官員形成派系：「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黨同，而風俗壞矣……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他因此主張拋棄獨尊某派學說的政策，並得宋廷採納。余英時認為這項政策表面公正，用意實為攻擊道學人士。這種攻擊自然會影響當時考生們的課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京都：日本中文出版社，1983），卷 107，頁 464；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75-78。

<sup>8</sup> 同時從祀者尚有北宋的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他們是朱熹道統系譜中的傳道者。脫脫，《宋史》，卷 155〈理宗本紀二〉，卷 42，頁 3610。

<sup>9</sup> 脫脫，《宋史》，卷 105〈吉禮志八〉，頁 2553-2554。

<sup>10</sup> 有關元、明、清歷代的道學地位與考試標準，見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30-33.

以「永嘉諸儒」的言論為主流大宗；而道學言論則在 13 世紀 20 年代後的課程中漸佔優勢。南宋較具永嘉學術色彩的舉業教師有陳傅良（1137-1203）、葉適（1150-1223）；而擁護道學的教師則有陳淳（1159-1223）、真德秀（1178-1235）等。這些舉業教師的言論進入考生的課程，從而使道學及永嘉學術的思想流行於考生之間。<sup>11</sup>

但南宋還有其他知名的舉業教師。比如呂祖謙或朱熹的教師劉子翬（1101-1147）。他們設計的課程可能也有獨特的內容，會影響考生的思想，但尚未為吾人所知。本文選擇以呂祖謙的舉業教學為研究對象。呂祖謙是一位優秀的考生，對考試得心應手。他在隆興元年（1163）時連續通過了進士科以及博學宏詞科考試，表現相當出色，名聲隨之亦響。因此，他的舉業教學吸引大量遠來求教的考生，使他成為 12 世紀 70 年代最受歡迎的教師之一。他曾任職為嚴州州學教授、中央太學博士、書院講師以及省試與殿試的考官，又是 13 種以上的考試用書的編纂者，提供考生大量的學習輔助教材。<sup>12</sup>這些經歷使呂祖謙成為吾人研究 12 世紀中葉的舉業教學最好的對象之一。

本文研究目的如下。首先，本文希望藉由解析呂祖謙的舉業教學，釐清南宋士人的舉業內容。呂氏為南宋知名的舉業教師，他提供的課程提供了切合考生需求的考試訓練。因此，吾人可從呂氏的課程推測一般南宋士人日常接受的舉業課程內容。其次，本文在解析呂氏課程同時，更可釐清呂祖謙的教學目的。呂祖謙為一知名的道學家。為何一位以德行為教育著稱的道學家要長年從事舉業教學呢？他希望透過舉業教學的事業成就甚麼目標？希望從此可以釐清道學及其思想究竟如何發展與

---

<sup>11</sup> 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9-111, 229-270.

<sup>12</sup> 我將現存呂祖謙及其弟子所編寫或標注的考試用書依用途暫分 4 類，共 13 種。一、文章範本：《皇朝文鑑》、《古文關鍵》、《左氏博議》、《東萊標注三蘇文集》、《東萊集註觀瀾文集》。二、供考生查找資料的類書：《左傳類編》、《歷代制度詳說》、《詩律武庫》。三、課堂講錄：《麗澤論說集錄》、《左氏傳說》、《左氏續傳說》。四、考題與出題範圍整理類書：35 題〈策問〉、《兩漢精華》、《十七史詳節》。研究材料一節會進一步介紹。

散播。

## 二、研究回顧

過去研究呂祖謙及舉業的相關著作可分為三類：科舉與教育制度，道學的教育，以及學術傳統對課程的影響。以下研究回顧將略述各類重要研究的成果，最後再介紹相關博碩士論文的研究概況。

### (一) 科舉與教育制度

1994年，李弘祺的《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一書分析官學教育對社會的影響。科舉與學校系統是宋代政府甄選官員的重要方式。官學在慶曆變法之後，慢慢變成北宋士人最重要的晉身管道。官學無論從中央的高等教育機構，到地方的州縣學，都以訓練後備官員為務。但北宋的課程內容總是備受爭議。因為考試制度依然是選士的最終標準，但考試無法衡量考生的德行。這便使官學教育的目的在德行與科舉藝業之間搖擺，而最終變成以考試為導向。最後，科舉制度為官學教育所帶來的弊病以及北宋一連串的改革失敗，促使南宋的道學人士思考如何對教育大業進行革弊。道學式的書院教育於焉出現。此書為一制度史研究，主要篇幅皆著重在描繪中央與地方官學的職官、考試、學生津貼種種制度沿革。

<sup>13</sup>

1996年，甯慧如的《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以考試制度為研究對象。作者將北宋考試規定分期為三。第一期自建隆元年（960）至治平三年（1066），又稱沿襲舊制期。此期北宋發生文風轉向，士人開始流行古文。考試項目重心亦從詩賦轉向策論。第二期自治平四年（1067）至元豐七年（1084），又稱幡然改制期。此期主張經義考試的士人呼聲

---

<sup>13</sup>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頁19-30，117-152。

越來越高。王安石（1021-1089）更以《三經新義》為標準教材，統一了士人課程標準。第三期則從元豐八年（1085）至靖康二年（1127），即黨爭拽引期。此期考試規定、項目、考題以及答案，都受黨爭影響，故使北宋考生的課程變動不定。<sup>14</sup>

1997年，梁庚堯的〈南宋教學行業興盛的背景〉指出南宋教學行業的興盛與科舉考試和印刷術有密切關係。南宋士人對科舉相當熱中，因為考試能帶來權力與財富。南宋的士人數量成長，則促使師資的需求增加。而且宋代印刷術發達，書籍漸趨便宜，促使教材普及。這些因素都有利於教學事業發展，使教學工作人口增加。<sup>15</sup>

1999年，萬安玲（Linda Walton）的《南宋書院與社會》（*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研究道學的興起與書院教育制度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道學群體的成員們曾利用書院傳播教條，並把書院當成是他們智識活動的中心。作者又將道學視為是一種改變士人思想的力量，可使士人的思考方式以及行為都產生改變。書院則是道學思想在地方上的主要傳播空間。萬安玲細緻地介紹了數家道學式的書院，像張栻、呂祖謙、朱熹等人的岳麓書院、麗澤書院、白鹿洞書院。不過，書院如何改變士人自我身份才是她的研究重點。例如，書院提供了道學家的課程、使學員進行祭祀道學前輩的儀式，並且教導相同的行為規範。這些課程都使學生自覺與其他士人不同，並視自己為書院群體的一員。

<sup>16</sup>

同年，梁庚堯的〈宋代的義學〉則討論另一種具有理想性質的教育機構——「義學」。義學類似慈善教育機構，容許士人免費入學。義學常由積富之家或有志之士建立而成。在北宋的義學之中，最有名者是蘇州范氏家族所建立的義學。范氏義學以田產支持義學開銷的經營方式讓學校事業得以長期穩定。在范氏義學之後，許多義學紛紛仿效其經營手

<sup>14</sup> 甯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頁 85-164。

<sup>15</sup> 梁庚堯，〈南宋教學行業興盛的背景〉，收入田慶餘等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 559-570。

<sup>16</sup> Walton, *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1-21.

法。值得注意的是，義學多與舉業關係密切，顯然義學的部分目標是為了幫助學生及第，而不光是為了推動教化。作者指出，這是因為舉業屬於許多家族的理想事業，這個理想成了建立義學的動力。另外，義學教育內容隨時間不同亦有變化。北宋義學的教育內容多以舉業為主，直到南宋，理學課程才慢慢增多而與舉業的份量相當。但無論從哪一個時間點觀察，舉業都是宋代義學的重要部份。作者同時凸顯了義學的理想與現實意義。<sup>17</sup>

2003年，梁庚堯將研究焦點從義學轉向書院，在〈宋元書院與科舉〉一文中檢視了書院教育和科舉的關係。作者指出，宋代的書院與科舉有密切關係，培養科第人才是書院的功能之一。即使是理學家，亦無法避免在書院中教授舉業，有時甚至須以舉業為重心。這種情形使朱熹希望能藉由官方資助的書院推動教育革新。他的理想是讓學生瞭解舉業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價值。但在理學逐漸蓬勃的情況下，書院依然追求舉業表現。南宋末年官設書院的教學內容大多包括舉業，而且常以考試評量學生成績。當理學成為考試標準之後，學生更有理由學習舉業，宋代書院與科舉教育的關係因此越來越深。作者勾勒出宋代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面貌。在以登科為士人無上光榮的價值觀影響之下，教育課程無法避免教授舉業。舉業故可說是宋代教育不可忽略的一部份。<sup>18</sup>

2004年，陳雯怡的《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則分析南宋的「書院復興運動」。作者認為，書院是一種新的教育模式，似與官學為代表的科舉教育相抗衡。南宋理學家希望藉書院這個場所和官方的資源實現教育理想，並反對以科舉為導向的教育。朱熹等人將其理念制度化為教材以及學規，希望藉此引導學生瞭解修身的價值。但理學家的書院僅為書院中的特殊類型，代表理想的書院形象。實際上南宋書院並未拒斥科舉制度。南宋士人在現實考量下需要考試訓練，這使書院教育必然具有義理講學與舉業教學兩種任務。理學家因此

<sup>17</sup> 梁庚堯，〈宋代的義學〉，《臺大歷史學報》24 (1999.12): 177-213。

<sup>18</sup> 梁庚堯，〈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33輯（臺北，蘭臺出版社，2003），頁49-124。

只能要求考生應舉的心態必須健康，而非要求他們放棄考試。作者對書院實際面貌的觀察相當敏銳。她不以朱熹建立的書院代表所有書院，因此能發掘科舉與書院的密切關係以及書院的多種面貌。<sup>19</sup>

2005年，李兵的《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則專門研究書院中的科舉教育。他認為書院與科舉教育的關係歷來有兩種說法。一、書院反對科舉，二、書院無反對科舉的必要。李兵則認為書院雖是道學家推廣學問的主要基地，但在南宋中晚期後性質卻產生轉變。道學成為官方正統學說之後，變成舉業課程的主要內容。因此書院的功能就從培養學生的德業，變成訓練學生的舉業。他又認為道學家並非完全否定科舉。他以朱熹為例，指出朱熹其實視考試為必要之惡，故提倡德行教育補救之。在朱熹眼中舉業應以德業為基礎。因此，書院教育並無積極反對科舉的企圖。而且，如果宏觀地調查各家書院的教育內容，更會發現書院課程中的科舉取向並非少數。<sup>20</sup>

上述諸研究對宋代的官學、書院、義學教育與政府規定有詳實的研究成果，而多以「制度」為研究重心。制度對士人課程影響甚鉅，絕不能忽略。但上述研究無法細部檢視某些特殊的教育家或是學術傳統對士人課程的影響。南宋最有名的教育家應為朱熹。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對宋代以後的士人教育有長遠的影響。以下略舉數項有關道學教育的研究成果。

## (二) 道學的教育

1989年，由狄百瑞(Wiliam Theodore de Bary)及賈志揚(John Wiliam Chaffee)所合編的《理學教育：成形階段》(*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收集了數十篇有關理學家教育的研究論文。例如，杜

---

<sup>19</sup>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頁 27-56，197-269。

<sup>20</sup> 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頁 106-136。

維明的〈宋代儒學的教育觀：背景知識〉(The Sung Confucian Idea of Education: A Background Understanding)一文，認為理學家的教育目標是想傳遞文化，並重建理想社會。此社會所有的成員都能自發地遵守道德規則，而不需外在強制規範。狄百瑞則以〈朱熹作為教育家的理想〉(Chu Hsi's Aim as An Educator)一文分析朱熹的教育課程。他指出朱熹試著推行成德教育，並設計出激勵士人修身的新課程。但至元明時代朱熹的課程卻被改造以符合科舉要求，最終變成了科舉教育的一部份。賈志揚在〈在南康的朱熹：道學與政治教育〉(Chu Hsi in Nan-K'ang: Tao-Hsüeh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一文中指出，淳熙7年(1180)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的舉動，似有補救官學教育缺失的意味。朱熹認為官學教育多以考試為導向，故想另闢一處可容納理學課程的教育場所。此論文集探討新儒家教育多以朱熹為案例。<sup>21</sup>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的《朱熹的思維世界》(*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則是研究道學的重要著作。作者將南宋道學的發展階段分為四期。一、建炎元年至紹興三十二年(1127-1162)，代表人物是張九成(1092-1159)與胡宏(1105-1161)。二、隆興元年至淳熙八年(1163-1181)，代表為張栻、呂祖謙、朱熹。三、淳熙九年至嘉泰二年(1182-1202)，代表為朱熹、陳亮、陸九淵(1139-1193)。四、嘉泰二年至宋亡(1202-1279)，代表為朱熹門人。作者認為，在第二期的道學群體中朱熹尚未取得完全的領導地位。情況正好相反，朱熹的影響力可能低於張栻與呂祖謙。直到張栻與呂祖謙謝世，朱熹才成為「道學群體」中最具權威的人物。田浩對呂祖謙評價頗高，甚至以為呂氏若能續命，南宋的學術文化將因此改變。這些看法使吾人好奇呂祖謙的教學工作是否提升了呂氏的地位，以致成為領導人物。<sup>22</sup>

<sup>21</sup> Tu Wei-ming, "The Sung Confucian Idea of Education: A Background Understanding," Wm. Theodore De Bary, "Chu Hsi's Aim as an Educator," John W. Chaffee, "Chu Hsi in Nan-K'ang: Tao-Hsüeh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eds., John W. Chaffee and Wm. Theodore de B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39-150, 209-216, 414-431.

<sup>22</sup>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一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133-205。

2008年，包弼德的《歷史中的新儒家》(*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則綜合了教育、政治、學術、社會種種視野，觀察新儒學的歷史變化。作者指出宋代的新儒家視己為社會中的特殊份子，他們的教育亦不同於社會普遍風行的舉業課程。新儒家的觀點與社會主流之間往往呈現對立的局勢。對新儒家而言，社會大眾應該實踐新儒家提倡的「自發主義 (Voluntarism)」——意指行事的動機是出於道德，而非出於利益。新儒家因此主張教育應該擺脫以考試為導向的歪風，並以培養學生自發精神的實學代之。另外，作者的研究亦發現，呂祖謙同時提供學生舉業訓練以及新儒家的課程。因此可說呂氏的教學跨越了新儒家教育與科舉教育的界線。<sup>23</sup>

上述文章多針對特殊的團體與教育家。如《新儒家的教育：成形階段》所收諸文多以朱熹為研究對象；《朱熹的思維世界》則研究道學群體。這些研究增進了吾人對南宋教育界人物的認識。但士人課程如何受到影響仍尚未明悉，故以下舉出關於學術傳統影響課程的研究著作。

### (三) 學術傳統對課程的影響

2000年，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的鉅著《帝制中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以宏觀的角度觀察宋末至清代的科舉文化。此書曾討論道學成為士人課程主流的複雜問題。艾爾曼提出，地方與政府中央之間的互動會促使課程產生改變。中央試圖透過科舉控制士人的思想，但士人卻同樣能透過科舉而影響課程。課程故可比喻為政府與士人互相爭奪的戰場。從 13 世紀開始，受到士人擁護的道學思想就節節勝利，成為官方認可的課程內容，並且影響了後代所有參與科舉的考生們。然而 13 世紀末的道學實未完全壟斷課程內容。直到明初，道學才成為所有考生必讀的課程內

---

<sup>23</sup> Peter K. Bol,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4-226.

容。然清代又出現變化。以考據學為主的「漢學」在帝制中國的末期，成為了道學在課程中的競爭對手。艾爾曼研究中國士人的課程變化成果極為可觀，大量的數據也是本文不可或缺的輔助資料。但是此研究宏觀的視野難免使人忽略一些細部問題，例如 13 世紀之前道學在舉業課程中的地位便難以窺知。<sup>24</sup>

2003 年，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對許多研究者而言皆為重要的參考著作。作者致力將道學人物置入歷史脈絡之中，而非停留於哲學研究。作者使用了一個極富政治意涵的「道學朋黨」觀念，將張栻、朱熹及呂祖謙等人看作 12 世紀中期的一股政治勢力。接著，他又通過考察道學朋黨爭奪權力的過程，證明道學家們皆具抱持著「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然而除了考察政治鬥爭，作者更別具慧眼地指出，道學家爭取權力的方式與科舉考試有密切關連。

淳熙以後「道學」轉盛，實與科舉有極大的關係。個別理學家雖偶發「舉業妨道」的感嘆，但理學士大夫作為一個群體而言，卻隨時都在爭取考試的大權……總之無論是十六世紀中葉以後陽明學壓倒程、朱官學，或十二世紀下半葉二程「道學」取代王氏「新學」，科舉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推波助瀾之力。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必須另有專論處理。<sup>25</sup>

此書的確未曾深入此一重要問題。然而他卻提示了道學學說藉由科舉考試的助力而流行的可能性，以及深入探究此問題的價值。

2007 年，魏希德（Hilde De Weerd）的研究《課程競爭：宋代科舉考試標準的協商（1127-1279）》（*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將科舉教育研究上溯至 12 世紀中期。作者與艾爾曼的想法相似，認為 12 至 13 世紀的科舉教育的課程內容可視為是一場競爭。但魏氏注意到宋代科舉教育的變化並非僅為道學的上昇過程，更是道學與其他科舉傳

<sup>24</sup>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5-29.

<sup>25</sup>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頁 77-79。

統的同化過程。魏氏因此研究兩種科舉教育圈中的學術傳統——道學與永嘉，觀察兩者從 12 世紀至 13 世紀之間的競爭與交融。她指出道學的標準化過程中，科舉圈中其他的學術傳統可能比政府更能發揮影響課程內容的力量。在淳祐元年（1241）以後，考試用書內容中的道學色彩顯著增加，卻又同時與其他科舉教育傳統同時並存。<sup>26</sup>

#### （四）博碩士學位論文

在學位論文方面，近 25 年來呂祖謙相關研究似乎呈現某種趨勢。過去的研究僅針對呂祖謙的思想進行研究，但近年慢慢開始關注呂氏的社會實踐，例如其政治生涯與教育工作等等。

1973 年胡昌智的《呂祖謙與其史學》、1985 年馬秀嫻的《呂祖謙之理學研究》以及 1978 年吳春山的《呂祖謙研究》三本著作，可說是博碩論中呂祖謙研究的先驅。其中《呂祖謙研究》的篇幅更是蔚為宏作。三者都以分析呂祖謙的內在思想為研究途徑。胡昌智介紹呂祖謙之史識、史論；馬秀嫻發揮呂氏之心、性、理等哲學觀念；而吳春山則全面地分析呂氏大部分著作的特色。他們的研究方式都傾向將呂祖謙從歷史脈絡中抽離開來。這樣的研究方式使思想更容易被聚焦。

2001 年，許愛蓮的《呂祖謙及其《東萊博議》》，視《東萊博議》為文學名著，並分析了此書中的哲學思想與修辭技巧。內容可謂精到。但作者並未將《東萊博議》視為一舉業用書，還原呂祖謙提供考試訓練的脈絡。2002 年，林文騰的《呂祖謙《皇朝文鑑》研究》，則針對呂祖謙編纂的另一本舉業用書《皇朝文鑑》進行研究。作者意欲釐清編纂《文鑑》時使用的義例、分類法、及文獻來源。這兩本著作都以單種史料為研究對象。如此研究容易掌握史料的特性，但無法同時顧及歷史脈絡。

2003 年，許修嘉的《陳亮與呂祖謙學術思想異同》，針對同處婺州

<sup>26</sup>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1-11, 322-365.

的陳亮與呂祖謙進行哲學式比較，欲突顯兩人思想異同。2004，官志隆的〈呂祖謙麗澤書院講學研究〉，分析了各種構成呂祖謙講學行動的要素，像是交遊的學友、教學的教材等。這兩本著作則將呂祖謙和南宋其他思想家放入相同的研究視野，開始考慮外在歷史因素對呂氏思想所造成的影響。

2005年，許佩珊的《呂祖謙教育理論與實踐》，主在析論呂祖謙的教育理念與方式。作者注意到呂祖謙的教育之中包含了舉業訓練。她認為呂祖謙進行舉業教學其實是富有教化學生德行之用心，但並未對舉業教學的政治意義深入研究。同年，甯慧如的《南宋儒者的入仕與教學——特別關注道學家的雙重實踐》，將道學家的兩種社會實踐，教育實踐與政治實踐當成研究重點。她認為呂祖謙的政治實踐目標是在「引人君以行道」<sup>27</sup>。但作者並沒有注意呂祖謙似乎曾利用舉業教學以達成諫君的政治目的。合觀許、甯兩位前輩的研究成果，他們的看法其實是一體兩面。本文試圖將呂祖謙的舉業教學視為諫君計畫的一環，以此補充許、甯二位研究之小缺。

2008年，陳佑昌的《呂祖謙〈左傳〉人物評論研究》是呂祖謙相關研究中最新的學位論文。他分析呂祖謙三本教科書《東萊博議》、《左氏傳說》與《左氏傳續說》的人物描寫技巧。他將這些技巧視為是呂氏的個人特色，但並未進一步探究這些技巧可能是一種考試寫作技術。同時，他也沒有評估這些教科書中的觀念，對考生有何種影響。儘管如此，他對呂氏文學技巧的分析，使本文在研究呂氏舉業寫作技巧的部分獲益良多。

由上述研究概況可知，近年對呂祖謙的研究似乎不再滿足於思想的分析探微，而開始要求瞭解呂氏的歷史境況。諸如呂氏的政治生涯如何？教學課程如何？此皆有賴本文深入分析。

---

<sup>27</sup> 甯慧如，《南宋儒者的入仕與教學——特別關注道學家的重實踐》（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頁143。

### 三、研究材料

本文主要史料即為呂祖謙的舉業用書，依其功能可分為以下四類。

#### (一) 文章範本

文章範本讓考生能學習名家寫作技巧，是最基本的舉業用書。呂祖謙此類編著以《左氏博議》一書最有名。《左氏博議》旨在幫助考生克服「論」考。論是南宋科舉必考項目之一，所有進士科考生皆須練習寫論。《左氏博議》替考生挑出了 168 道論題，並附上呂祖謙寫的解答範文。考生靠此書可以模仿名家寫作技巧、學習論文程式並且熟練所有春秋論題的解法。另外，呂祖謙編的《古文關鍵》、《東萊標注三蘇文集》以及《東萊集註觀瀾文集》都和《左氏博議》性質相似。《古文關鍵》收入「古文八大家」的文章。《三蘇文集》收入蘇洵（1009-1066）、蘇軾（1036-1101）、蘇轍（1039-1112）三人文章。《觀瀾文集》則收入呂祖謙的舉業老師林之奇（1112-1176）的文章。考生可透過這三本文集學習寫作技巧，就像使用《左氏博議》一樣，。

#### (二) 考試用類書。

對一個南宋考生而言，「典故」是棘手的寫作難關。考試寫作一定會運用典故，舉凡人、事、地、物、國家典章制度都在運用範圍之內。但是一般史書多依本紀、列傳、志、表等類別編排，考生難以快速知悉典故知識。考試用類書的功能即為整理歷史典故，改變史事分類方式以利考生查詢。呂祖謙的《歷代制度詳說》將歷代制度分為科目、學校、賦役、漕運、兵制等項目。考生若需瞭解特定的制度掌故，只需依類查詢，相當方便。呂祖謙另一本類書《左傳類編》與《歷代制度詳說》的功能相似，將史事分類為風俗、氏族、財用與官制等項目。但《左傳類

編》的內容僅止於春秋（前 770-前 476）史事，適合考生應付春秋考題。

### （三）課堂口說講錄。

一般而言，教師大多透過口說親自指點學生訣竅。但口頭紀錄難以保存，如《朱子語類》一般大量記載教師口語的著作實在不多。今日尚存呂祖謙的演說紀錄《麗澤論說集錄》、《左氏傳說》、《左氏續傳說》三冊，相當幸運。《麗澤論說集錄》收集了呂祖謙的《詩經》、《易》、《禮記》等經義課程紀錄，也有一些告誡學生做人處事道理的雜說。而《左氏傳說》與《左氏續傳說》主要解說《左傳》，可視為呂祖謙春秋政治史的課堂紀錄。

### （四）模擬考題與出題範圍整理用書。

熟悉考題對考生而言相當重要。考官會考甚麼範圍？又會考甚麼類型的題目？這些問題常是決科關鍵。因此呂祖謙編有出題範圍整理用書，並設計模擬考題供學生使用。呂祖謙的《十七史詳節》刪去十七史中無足輕重的文字，讓學生能在考前快速複習必備的歷史知識以應付考試。另外，南宋考試題目多出自漢、唐史事<sup>28</sup>，故呂祖謙編有《兩漢精華》，整理漢代史事，存其精華，讓考生立刻抓住考試重點，避開煩冗的歷史檢索工夫。最後，呂祖謙尚設計了 35 道「策問」。策與論相同，都是南宋士人必考項目。策問即為策的題目。呂祖謙的策問讓考生模擬策考。這些教材讓考生能快速汲取解題的相關知識，並且熟練考題解法。

<sup>28</sup> 淳熙十一年（1184），「太常博士倪思（1147-1220）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恥談之……。』」而魏希德則發現南宋一本時文範本《論學繩尺》的 155 篇論題中有 59 題出自漢代史，比例高達三分之一。這顯示南宋考試出題範圍常常落在漢、唐史。脫脫，《宋史》，卷 156〈選舉志二〉，頁 3633；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420.

#### 四、預期成果

除第一章緒論及最後的餘論外，正文部分共分三章。第二章介紹呂祖謙的教學生涯。呂祖謙來自北宋著名的官僚家族，但家族的頹勢使呂氏致力於訓練舉業以求取得官位。在備考期間，他所求教的老師不是曾在科場取得優異的考試成績就是著名的舉業教師，這使呂氏的考試技巧高人一等。在考試高中之後，呂祖謙投身於舉業教學。憑藉著名聲與技巧，呂氏在乾道六年至淳熙七年（1170-1180）之間，招收了大量學生。這些學生的考試成績極為優秀，他們的中舉率和入仕率都比其他學者的門人更高一籌。

第三章主要考察呂祖謙如何幫助學生備考。在南宋，考生面對的最大難題即為不斷增長的考題範圍。一位士人如果要在科舉考試中獲取優秀成績，就必須先能識題。然而，在面對經史子集諸多閱讀材料時，考生很難在考前閱畢所有內容。呂祖謙主要透過三種方式提升考生的識題率：培養博覽群書的習慣、刪節閱讀資料以及分類整理備考資訊。這些方式使呂祖謙的學生在考前得以減輕負擔，同時也讓吾人瞭解南宋的一般士人究竟如何準備考試。

第四章則深入考察一個基本的問題：為甚麼呂祖謙作為一位道學家，要從事舉業教學呢？的確，道學家的教學向來以德行教育聞名。其中許多著名的學者如朱熹、張栻更對考試訓練嗤之以鼻。但呂祖謙卻長年從事教授舉業，這種行動實在耐人尋味。本章將指出，呂祖謙的舉業教學實有四種目的：教學維生、推廣學術、吸收同志以及培養官員。最後，透過考察南宋末年孝、光、寧三朝的省試考官名單更可發現，呂祖謙利用舉業教學培養出的官員，較其他道學家門人擔任考官的次數更多。這也顯示呂祖謙的舉業教學的確提高了道學成員通過科場的機會，並促使道學思想得以散播。

## 第二章 呂祖謙的教學生涯

科舉制度擴大宋代（960-1279）教學市場，舉業教師因市場需求而誕生。他們散佈在鄉里之間，或為家教，或為塾師，教導學生各種考試技巧，並分享自身的考場經驗。在歷史中，這些教師多半默默無名，相關事蹟殘缺不全。今日的研究者因此對這些教師的教學活動缺乏瞭解。在眾多舉業教師中，呂祖謙是少數的例外。呂氏不僅在思想史占有一席之地，更因其舉業教學而富有盛名。他是如何成為一位舉業教師呢？以下將自呂氏的家族背景談起，檢視其從事舉業的動機，再介紹其生涯及其教學成就。

### 一、宋代呂氏家族

呂祖謙出身自歷史久遠的官僚家族，從後唐（923-936）至南宋（1127-1179），呂氏家族累世為官已有十代。北宋時（960-1126），呂氏家族官運騰達，連續培養出三位宰輔。呂蒙正（946-1011）是太平興國二年（977）的狀元，曾任太宗（976-997 在位）、真宗（998-1022 在位）兩朝宰相。《宋史》認為呂蒙正的待遇和開國名臣趙普（922-992）全無二致。<sup>1</sup>

呂蒙正的姪子呂夷簡（979-1044）則是北宋前期在位時間最長的宰相，共十年七個月。呂夷簡在仁宗慶曆時期（1041-1049）負責處理宋對遼與西夏的外交關係，且一度同時掌有相權與軍權。<sup>2</sup>呂公著（1018-1089）是呂夷簡的兒子，居相三年；另一子呂公弼（1007-1073）曾掌軍權，任

<sup>1</sup>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265，〈列傳第二十四·呂蒙正〉，頁 9145-9148。

<sup>2</sup> 脫脫，《宋史》，卷 311，〈列傳第七十·呂夷簡〉，頁 10206-10210。王德毅，〈呂夷簡與范仲淹〉，收入王德毅，《宋史研究論集：第二輯》（臺北：鼎文出版社，1972），頁 122-124。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頁 66-67。

樞密使。<sup>3</sup>呂氏家族在北宋的官位顯赫，在朝廷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呂氏家族也積極利用婚姻維持家勢。呂氏家族喜歡與政治上有發展潛力前途的士人締結婚姻關係。據統計，北宋與呂氏成員締結婚姻的 72 名對象中，半數擁有功名。此外，呂氏家族也密集與北宋名族如王氏、魯氏、張氏、程氏、韓氏等通婚。此類家族大多累世為官，其成員不是曾位至宰執，就是身為王族，所以高度參與政治。這些政治名族之間透過婚姻構成了複雜的關係網絡，而呂氏家族便依賴此網絡在朝中援引姻黨、讓政策獲得支持、甚至能影響人事、控制台諫。從太宗至元祐年間（1086-1094）大約 100 年的時間，呂氏家族一直在朝廷中屹立不搖，家勢相當鞏固。<sup>4</sup>

相對於北宋，呂氏家族在南宋朝廷中的地位卻開始下滑。呂好問（1064-1131）是呂祖謙的曾叔祖，他是導致家族地位下滑的關鍵人物。金人入侵後擄走徽欽二宗與大批官員，並擁立張邦昌（1081-1127）為楚帝。呂好問曾短暫地為張邦昌效力。最後，呂好問雖促成張邦昌歸化南宋，但對宋室而言，張邦昌已經僭越皇權，而某些官員則連帶質疑起呂好問對宋室的忠誠度。<sup>5</sup>建炎元年（1127）呂好問不得不避嫌請辭，但官員們並未停止攻擊他的節操，這也阻礙了呂氏家族其他成員的政治發展。往後十年，呂家成員的宦途大受影響：「晚進後出，不知前輩本末，或以病公（呂好問）。……紹興八年（1138），公長子舍人以臺劾罷，語猶及公。」<sup>6</sup>呂好問似乎成了呂氏家族的政治包袱。<sup>7</sup>

<sup>3</sup> 孔東，〈宋代東萊呂氏之族望〉，《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8(1976):139-144。

<sup>4</sup> 王德章，〈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以河南呂氏家族為例〉，《新史學》4.3(1993):26-45。

<sup>5</sup> 當時李綱（1083-1140）主張將張邦昌依亂臣賊子處分，並對參加楚政權者加以定罪。呂好問由此亦身列名單之中。脫脫，《宋史》，卷 265，〈列傳第一百二十一·呂好問〉，頁 11331；寺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頁 57。

<sup>6</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第 1 冊，卷 14，〈東萊公家傳〉，頁 223。

<sup>7</sup> 李弘祺曾歸納宋代數支名族的發展情況，並結論曰：「名門望族的興廢盛衰背後隱藏著深刻的政治變遷。……在宋代，許多顯要官員家庭的興衰榮枯，政治因素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呂氏家族自不例外，地位隆殺亦取決於政治局勢之變遷。王德章與衣川強則認為，在呂氏家族的例子中，婚姻的確是重要因素，但也需與考試成功相配合才能有效維持地位。王章偉，〈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以河南呂氏家族為例〉，《新史

在呂好問之後，呂家成員依然能維持官員的身份，但多數人的官位都無法達到北宋的水準。呂好問的兒子呂本中（1084-1145）位至中書舍人，正四品；呂弼中位至駕部司員外郎，正七品；呂堅中官至祁陽縣令，從八品。呂祖謙的父親呂大器（?-1173）位至倉部司員外郎，正七品，其弟呂大倫則為武義縣丞，從八品，此外呂大倫還有兩個弟弟根本沒有官位。所以樓鑰（1137-1213）才感嘆說「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獻不墜，未有盛於呂氏者也。至于今日，仕者寢寡。」<sup>8</sup>從南宋的呂家四代成員的官階變化看來，呂家一代不如一代，沒落的危機近在眼前，昔日的顯赫地位似乎遙不可及。<sup>9</sup>

紹興年間（1131-1162）的黨爭也讓呂氏家族難以振作。宋室南渡之後，朝廷首要任務即在弭平內亂。直到紹興四年（1134），國內情勢稍定，執政者趙鼎（1085-1147）始以對抗外患為主要目標。趙鼎親近北宋舊黨人士，為政時期號稱「小元祐」。呂氏家族與趙鼎的關係相當密切，趙鼎不但提拔呂氏成員，而且雙方還締結姻親關係。其中，呂本中是呂祖謙的伯祖，也是趙鼎集團中的重要成員。但在紹興八年（1138）十一月，呂本中隨著趙鼎與秦檜的鬥爭失敗而離職。呂廣問（1096-1168）與呂好問同輩，為呂祖謙曾祖，紹興九年（1139）十二月，隨著李光和秦檜意見不合，也無法成功除命館職。呂氏成員總是受政治勢力的相互傾軋而無力保衛官位。<sup>10</sup>

除了政治因素，科舉表現也影響了呂氏家族的地位。從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開始，呂氏家族的子弟在科舉考試方面便一直保持良好成績。直到建炎元年（1127）為止，呂氏家族在北宋總共產出 12 名進

---

學》4.3(1993):49-56。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頁 242-243。

<sup>8</sup> 樓鑰，《攻媿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卷 35，〈呂大麟知常德府〉，頁 477。

<sup>9</sup> 他的官位低落除了因為事奉偽政權導致遭受懷疑以外，也受到當時黨爭的因素。關於官品高低的判定，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14，225。

<sup>10</sup>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頁 109-119，136-137，158，199-205。

士。<sup>11</sup>但時至南宋，自建炎元年（1127）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為止，宋廷總共開科 11 次，呂氏家族卻完全沒有培育出任何一名進士。呂氏家族的科舉表現滑落，族中似乎缺乏科舉成績表現優異的子弟，於是利用官蔭當作最主要的人仕途徑。呂本中藉著官蔭入官，呂堅中、呂弼中、呂大器、呂大倫都沒有中進士或參加考試的紀錄，大抵都是憑藉恩蔭。但依賴恩蔭不是長久之道，呂氏家族若想維持地位甚至振興家族，考取功名仍是必要條件。<sup>12</sup>

最後，家族地位下滑又導致學術交際圈的縮小，這更讓呂家成員倍感壓力。自北宋以來，呂氏家族便與許多江西地區的頂尖士人密切往來，諸如晏殊（江西撫州，991-1055）、歐陽修（江西吉州，1007-1072）、曾鞏（江西撫州，1019-1083）、王安石（江西撫州，1021-1086）、黃庭堅（江西洪州，1045-1105），都是呂氏家族的好友。但在南宋，呂氏家族與江西士人之間卻鮮少交流。呂大器因此憂心地告誡呂祖謙，家族發展狀況並不樂觀：「吾家江西賢士大夫之踈密，亦門戶興替之一驗也。言畢，復蹙然久之」，呂祖謙則將父親的焦慮牢記在心：「某再拜，識之不敢忘。」<sup>13</sup>其後，呂祖謙開始將振興家族當成自己的使命。他撰寫〈東萊公家傳〉，在文中洗刷曾祖呂好問的政治污點，就是一種恢復呂氏家族光榮歷史的企圖，而這也是呂祖謙致力舉業的主要動機。在求學階段，呂祖謙致力研習考試技巧，並追隨擅長考試的大儒，目的即在取得功名。

<sup>11</sup> 呂氏家族在兩宋一共產出 16 名進士，其中四分之三在北宋。孔東，《宋代東萊呂氏之族望及其貢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22-24。

<sup>12</sup> 郝若貝（Robert Hartwell）與韓明士（Robert Hymes）曾主張功名對維持士人地位僅屬次要，婚姻關係與財富實際上更為重要。但李弘祺則質疑，士人若不應考取得功名，很難防止地位下滑，因為科舉始終是獲得政治權力的捷徑。這也就是為什麼宋代「家訓」出現鼓勵子弟習「進士業」、「應考」等內容的原因。見袁采，《袁氏世範》（《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卷 2，〈子弟當習儒業〉，頁 22-23。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頁 v-xiii，261。郝氏觀點見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no.2 (Dec., 1982):365-442。韓氏又強調對南宋撫州的外來家族而言，婚姻較科舉更能提升其家族在地方上的社會地位，見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 29-53, 69-72, 82-103, 210。

<sup>13</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7，〈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頁 119。

果不期然，他成為呂氏家族南渡後 35 年以來第一位進士，而且還是當時表現最為優異的考生。呂氏家族的困境似乎尚有轉機，而呂祖謙卻從此精於舉業，並且以此聞名。

## 二、呂祖謙的科舉生涯

呂祖謙一生與科舉活動密不可分，依其活動類型似可分為四個主題。在 27 歲參加考試之前，呂祖謙與一般士人一樣，以從事舉業為主。其後，呂祖謙參加考試，獲得了良好的成績。他為官時亦多從事教職，教授學生考試的技巧，平居講學也多以舉業為課程內容。以下將呂氏生涯分為：一、準備考試，二、考試高中，三、宦游時期，四、舉業教學。<sup>14</sup>

### （一）準備考試：紹興十六至三十二年（1146-1162）

紹興七年（1137）呂祖謙出生於外祖父曾幾（?-1166）在桂林的住處，此後直到十歲，都與父母居於此地。<sup>15</sup>他小時候個性很暴躁，但頗知反省，能克制自己的情緒：「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常忿懷渙然冰釋。」<sup>16</sup>他又曾自謂：「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sup>17</sup>，所以舉業可能是他自小學習的基本內容。除此之外，吾

<sup>14</sup> 杜氏則將呂祖謙的一生分為兩期：孝宗隆興元年（1163）呂祖謙二十七歲中進士前為前期。呂氏主要投身舉業；二十七歲後屬後期。呂氏主要從事科舉教學。杜海軍，《呂祖謙文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37。

<sup>15</sup> 陸游曾描述呂祖謙的幼年：「紹興中，某從曾文清公遊，公方館甥呂治先，日相與講學。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穎異，蓋吾伯恭也。」陸游，《渭南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1，〈跋呂伯恭書後〉，頁 3。

<sup>16</sup> 又據朱熹：「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路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23 冊，卷 54，〈答陸德章〉，頁 2564。脫脫：《宋史》，卷 193，〈儒林四·呂祖謙〉，頁 12874。

<sup>17</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4，〈除館職謝政府啟〉，頁 77。

人對他的幼年瞭解不多。

從紹興十六年(1146)開始,十歲的呂祖謙便跟著呂大器四處遊歷。他一開始隨呂大器到池州(江南東路)任官,隨即歸回婺州。十五歲時他又跟著呂大器到了越州(兩浙東路),十九歲時則到了福州(福建路)。這種四處遊歷的生活直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才結束,所以呂祖謙待在父親身邊將近十六年的時間,呂大器是呂祖謙最主要的老師,全祖望因此判斷家學對呂祖謙的學識有很大的影響。<sup>18</sup>在求學階段,其他老師對呂祖謙的影響也許遠不如他的父親。

呂祖謙其他的老師都有一項特點:他們不是善於舉業就是有非凡的考試成績。呂祖謙跟隨最久的老師是張九成(1092-1159)。根據陳傅良(1137-1203)的紀錄,呂祖謙曾自謂:「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為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可見呂祖謙跟隨張九成求學時間最長。<sup>19</sup>張九成曾從二程的弟子楊時(1053-1135)求學,但亦喜接觸佛學,因而受到訾議。<sup>20</sup>此外,張九成也以擅長考試聞名,考試成績極其優秀。他在紹興元年(1131)獲得省元,其後又中狀元,試卷為士人傳鈔,而且流佈中外。<sup>21</sup>呂祖謙接受張九成親自指導,舉業自然精進。張九成教授舉子有獨到之處,他的學生汪應辰(1119-1176)曾奪狀元,而樊光遠(1102-1164)則居省元。如此優秀的教學成績讓高宗也覺得驚訝:「上語九成曰:『二魁皆卿門人』,深用嘉歎。」<sup>22</sup>

<sup>18</sup> 故全祖望曰:「先生文學術業,本於家庭。」黃宗羲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第2冊,卷51,〈東萊學案〉,頁1653。

<sup>19</sup> 呂祖謙在與弟子的談話中,也曾提過他年輕時親聆張九成教誨的經歷。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2冊,卷8,〈門人集錄史說〉,頁231。陳傅良,《止齋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42,〈跋陳求仁所藏無垢帖〉,頁7。

<sup>20</sup> 比如朱熹(1130-1200)批評張九成的《中庸說》參雜佛學,並詬其人「陽儒陰釋」。鄧克銘,《張九成思想之研究》(臺北:東初出版社,1990),頁16。

<sup>21</sup> 據王明清《揮塵三錄》記載,張九成「廷試策流播偽齊,人悉諷誦。」可見當時張氏實居考試模範之地位。見王明清,《揮塵錄·三錄》(《歷代筆記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3,頁198。

<sup>22</sup> 俞文豹,《吹劍錄外集》(《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1。

紹興二十五年(1155),呂祖謙轉向林之奇求教。林之奇(1112-1176),字少穎,是福州的舉業教師,自謂「出題讀課遂至罷費心力」<sup>23</sup>。在林氏的鼓勵下,呂祖謙開始模仿古文的寫作風格。<sup>24</sup>

呂成公未冠,以子職識行,聞先生得西樞之傳,乃從先生遊。先生嘗語諸生,以為若年寢長矣,宜以古文洗滌胃次,掃其煤塵,則晶明日生。成公受教,作文主以古意而潤色之,先生每讀必擊節賞嘆,知其遠且大。<sup>25</sup>

林之奇的指導切中當時考場流行趨勢。據真德秀(1178-1235)言,當時考試作文關鍵有二,一是熟悉程文格式,二是模仿古文文風,兩者缺一不可:「凡作文之法,見行程文可為體式,需多讀古文則筆端自然可觀。」又云:「當以程文為式,而措辭立意則以古文為法可也。」又云:「讀古文未多,終是文字體輕,語弱更多,將古文涵泳方得。」<sup>26</sup>

受到林之奇影響,呂祖謙之後又編輯了《古文關鍵》,試著選出真正符合古文文風並值得學生模仿的作品。《古文關鍵》成為一本相當普遍的舉業用書,清代俞樾(1821-1907)還將其視為考試文章入門書籍。<sup>27</sup>

林之奇除了教授古文,還讓呂祖謙瞭解各種「文類」的寫作方式。當時呂祖謙所使用的教材是林之奇編輯的《觀瀾文集》。

先生家居……士子會者盈集。先生時乘竹輿至群居之所,諸生列左右致敬。先生有喜色,或命諸生講《論》、《孟》。是則首肯而笑,否則令再講,或令誦先生所編《觀瀾集》,而聽之倦,則啜

<sup>23</sup> 林之奇,《拙齋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9,〈答劉先生〉,頁1。梁庚堯,〈福州士人與舉業〉《東吳歷史學報》11(2004):195-196。

<sup>24</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卷1,〈年譜〉,頁737-749。

<sup>25</sup> 姚同,〈行實〉,收入林之奇,《拙齋文集·附錄》,頁2。

<sup>26</sup> 王應麟,《玉海》(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據清光緒九年(1883)浙江書局刊本影印),第6冊,卷201,〈辭學指南〉,頁3674-3675;卷204,頁3729。

<sup>27</sup> 俞樾,〈古文關鍵跋〉,收入呂祖謙,《古文關鍵》(臺北:廣文書局,1981),卷下,頁317-318。

茗歸臥，率以為常。<sup>28</sup>

透過《觀瀾文集》，林之奇教導呂祖謙如何增進閱讀文章的效率。在〈觀瀾集前序〉中，林之奇指出書籍如海，士人不可能盡覽：「窮其無窮，極其無極，雖末世窮年曾不足以究馬體之毫末。」<sup>29</sup>因此，閱讀策略便非常重要：「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就是海面的波浪，意指文海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觀瀾文集》以「分類選文」的方式幫助士子增進閱讀效率。林氏將文章分成各種「文類」，然後選出各「文類」中的代表作。這種「分類選文」是傳統編輯文集的方式之一。梁朝蕭統（501-531）的《昭明文學》、宋代姚鉉（967-1020）的《唐文粹》、呂祖謙晚年的《皇朝文鑑》以及元代蘇天爵（1294-1352）的《元文類》都採用「分類選文」的編輯方式。所以清代章學誠（1738-1801）將這些文集劃為同類：

蕭統《文選》以還，為之者眾。今之尤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sup>30</sup>

對讀者而言，「分類選文」能節省檢索書海的工夫，又能廣泛熟習各種文類的格式與作法。<sup>31</sup>這種閱讀方式對呂祖謙相當重要，因為後來他應考的「博學宏辭」科，正是一種要求考生精通各種文類寫法的科目。林之奇不只教授呂祖謙古文，指點他如何通過進士科考，他還讓呂祖謙泛覽書海，進而挑戰更困難的詞科。

紹興三十二年（1162），二十四歲的呂祖謙轉向汪應辰求教。根據《宋史》，汪氏為一神童，「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

<sup>28</sup> 姚同，〈行實〉，收入林之奇，《拙齋文集·附錄》，頁5。

<sup>29</sup>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16，〈觀瀾集前序〉，頁8。

<sup>30</sup>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上冊，卷1，〈內篇一·書教中〉，頁41。

<sup>31</sup> 另一方面，有些文集則採用我稱為「專體收文」的方式。「專體收文」只收集一種特定文類的作品，並且幫助讀者專精其作法。宋代有些文集即為「專體收文」，比如宋末魏天應的《論學繩尺》，還有另一本與前者頗有淵源的《策學繩尺》。這兩本書各自專注於收羅優秀的「論」和「策」兩種文體，內容顯然是針對進士科考試項目的教科書。相對而言，「分類選文」的文集與參加進士科考試就沒有很密切的關係，進士科並未要求考生精通各種文類。

驚人，多識奇字。」<sup>32</sup>天資造就了無比的考試優勢。紹興五年（1135），汪應辰十七歲就考取狀元。<sup>33</sup>汪應辰的文才絕出，尤長制詔。據《直齋書錄解題》，汪應辰著有《玉山翰林詞草》，而汪氏本人「天材甚高而不喜為文……每作輒過人，以天官兼翰苑，近二年所撰制詔溫雅典實，得王言體。朱晦翁稱為近世第一。」<sup>34</sup>所謂的「制詔」即「制誥」，指皇帝的詔令，故又稱「王言體」。制誥為了代王言事需模仿皇帝語氣，內容必需文辭典雅，因此主筆者必經仔細挑選。南宋詞科「博學宏辭」立意即在拔擢此等人才，故考試項目亦以制誥為重。汪應辰也許教導過呂祖謙寫作王言體的訣竅，提高了呂祖謙日後考取「博學宏辭」的可能性。

## （二）考試高中：紹興三十二年至隆興元年（1162-1167）

隆興元年（1163）孝宗即位，呂祖謙二十五歲。在此之前，他至少已經投入了7年的時間準備考試。當年他同時參加了兩種考試，進士科以及博學宏辭科，而且兩科連中，獲得罕見的成績，長年的努力也獲得報償：

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迪功郎。又中博學宏詞科。六月七日，特授左從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唐之科目雖多而輕，故有食餌小魚之譏。然連中者亦寡矣……爾兩科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資敘超升，是亦常典。<sup>35</sup>

其中，博學宏辭科屬於詞科，與制舉和科舉相別，是相當特別的考試科

<sup>32</sup> 脫脫，《宋史》，卷387，〈列傳一百四十六·汪應辰〉，頁11876。

<sup>33</sup> 事實上，呂祖謙跟隨汪應辰的同時也求教過胡憲（1086-1162）。胡憲，字原仲，是胡安國的從子。不過在〈年譜〉中，呂祖謙與胡憲從游時間很短，之後也沒有任何聯繫，師生關係很薄弱，可以從略。相對而言，呂祖謙一生與汪應辰的聯絡更熱絡，關係也比較緊密。

<sup>34</sup>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第3冊，卷18，〈玉山翰林詞草〉，頁506。

<sup>35</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1，〈年譜〉，頁740。

目，值得稍微介紹。<sup>36</sup>

北宋紹聖元年（1094）宋廷設「宏辭科」，用意在提拔文詞雅致、博通典故者擔任皇帝代言者的角色，負責撰寫稱為「王言體」的制誥。宏辭科測試考生對 10 種文類的寫作能力，考題範圍僅限時事。南宋紹興三年（1133）則變更名義為「博學宏辭」科，且擴大考試範圍，考題包羅古今典故，考試難度竄升：

紹興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於內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一古一今。試人先投所業三卷，朝廷降付學士院，考其能者召試。……自復科以來，所得鴻筆麗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紹興中得十有七人，隆興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紹熙一人，開禧至嘉定三人。<sup>37</sup>

從考試規定看來，考生首需熟練 12 種文類，這比進士科的考試項目多上數倍。而且考試抽考 6 題，每場一古一今，題目一半出自歷史，一半來自時事。考生必熟知古今人物制度名數，即所謂博古通今。題目困難，有些考生連題目都看不懂。<sup>38</sup>

總之，是科要求考生具有典雅莊重的文筆，同時又擁有博古通今的見識。高難度的要求使宋代歷來錄取人數極低。自紹興五年（1135）始，至開慶元年（1259）為止，博學宏辭科在 120 年之間僅錄取了 40 人。不過上榜者未來的發展也很好，40 人中有一半以上都在朝中擔任重要官職。<sup>39</sup>如馬端臨所言：「多有至卿相翰苑。」<sup>40</sup>呂祖謙為何報考此科的原

<sup>36</sup> 科舉指以詩賦或經義、策、論為考試項目的進士科；制舉又稱制科，南宋主以賢良方正極言直諫科為代表，考策、論，不考詩賦、經義。詞科則考應用文，不試詩賦、經義、策、論。三種考試絕不同。林瑞翰，〈宋代制科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8(1987.12):71-74。聶崇岐，〈宋代制舉考略〉，收入聶崇岐，《宋史叢考》（台北：華世出版社，1986）頁 171-191。

<sup>37</sup> 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出版社，1958，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 1 冊，卷 33，〈選舉考六·賢良方正〉，頁 317。

<sup>38</sup> 譬如洪遵（1120-1174），《四朝見聞錄》載：「洪氏遵試《克敵弓銘》，未知所說。有老兵持硯水謂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短長，無不語洪。有司以為神。」葉紹翁，《四朝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甲集·詞學〉，頁 19-20。聶崇岐，〈宋詞科考〉，收入聶崇岐，《宋史叢考》，頁 134。

<sup>39</sup> 其中有 20 人曾入翰林學士院知制誥，擔任皇帝的書面代言人；另有 6 個人曾擔任宰輔。宋廷通常由學士院翰林學士負責「代言言」，起草皇室、親王、宰執等重大人

因相當明顯。對一般人而言，博學宏辭科是政治前途一大保證；對呂氏家族來說，博學宏辭科則是重振地位的跳板。<sup>41</sup>但不論如何，呂祖謙此後便以考試高手聞名於世，其手筆則成為舉業用書必收的模範之作。<sup>42</sup>

### （三）宦游時期。乾道三年至淳熙六年（1167-1179）

隆興元年（1163），呂祖謙開始從事官職。他的職事或多或少都與考試有關。呂祖謙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南外敦宗院教授，不過教學情況不明，在〈年譜〉中沒有詳細記載。

乾道五年（1169），呂祖謙被指派擔任嚴州州學教授。十月，呂祖謙前往嚴州述職，當時嚴州州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餉啜」<sup>43</sup>，考試實為例行課程。因此呂氏寫信告訴他的朋友說：「某到嚴兩旬矣，郡庠亦漸有次序，日以躬行務實之語薰灌之，不專講程文也，但殊難得有志趣者

---

事任命。此外翰林學士還需擔任皇帝的顧問、智庫，故與皇帝關係緊密，有「天子私人」之稱。因此，翰林學士常被視為儲材之位，升遷的跳板，統計即顯示宋代有一半的翰林學士曾任宰執。由此觀之，專意將制誥文體設為考試項目的博學宏辭科，其立意或即為揀選未來的翰林學士，甚至宰相。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3-14。聶崇岐，《宋詞科考》，收入聶崇岐，《宋史叢考》，頁 153-163。

<sup>40</sup> 馬端臨，《文獻通考》，第 1 冊，卷 33，〈選舉考六·賢良方正〉，頁 283。

<sup>41</sup> 優異的考試成績讓呂家有機會鞏固或締結與其他官僚的關係。當時呂祖謙的未來發展令人看好，而韓元吉（字無咎，1118-1187），來自另一個官僚名門，便將兩個女兒先後嫁與呂祖謙。

<sup>42</sup> 宋末的《論學繩尺》收入 154 篇文章，其中只有 1 篇是呂祖謙作品。但其他作品中有不少評點以呂祖謙的書寫方式當作評分標準，譬如：「文字出入東萊議論，法度嚴密、意味深長。」成書於 12 世紀後半葉的《十先生輿論》，其書收入 16 名作家共 227 篇時文，其中有 18 篇呂祖謙的作品，收錄數量在書中排名第 4，僅低於陳傅良、葉適（1150-1223）、楊萬里（1127-1206）三人。宋末元初的《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前集》則收有 32 篇議論，其中有 7 篇呂祖謙作品，排名第 2，比例更高。見魏天應，《論學繩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唐虞三代純懿如何〉，頁 1。譚翼中等纂，《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前集》（《宛委別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1-118。不著撰人，《十先生輿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227。

<sup>43</sup>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21 冊，卷 33，〈答呂伯恭〉，頁 1427。

耳。」<sup>44</sup>呂氏目標主在提升學生德行，但舉業依然是授業內容之一。

乾道六年(1170)夏五月，呂祖謙擔任州學教授不久即被調至中央，並任命為太學博士。在太學中，呂祖謙設計了大量的策問，提供太學生模擬考試之用。這些策問今日尚存 34 題，可能是宋人留存於文集中數量最多的。可見不論在地方或是中央，呂祖謙都和考試教學脫不了關係。

對呂祖謙而言，大部分為官時間並不愉快。他曾寫信告訴陳亮(1143-1194)自己的心情：「時事非唯為易插手，職守各有攸思，又兀然無上下知交。若欲強聒，則尚口乃窮矣」<sup>45</sup>。他又說身邊知己很少：「朋游散落，益復鮮況」<sup>46</sup>，顯然在官場中相當孤立，施展不開。乾道八年(1172)，呂祖謙的父親去世，因此歸家守喪。相對於作官，呂祖謙對教學則是充滿熱忱。當他罷官歸鄉的時期，教學成了他的生活重心。此後直到淳熙三年(1176)，呂祖謙大多待在婺州從事教學。

淳熙三年(1176)，呂祖謙又被宋廷召回，並任命為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負責重修《徽宗皇帝實錄》。淳熙四年(1177)《實錄》書成，遷承議郎，任秘書郎，國史編修。在繁重的工作中，呂祖謙還要求重編一本坊刻文集《宋文海》。此後直到淳熙六年(1179)，呂祖謙都擔任史職，這項職位讓他能取得許多珍貴的政府檔案，並與學生和朋友同觀。<sup>47</sup>

淳熙六年(1179)，呂祖謙以一人之力完成文學選集《文海》(後改名《皇朝文鑑》)。這本巨編延續林之奇《觀瀾文集》的編輯方式，將作品分為 61 門類，共 2547 篇，150 卷。<sup>48</sup>呂祖謙編輯《皇朝文鑑》原意在仿效《資治通鑑》，希望有助治道，讓讀者能在文學作品中體會治國的

<sup>44</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 冊，卷 10，〈答潘叔度〉，頁 496。

<sup>45</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外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 冊，卷 5，〈與陳同父〉，頁 704。

<sup>46</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外集》，卷 5，〈與陳同父〉，頁 705。

<sup>47</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1，〈年譜〉，頁 745。

<sup>48</sup> 杜海軍，《呂祖謙文學研究》，頁 128。

方式，但試子似乎比宋廷更重視《皇朝文鑑》。<sup>49</sup>直到元代，《皇朝文鑑》仍被視為宋代模範文章的精華選集，舉業教師則推薦試子熟讀其中有助考試的文章。<sup>50</sup>

呂祖謙在《文鑑》繁重的編輯工作結束後便病倒臨安。淳熙六年三月，呂祖謙辭官歸婺，結束了他的宦宦生涯，此後便留在家鄉教書直到淳熙八年（1181）去世。

#### （四）舉業教學：乾道三年至淳熙八年（1167-1181）

呂祖謙很年輕時就有學生跟隨，但乾道三年（1167）歸婺教學之後，從學者便大量增加。據呂祖謙自述，乾道三年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sup>51</sup>這些學生無疑是受呂祖謙擅長考試的名聲所吸引。呂祖謙沒有讓這些學生失望，他教出了很多優秀的學生，而且以文學出名。朱熹因此批評這些「文士」雖有名氣，其言卻多不中理：「聞門下多得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聞四方，大為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憂歎不自己。」<sup>52</sup>

乾道四年（1168），各地前來求教的試子依然絡繹不絕，於是呂祖

<sup>49</sup> 在《文鑑》成書之後，孝宗獎勵了呂祖謙，但有些官員則批評《文鑑》的內容，是書因此並未付梓：「朕常觀其奏議，甚有益於治道，當與恩數。又聞因此成病，朕當從內府厚錫之。」……有媚者密奏云：「《文鑑》所取之詩，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舊人以刺今。又所載章疏，皆指祖宗過舉，尤非宜。」於是上亦以為鄒浩〈諫立劉后疏〉語訐，別命他官有所修訂，而鈔板之議遂寢。」呂喬年，〈皇朝文鑑序〉，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4冊，《皇朝文鑑·附錄》，頁891。

<sup>50</sup> 如元代的陳繹曾就推薦學生在模仿宋代的「詔」、「誥」兩種文體時，以《皇朝文鑑》為參考書：「漢詔當盡取真西山《文章正宗》所選讀之。唐詔當選取《文苑英華》所有之精者讀之。宋詔當盡取呂東萊《文鑑》中所選讀之。……唐誥當取《文苑英華》中精者讀之。宋誥當盡取東萊《文鑑》中所選者讀之。」陳繹曾，《文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2。

<sup>51</sup> 呂氏弟子李知微（字中甫）曾於淳熙八年（1181）時說：「知微早登師門，見調靜顯。誘掖教誨，垂二十年。」可見呂祖謙早在紹興末年便已有學生。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外集附錄》，卷3，〈李中甫〉，頁806。《東萊呂太史外集》，卷9，〈與劉衡州〉，頁453。

<sup>52</sup> 時在乾道五年（116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1冊，卷33，〈答呂伯恭〉，頁1425。

謙著手編寫《左氏博議》並藉此教授舉業。《左氏博議》很受歡迎，成書之後廣為流傳，直到清末依然是暢銷書籍。<sup>53</sup>朱熹曾寫信給呂祖謙，批評《左氏博議》壞人心術：「向見所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極其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澆薄，重為心術之害。」<sup>54</sup>不過呂祖謙依然從事舉業教學，並持續編寫相關用書。呂祖謙回信向朱熹解釋，舉業教學是一種吸引士人聚集的手段，甚至還能藉此從中挑選人才。

科舉之習，與成己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舍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sup>55</sup>

朱熹對呂祖謙的解釋並不滿意，他回信告誡呂祖謙不要再埋首於舉業教學及相關工作，「為舉子輩抄錄文字流傳太多，稽其所蔽，似亦有可議者。自此恐亦當少訖其出也。」<sup>56</sup>呂祖謙回信答應，但似乎只是敷衍而已。淳熙元年（1174）春，朱熹又寫信問呂祖謙：「向令兒子請問選錄古文之意，不知曾語之否？此間與時文皆已刊行。於鄙意殊未安，近年文字姦巧之弊極矣，正當以渾厚朴素矯之，不宜崇長此等，推波以助瀾也。」<sup>57</sup>顯然呂祖謙又重操舊業，當時他可能在編寫另一本舉業用書《古文關鍵》。實際上，呂祖謙從乾道三年開始教學至淳熙八年（1167-1181）共 15 年間至少曾編寫 13 種舉業用書，堪稱宋人之冠。<sup>58</sup>而

53 乾道六年（1170），陸游提到《左氏博議》是他的兒子用來準備舉業的參考書：「舟中日聽小兒輩頌《左氏博議》，殊歎仰也」。而清代的俞樾（1821-1907）則提到《左氏博議》是清末試子的必備考試用書：「光緒二十有四年（1898），天子深念時文取士之弊，下明詔廢時文，改以策論取士，甚盛舉也。於是逢掖之士無不思學為古文而不得其塗徑，則爭取《東萊博議》而讀之。旬日之間，而書肆所有《東萊博議》為之一空。」陸游，〈與曾逢書〉，收入《陸游集·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2530。俞樾，〈古文關鍵跋〉，收入呂祖謙，《古文關鍵》，卷下，頁 317。

5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3，〈答呂伯恭〉，頁 1429。

55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7，〈與朱侍講〉，頁 398。

5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3，〈答呂伯恭〉，頁 1437。

5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3，〈答呂伯恭〉，頁 1452-1453。

58 現存呂祖謙及其弟子所編寫或標注的考試用書依用途可暫分 4 類，共 13 種。一、文章範本：《皇朝文鑑》、《古文關鍵》、《左氏博議》、《東萊標注三蘇文集》、《東萊集

且，即使呂祖謙去世後，呂氏家塾依然從事印行時文的工作。<sup>59</sup>

呂祖謙編纂的舉業用書不僅在婺州暢銷，在鄰近的區域也很受歡迎。一些同行甚至試著利用他的知名度來銷售自身的作品。乾道九年（1173）朱熹寫信告訴呂祖謙，福建建陽的書商正以呂祖謙的名義出售一本考試用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采獲，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sup>60</sup>呂祖謙則回信解釋《精騎》絕非出自其手。呂氏也許說的是實話，不過他可能隱瞞了部分事實。根據當時一位東陽士人俞成的記載，呂祖謙的確建議學生使用《精騎》充作課程入門用書：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健，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頭地。<sup>61</sup>

不管如何，呂祖謙編寫的舉業用書讓他聲名大噪，而且還招來了大量請求呂氏親自指導的學生。

乾道九年（1173），呂祖謙丁父憂，秋天時求教的學生卻有增無減。呂祖謙的舉業教學有旺季淡季之分，不同時節的學生人數差距很大。每當接近考試，「秋深人多」，則有數百人聚集，但平常「不過時有三數輩耳」。<sup>62</sup>這些試子對呂祖謙的期盼很大，他們不諱風俗，要求呂祖謙在喪中講學。對這些學生來說，考試成績似乎比較重要。而呂祖謙面對許多試子的要求，只好答應講學。但這種行為又引來議論，一些朋友都很不

---

註觀瀾文集》。二、供考生查找資料的類書：《左傳類編》、《歷代制度詳說》、《詩律武庫》。三、課堂講錄：《麗澤論說集錄》、《左氏傳說》、《左氏續傳說》。四、模擬考題與節書：35 題〈策問〉、《兩漢精華》、《十七史詳節》。

<sup>59</sup> 根據寶祐二年出生的馬端臨（1254-?）所言，他曾看過呂氏家塾出版呂夷簡的鄉試考卷。《文獻通考》：「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馬端臨，《文獻通考》第 1 冊，卷 30，〈選舉三·舉士〉，頁 283。

<sup>60</sup>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3，〈答呂伯恭〉，頁 1445。

<sup>61</sup> 俞成，《螢雪叢說》（臺北：藝文出版社，1965），卷 2，〈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頁 3。

<sup>62</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10，〈與邢邦用〉，頁 501。

滿意呂氏的做法。張栻說：「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者。」，又批評這些試子：「既為舉業之故，先懷利心。」<sup>63</sup>陸九淵寫信勸告：「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履亦滿。……凡在交遊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sup>64</sup>汪應辰希望呂祖謙停止教學，呂祖謙則回信解釋：「是時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以遽已。」<sup>65</sup>直到淳熙元年（1174）春天，呂祖謙才遣散掉所有的學生。但到了淳熙二年（1175）八月呂祖謙又開始講課，課程內容似以講授歷史為主，考生依然趨之若鶩，「閱《通鑑》，有標抹本。學子多來講習者。」<sup>66</sup>

淳熙三年至六年（1176-1179）間，呂祖謙前往臨安任官。但當呂氏辭官歸鄉之後，他立刻重回教學崗位，繼續幫助試子度過考試的難關。呂祖謙直到去世前兩年依然孜孜於講學，他指導婺州潘氏家族的子弟練習舉業。<sup>67</sup>淳熙六年（1179）、淳熙七年（1180），都留有學生抄寫的講課記錄。<sup>68</sup>當呂祖謙去世後，他的教學經歷已超過 10 年，而且培養出許多進士門生，也成為婺州最受歡迎的舉業教師之一。下一節將試圖從學生的數量與考試表現評估呂祖謙的教學成就。

<sup>63</sup> 黃宗羲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第 2 冊，卷 51，〈東萊學案〉，頁 1674-1675。

<sup>64</sup> 《宋元學案》節載為「伯恭於哀經中，而戶外履恆滿。」黃宗羲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第 2 冊，卷 51，〈東萊學案〉，頁 1674。陸九淵，《象山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5，〈與呂伯恭〉，頁 61-62。

<sup>65</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7，〈與汪端明〉，頁 390。

<sup>66</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1，〈年譜〉，頁 744。

<sup>67</sup> 淳熙七年（1180）他曾向潘叔珪（叔玠）報告潘家子弟的學習狀況：「孺子近日作舉業卻勤，亦可喜也。」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9，〈與潘侍郎〉，頁 456。

<sup>68</sup> 兩篇筆記分別為〈己亥秋所記〉、〈庚子所記〉。

### 三、教學成就

#### (一) 學生數量

乾道三年至八年(1167-1181)間,呂祖謙並不是唯一活躍於婺州的教師。在金華縣,曾考取博學宏辭科的唐仲友(1136-1188)與呂氏相同,在科舉表現方面享有盛名,「從遊嘗數百人。」<sup>69</sup>東陽縣的倪千里曾向舉業高手陳傅良(1137-1203)求教,以「論」見長,回鄉授課時也相當受到歡迎,「議論文墨籍甚。開門授徒,戶外履滿,以縣最。」<sup>70</sup>義烏縣則有傅芷,「淳熙五年(1178)進士,精于經史之學,為杏溪上弟子,從遊之士極盛。未仕而卒。」<sup>71</sup>永康縣的陳亮曾為鄉貢魁選,收徒數量相當可觀,其弟子喻百強謂「從之游,同門者數百人。」<sup>72</sup>此外陳氏之著作亦多為舉子傳誦。<sup>73</sup>蘭溪縣的吳儒宗,字景舒,屢試不第,卻擅長舉業教學:「攻苦力學,博通群經,精舉子業。文尚理致,經其指授者,多占魁選。」<sup>74</sup>而同縣的徐畸則與呂祖謙、唐仲友和陳亮齊名:「湛深經術,文得歐、曾筆外法……于時婺中之以師道興起後進者,曰東萊,曰同甫,曰說齋,曰先生。學者稱為天民先生。」<sup>75</sup>這些人是婺州教師中的佼佼者,也是學生爭相求教的對象。

在眾多教師中,似乎又以唐仲友的教學規模足與呂祖謙匹敵。唐氏

<sup>69</sup> 鄭柏,《金華賢達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卷8,〈宋唐仲友傳〉,頁6-7。黃宗義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第3冊,卷60,〈說齋學案〉,頁1963。

<sup>70</sup> 王懋德,《金華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明萬曆六年刊本),卷16,頁20-21。

<sup>71</sup> 黃宗義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第3冊,卷60,〈說齋學案〉,頁1965。

<sup>72</sup> 王懋德,《金華府志》,卷16,頁33。

<sup>73</sup> 葉適:「同甫在太學晚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唯恐後。」今尚有饒輝編《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41卷傳世。葉適,《水心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第2冊,卷24,〈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頁8-9。

<sup>74</sup> 張許等修,陳鳳舉等纂,《蘭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清嘉靖五年刊本),第2冊,卷13,頁409。

<sup>75</sup> 黃宗義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第2冊,卷37,〈漢上學案〉,頁1261。

是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他的兩位兄長和父親也都是進士，門戶顯達。此外，唐仲友在呂祖謙之前便已中取博學宏辭科，所以他具有與呂祖謙堪等的學歷與聲望。在婺州，唐仲友是呂祖謙最大的競爭對手。呂祖謙初次認識唐仲友也許是在考場。當時兩人之間就有明顯的競爭關係。據《吹劍錄外集》記載，呂祖謙與唐仲友同為紹興三十年（1160）博學宏辭科的考生。在考前，唐仲友曾企圖誤導呂祖謙應答。

東萊與唐悅齋同試宏辭，問唐：「路鼓在寢門裡？在寢門外？」

曰：「在門裡。」及試出檢視，始知為其所給。<sup>76</sup>

呂祖謙當年因此落榜。此後，兩人雖曾為同事而且同居婺州，但彼此之間卻很少來往，呂祖謙在文集中幾乎對唐仲友隻字未提。<sup>77</sup>不但如此，兩人的競爭更從早年的考場，延伸為婺州教學事業的對抗。據〈說齋學案〉：

吳葵（1144-1217），字景陽，其家以貴雄于東陽，與郭氏埒。

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吳氏亦有安田書院，初則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說齋主之，皆攜弟子百餘人以至，遠近驚愕。<sup>78</sup>

吳、郭二氏為較量書院規模，各自延聘名師坐鎮自家書院。呂祖謙與唐仲友則受兩方禮聘，相為犄角。他們儼然是兩位舉業權威，在婺州的教學市場中為吳氏與郭氏的書院招攬、搶奪學生。

唐仲友是優秀的舉業教師，招收了很多學生，但他終究沒有呂祖謙

<sup>76</sup> 俞文豹，《吹劍錄外集》，頁2。

<sup>77</sup> 故全祖望亦疑兩人同居一里而絕口不及對方，極為可怪。乾道八年（1172）唐呂二人曾擔任省試考官，則兩人必為同事。今考呂祖謙文集中提及唐仲友之名僅一處，為弔其母喪而已。呂祖謙似乎只基於禮貌與唐氏往來，實無意深交，可能就是早年芥蒂所致。黃宗義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第3冊，卷60，〈說齋學案〉，頁1954。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9，〈與周丞相子充〉，頁444。

<sup>78</sup> 又據葉適：「吳君文炳學尤壯，給費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命中，得歐曾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畸繇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著作郎、知台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一但絜生員百餘。」。葉適，《水心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第2冊，卷25，〈修職郎堅和劑局吳君墓誌銘〉，頁5。黃宗義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第3冊，卷60，〈說齋學案〉，頁1963。

所具備的吸引力。根據《金華賢達錄》的記載，唐仲友的學生總數達 400 人。這項成績也許超過陳亮或徐畸，但仍稍遜於呂祖謙。<sup>79</sup>以數量而言，呂祖謙是婺州最成功的舉業教師。他招收的學生數量最高，培養出的進士人數可能也最多。

呂祖謙究竟招收過多少學生？淳熙八年（1181）時，呂祖謙的弟子陳良祐宣稱，呂氏生前光在東陽縣一地便招收了百名以上的學生：「講道東陽郡，門生數百人。」<sup>80</sup>葉適則稱：「近世大儒呂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歲常數百千人。」<sup>81</sup>開禧三年（1207）陸游說：「伯恭有盛名，從之學者以百數」。<sup>82</sup>現代學者田浩則估計呂氏在乾道三年（1167）之後招收的學生超過千人。<sup>83</sup>田氏的估計有其可能。呂祖謙的再傳弟子時少章幼時曾參與講學集會，他指出：「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人尊老，翕然從之。……是時四方來學者常千餘人，自永嘉者特多。」<sup>84</sup>千人從遊似乎毫不誇張。

但吾人若想進一步確定學生們的身份及其考試成績卻相當困難。大部分學生的身份已經失考，本文盡力鉤沉，僅得 193 名學生的資料，並列為〈表一〉。<sup>85</sup>以下以〈表一〉為基礎，推測呂氏學生的地域分佈（〈表二〉）以及中舉率。資料雖有殘缺，或有參考價值。

<sup>79</sup> 鄭柏，《金華賢達錄》，卷 8，〈宋唐仲友傳〉，頁 6-7。黃宗羲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第 3 冊，卷 60，〈說齋學案〉，頁 1959-1961。

<sup>80</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金華陳良祐哀詩〉，頁 807。

<sup>81</sup> 葉適，《水心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第 1 冊，卷 11，〈寶婺觀記〉，頁 7。

<sup>82</sup> 陸游，《渭南文集》，卷 31，〈跋呂伯恭書後〉，頁 3。

<sup>83</sup>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145。

<sup>84</sup> 這是理宗寶祐四年（1256），時少章根據其父的記憶留下的紀錄。吳師道，《敬鄉錄》（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卷 11，頁 26-27。

<sup>85</sup> 王文政的統計與本文略有出入，他考察呂祖謙弟子數量為 162 人。此外，今日姓名可考的朱熹弟子則有 488 人。見浙江省武義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呂祖謙與浙東明招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43。陳榮捷，《朱子門人》（臺北：學生出版社，1982），頁 15。

## (二) 學生的地域分佈

呂祖謙的學生大部分由浙東士人組成。據〈表二〉，呂氏學生主要來自兩浙東路，其中又以婺州士人居多。在全部 165 位籍貫可考的學生中有 125 位浙東士人，其中 95 位來自婺州。這些學生以婺州為中心，大體分佈在鄰近的明州、溫州、處州等地。可見呂祖謙的教學事業主要依賴地緣關係招收學生。不過，〈表二〉中溫州士人僅載有 8 人，可能與實際狀況頗有出入。據時少章所言，浙東地區前來婺州求學者應以永嘉士人（溫州）最多：「四方來學者常千餘人，自永嘉者特多。……吾宗人是時皆饒於財，夙戒甘毳，候諸公至，爭先迎致之。日漸月染，至自忘其鄉音，相見類作溫語，而日所啖太平溫產也。」<sup>86</sup>可見溫州與婺州兩地士人交流頻繁，實際人數應該更高。

兩浙西路的士人數量位居第二。在〈表二〉中，兩浙西路共有 14 名學生，佔總學生數 8.4%。兩浙西路的學生大部份是呂祖謙在官學執教期間所收。嚴州州學教授的職位讓呂祖謙有機會在浙西教學，所以許多當地士人因此聚集在呂氏門下，「為郡員外博士，鐸音大震，士由遠方負笈者日眾，泮宮至不足以容之。」<sup>87</sup>所以除了地緣，官學也是呂祖謙招收學生的管道之一。

福建路的學生數量與兩浙西路差不多，佔總學生數 7.8%，位居第三。但呂祖謙在福建路的學生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大部分也是朱熹的學生。在 12 位可考的福建學生中，有 9 位與朱熹關係密切，分別是：朱塾（1153-1191）、陳孔碩、陳孔夙、劉燾（1144-1216）、劉炳，馬王仲、黃渙、黃謙、王遇（1142-1211）。他們多曾向朱熹求學，而朱塾則是朱熹的兒子，並長期待在婺州學習舉業。福建的學生和浙西士人不同，在 12 名學生中只有一位郡學學生和一位太學生。福建士人和呂祖謙之間的師

<sup>86</sup> 吳師道，《敬鄉錄》，卷 11，頁 26-27。

<sup>87</sup> 楊守仁修，徐楚纂，《萬曆嚴州府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卷 10，〈治行志·教授〉，頁 253。

生關係並不是透過官學而產生，大抵是藉由朱熹與呂祖謙的學術交流所建立而成。

從呂祖謙的學生地域分佈可以發現，呂氏的教學事業以浙東婺州為中心，主要擴及鄰近的浙西、福建。浙西士人大抵經由參與官學成為呂祖謙的學生，而福建士人則透過朱熹成為呂氏的學生。此外，江南東路（4.2%）、江南西路（3%）、荊湖南路（0.6%）、廣南西路（0.6%）都有呂祖謙的學生，呂氏的名聲似乎廣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士人所知，並且稍及內陸。

### （三）學生中舉率

呂祖謙所處的兩浙東路是南宋考試競爭最激烈的地區。北宋時（960-1127），浙江東路產進士 911 名，佔全國進士數 9.4%，為全國排名第 5；到了南宋，浙東進士數增長至 3900 名，佔全國進士數 20.8%，僅落後福州路。浙東成了南宋教育事業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而這也代表了大量參與科舉的考生數量與低中舉率，例如溫州便有 8000 人同時爭奪 17 個名額的紀錄，台州與婺州也有相似情況。<sup>88</sup>在這種情況下，士人考中的機率非常低，只有 0.2%。那麼，呂祖謙的學生表現如何呢？

根據〈表一〉統計，在呂祖謙 193 位學生中共有 73 名進士，佔總學生人數的 37.8%，將近四成的人都考上進士。此外，曾擔任官職者則有 93 人，佔 48.4%，將近一半。如果以朱熹為對照，朱氏的弟子共 488 人，其中有 78 人獲得進士，佔 15.9%，曾擔任官職者共 142 人，佔 29%。<sup>89</sup>呂祖謙的學生考試成績明顯比朱熹的學生良好，而且走入宦途的也比

<sup>88</sup> 賈志揚（John Chaffee），《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187，289-298。

<sup>89</sup> 李兵曾統計朱熹弟子的中舉率為 8.6%，張栻為 33%，而呂祖謙為 40%，呂祖謙弟子的中舉率為朱熹弟子中舉率之 4 倍。他的及第比率頗為極端，因為他主要以《宋元學案》所記載的三人弟子數目為分母。其中朱熹的弟子數目則以 276 人計，明顯遠低於陳榮捷所考證的 488 人，因此所計進士人數亦相應減低。但不論李兵或本文的統計，朱熹弟子的中舉率都比呂祖謙弟子來得的低，這項結果一致，很可能反映了實際差距。

較多。儘管如此，這些數字是由殘缺的資料統計而成，只能作為參考。呂氏的學生超過千人，大部分的姓名事蹟都已失考，而且他們可能都沒有進士功名，37.3%的中舉率似乎高估。

不過，當吾人僅考慮呂祖謙在婺州教學期間的學生表現時，呂氏非凡的教學成就便顯得無法否認。從乾道三年（1167）算起至呂氏去世為止，南宋一共開科 5 次（見〈表三〉）。開科年份為：乾道五年（1169）、乾道八年（1172）、淳熙二年（1175）、淳熙五年（1178）以及淳熙八年（1181）。在這 5 次考試中，婺州總共產出 39 名進士，其中呂祖謙的學生就有 9 人，佔婺州總進士人數 23%。換句話說，婺州在此 13 年間，將近 4 個進士中就有 1 個是呂祖謙的學生。<sup>90</sup>

#### 四、小結

呂祖謙原先基於振興家族的理由開始從事舉業，但優秀的考試成績及暢銷的舉業用書卻讓其舉業高手的名聲遠播。呂氏透過地緣、官學與朱熹的關係在兩浙與福建招收大量學生，並成功訓練出許多進士，將他們送入宦途。在此過程中，呂祖謙成為了乾淳之際婺州最有名的舉業教師。

有意思的是，當呂祖謙去世之後，他的友人與弟子在祭文中幾乎沒有提到呂祖謙在舉業教學方面的成就。這些祭文頌揚呂氏的德行與學問，而它們的評論構成了呂祖謙在後世的主要形象。朱熹（1130-1200）將呂祖謙視為「道學」的支柱人物之一。樓鑰（1137-1213）則設想呂氏成為政治領袖的可能性：「少為國器，長為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陳傅良（1137-1203）認為呂祖謙是偉大的學者，學識博古通今：「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而葉適（1150-1223）則將呂祖謙視為偉

---

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01-102。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5，29-378。

<sup>90</sup> 這八人的姓名為：葉誕、洪無競、趙善珍、喬夢符、俞厚、鞏嶸、時瀾、陳黼、鞏豐。婺州的進士名單見〈表三〉。

大的老師，提攜後進不倦：「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苕秀。」<sup>91</sup>

在各種評論中，呂祖謙在文章方面的成就從來不被強調。有人的確讚美呂氏：「文章之卓，旋端轉倪。有正有奇，有峻有夷。開闔縱閉，握其樞機。」但其他人更傾向強調文章以外的成就：「務在躬行，匪專章句」，或是想區別呂氏的文學與時下流行的文風有所不同：「彼怪于文，鍛鑄出奇。公文渾然，不事剗削。」迴避正面評論呂氏文學成就的原因頗為顯然，一如鄭伯英（1130-1192）所指出，當時的士人對呂祖謙早有刻板印象：「人徒指為章句之雄者」。換言之，許多士人僅將呂祖謙視為作文高手、舉業名師。呂祖謙透過舉業，生前其文學名聲早已廣受肯定，甚至可能還掩蓋了呂氏其他領域的表現。舉業教師是呂祖謙在當世士人心中的主要形象。<sup>92</sup>

呂祖謙的教學相當成功，但呂氏如何指導舉業？用甚麼方法培養學生的考試能力？下一章將試圖追索宋代的考題範圍變化，並檢視呂祖謙的舉業課程如何配合科場環境，訓練舉子迎戰考場的能力，並藉此瞭解他的教學方式。

<sup>91</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3，〈祭文〉，頁770，772，790-791。樓鑰，〈祠堂記〉，收入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拾遺〉，頁821。

<sup>92</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2，〈祭文·鄭監廟景元〉，頁759-760；卷3，〈祭文〉，頁787-791。

### 第三章 減輕備考重擔：呂祖謙的舉業課程

對考生而言，採用有效率的舉業訓練方式相當重要。宋代士人考中進士的平均年齡是 36 歲，終老未仕者亦大有人在。考生需要投資大量時間研讀典籍，同時又要應付經濟問題。如果一舉不中，數年心血立刻白費，因此備考的過程充滿壓力。因此，如何讓學生讀得更多？理解得更好？寫得更優秀？就成為每一位舉業教師的共同目標。<sup>1</sup>

舉業是一種考試訓練而不是自由的學術研究，所以它的課程會受到科場的各種限制。每一位舉業教師在設計課程之前，都必須釐清當時的科場環境。在宋代，舉業課程主要受兩種因素影響：考試項目與考題範圍。考試項目決定考生練習的文體種類。宋代進士科考試項目基本由五種考試文體組成，經義、詩、賦、論、策。所有考生都需鍛鍊此五種文體。考題範圍則影響課程份量。宋代的考題範圍時寬時窄，考生必須具備足夠的閱讀量才能應付考試。考試項目與考題範圍之間也有密切關係，經義考試僅由經書出題，考題範圍相對較窄；若是詩賦考試，則經史子集都有可能出題。因此考試項目之廢存也會影響課程份量。

歷來已有各式研究專論考試項目及文體的演變。<sup>2</sup>本章將略述從北宋至南宋初考題範圍的變化，以觀其對舉業訓練的影響。並以呂祖謙為例，分析一位舉業教師究竟如何適應科場趨勢，提升考生的學習效率。

---

<sup>1</sup> 賈志揚 (John Chaffee)，《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253-254。

<sup>2</sup> 相關論著見甯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 一、考題範圍的界定

宋廷對考題範圍的界定隨時期不同各有變化，然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一、太宗至仁宗朝對考題範圍界定寬鬆，可視為「北宋前期」；二、神宗朝王安石改革科舉，取消詩賦考試，考題範圍由寬而窄，可視為考題範圍之「轉變期」。三、元祐更化，新法盡廢，司馬光等舊黨人士雖一度欲擴張考題範圍，然紹聖以後直至北宋滅亡，考題範圍又再次限縮，可視為神宗朝科舉政策之「延續期」。四、高宗後，復行詩賦考試，考題範圍擴大，可視為元祐政策之「再興期」。因此，從北宋至南宋初，科場中的考題範圍大抵由寬而窄，再由窄回寬。每一個時期對舉業課程的影響皆略有不同。

### (一) 北宋前期，太宗至仁宗朝（976-1064）

北宋前期考題範圍相對寬泛。宋代開國文獻未備，朝廷致力編修古籍。一方面為了推廣文教，一方面則為考官與考生提供考題依據。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國子監刻印《五經正義》；淳化五年（994）又加刊《公羊》、《穀梁》、《儀禮》、《禮記》、《孝經》、《論語》、《爾雅》七本經疏；直到真宗咸平四年（1001），大部分經書校讎底定，「於是九經疏義悉具矣。」<sup>3</sup>此後，宋廷便將國子監本之九經及其注疏視為考題基本範圍，考生作答亦必「恪守經注」。如考生賈邊，「有名當時，及就省試……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眾』，與注疏異說」，他的答案便違反官定《論語注疏》的標準解釋，因而下第，顯見評分方式之明確嚴格。

4

<sup>3</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49，頁 1073。

<sup>4</sup> 《論語·衛靈公》原文曰：「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為「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注疏實無眾字。阮元，《重刊宋本論語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卷 15，頁 141。賈邊事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卷 30，〈詞翰書籍〉，頁 386。

然而自咸平五年（1002）始，宋廷的考題範圍就開始慢慢擴大。張知白（?-1028）指出當時科場中考題日益困難。考官出題越來越僻。考生為準備舉業，閱讀材料逐漸增多，學風也日求廣博。

今進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故就試者懼其題之不曉，詞之不明，惟恐其學之不博，記之不廣。是故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若使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於典籍之外，參以正史。至于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用。<sup>5</sup>

可見當時命題常「出於典籍之外」。究其因，實以舊有範圍題目已盡，故考官轉向「課外」範圍出題以維持考試難度。但這些「課外題」卻迫使考生不得不在原本的考試範圍外拼命獵取新知，造成就試者「懼其題之不曉，詞之不明，惟恐其學之不博，記之不廣」的心理。張知白據此要求考官需嚴格限制出題範圍，但實際上卻未見徹底實行。當時不論省試殿試，舉子因不知題意動輒「上請」詢問考官的狀況依然層出不窮，顯示考題寬泛的問題並未解決，而宋廷僅以於題目之外附「題解」或「原文」的方式幫助考生答題，似無縮減考題範圍之意。<sup>6</sup>

景祐五年（1038）知制誥李淑（1102-1159）又再次指出：「切見近日發解進士，多取別書、小說、古人文集，或移合經注以為題目，競務新奧。」可見考官出冷僻題、課外題的習慣不僅未改，還開始「移合經注」設計新式題目。而李淑除重申考官需遵守公定的出題範圍之外，又因應考官無題可出的窘況而要求增加《國語》、《荀子》、《文中子》三本書為新的出題範圍。<sup>7</sup>但直到神宗王安石變法之前，出題超越規定範圍的

<sup>5</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3，頁 1168-1169。

<sup>6</sup> 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廷認為上請有失大體，故於題目之外摹印題解，景祐元年（1034）又附出處原文發與考生。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頁 74-76。

<sup>7</sup> 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第 5 冊，〈選舉三·科舉條例〉，頁 4270-427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22，頁 2872。

情況仍未能有效控制。<sup>8</sup>

北宋前期寬泛的出題方式可由歷年題庫獲得檢證。〈表四〉記載太祖開寶六年（973）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間 35 次殿試的考題及其出處。於此一百年間，無論詩、賦、論，考題不僅出自儒家經典，實際上還包含歷史與諸子學說。在 94 道考題裡，40 題出於九經、17 題出自史籍，18 題出自諸子。因此，考題大抵一半出自九經，一半出於子史。九經雖為主要出題範圍，子史之重要性亦不遑多讓。故考生不能專攻經學，還需博讀子史方能中榜。在歷史方面，出題多自《史記》、《漢書》，但也有出自《戰國策》、《舊唐書》的冷門題目；諸子題曾出有揚雄《法言》、桓溫《鹽鐵論》以及董仲舒之〈對策〉，而又以道家學說最為熱門，在淳化三年（992）以前實居主流。淳化三年（992）後儒典題目雖漸漸增多，但道家典籍仍穩踞出題範圍中，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三道題目更全出自《老子》與道教典籍。道家之流行至少延續至神宗朝。熙寧二年（1069）蘇軾（1036-1101）言：「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sup>9</sup>而司馬光（1019-1086）亦言：「今之舉人，發言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sup>10</sup>兩人都指出，當時舉子的確喜讀道家學說。蓋其為出題趨勢，不得不然。但這同時也顯示，北宋前期的舉子若僅讀作為基本範圍的儒典，便難以中榜。如淳化三年（992）殿試。

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內出〈卮言日出賦〉、〈射不主皮詩〉、〈儒行論〉題。得孫何已下三百五十三人……時御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顧惶駭，閣筆不敢措

<sup>8</sup> 林岩即認為北宋前期（熙寧前）由於科舉出題範圍廣泛，導致士人需博學以應考，當時學風以「博觀泛覽」為主。《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頁 74-76。

<sup>9</sup> 蘇軾，《東坡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51，〈議學校貢舉狀〉，頁 5。

<sup>10</sup> 司馬光，《傳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42，〈論風俗箴子〉，頁 10。

詞。人教之上請，因相率叩殿檻，乞指示。帝初不為言。既所請再三，始為陳其大義焉。<sup>11</sup>

此場殿試詩題出自《詩經》、論題出自《禮記》，考生多能熟知。但賦題出自《莊子》卻無人能答。考生只能向皇帝「上請」，無疑坦白自己學識疏陋，極其丟臉。但更重要的是，「識題」直接決定考生是否中舉。宋廷曾明文規定，若「論、詩、賦不識題」，則不予考第，逕行黜落，考生若不了解題目出處，考試即等同失敗。<sup>12</sup>因此，在寬泛的考題範圍影響下，士人不得不博覽群書，舉業課程的份量亦自不輕。

## (二) 轉變期：熙寧至元豐至元祐。

神宗時，宋廷一反前朝之規定，考題範圍由寬變窄。王安石（1021-1086）的新政措施甚多，其中對考題範圍影響最巨者，即為詩賦考試的廢除及《三經新義》的公布。熙寧四年（1071）二月，宋廷公佈科舉新制：

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易經義。……今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論一首，次時務策三道。<sup>13</sup>

新制對考題範圍的衝擊，主要來自詩賦考試的廢止以及經義考試的實行。

<sup>11</sup> 「卮言日出賦」題出自《莊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射不主皮詩」題出自《儀禮·鄉射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或《論語·八佾》：「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儒行論」題出自《禮記·儒行》。

<sup>12</sup> 徐松，《宋會要輯稿》，第5冊，〈選舉三·科舉條例〉，頁4274。

<sup>13</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20，頁5334。

經義考試的考題範圍比詩賦考試少很多，新制中僅限七本儒經，也沒有子史題目，與北宋前期相較，士人的備考份量等於少去一半。而且，考生也不需要通讀七經，只需選讀一經為本經，外加《論語》、《孟子》即可。葉夢得（1077-1148）云：

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遍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爾，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

14

此外，由於過度重視經義，考官也很少設計史題或子題，史學和子書漸漸被排除於舉業課程之外，朱弁（?-1144）曰：「士趨時好……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讀者。」<sup>15</sup>總言之，宋廷實行新制，導致考題範圍受到縮減，考生只讀本經，閱讀習慣由博轉精。<sup>16</sup>

其次，在「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的綱領下，宋廷希望廢去雜亂繁多的舊注，並重新訂定統一的答案標準。新制廢止注重記憶力的「帖經」與「墨義」又強調答題「不須盡用注疏」，都是設立統一標準的準備措施。如神宗向王安石所言：「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具以頒行，使學者歸一。」<sup>17</sup>熙寧八年（1075），宋廷果採《三經新義》作為學生統一的學習內容，其後又提供《字說》為學習工具書。這項措施固然引來部分士大夫的不快，但統一的課程與學習工具意味著答案與答題方式的明確化，實際上能減少課程份量。《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

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為殘缺不可讀，廢其學，學者不得以應試。安石又與其子雱及其徒呂惠卿、撰定《詩》、《書》、《周禮》義，摹印頒天下，凡士子應試者，自一語

<sup>14</sup> 葉夢得，《石林燕語》，收入朱易安等編，《全宋筆記·第二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卷8，頁114。

<sup>15</sup> 朱弁，《曲洧舊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3，頁3。

<sup>16</sup> 有關經義取士對學風的影響，見《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頁141-151。

<sup>17</sup> 《宋會要輯稿》，第5冊，〈選舉十二·明經科〉，頁4473。

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學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第。<sup>18</sup>

可見由於考題答案大抵本於《新義》之說，故考生得以拋去舊有諸家注解，僅備一家之說應考。神宗朝的科場新制的確迫使考題範圍強力縮減。

### (三) 延續期：元祐更化（1086-1094）與紹聖之後（1094-1125）。

元祐更化，在舊黨執政下考題範圍一度大增，其因主要來自復行詩賦考試。元祐元年（1086）二月，侍御史劉摯（1030-1097）提議應行經義、詩賦兼考制，後得宋廷採納，並成為元祐期間考試制度之藍本。其議曰：

臣愚欲乞試法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前二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次。其解經義，仍許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弊，而適乎用；革貢舉之弊，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sup>19</sup>

而復行詩賦之目的，即為擴張考題範圍，提升考試難度：

詩、賦命題，雜出於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於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為題者，舉子皆能類聚，哀括其數，豫為義說，左右逢之。才十餘年，數榜之間，所在義題，往往相犯。<sup>20</sup>

<sup>18</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8，頁 9939。

<sup>19</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8，頁 8858-8859。

<sup>20</sup> 《文獻通考》則載「詩賦有聲律法度，故工拙易見，所從命題者廣，故寡重複。經義命題，不出此書，既可夙具，稍更數試，題多重出。」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第 1 冊，卷 31，〈舉士〉，頁 294-295。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8，頁 8859。

但如此一來，所有考生皆須通過經義、詩、賦、策、論五項考試。訓練項目之多，前所未有。此外，劉摯又提議「解經義，仍許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不但推翻神宗朝統一答案標準的作法，更放寬解釋之限。因此，在經、史、子無所不讀，標準答案不復存在的情況下，舉子的課程必然日趨博洽。

舊黨人士對於貢舉改革的細節意見不一，但大抵都希望考生能擺脫精而不博的學習風氣。<sup>21</sup>元祐元年三月，司馬光的〈請起科場劄子〉可謂最具代表性的意見。

司馬光言……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sup>22</sup>

首先，司馬光希望取消經義考試中以一經為本經的規定，要求學生備考時至少需修習三經以上。而且，若是考生學習的經數越多，考試分數就會越高：「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次，司馬光又建議策論的考題範圍應涵蓋歷史、諸子與時務：「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他認為前朝的考試制度讓「學者既不博觀群書，無修詞屬文之意」，所以他的規定便反其道而行，大增考題範圍，要考生「旁覽子史，不敢不博」<sup>23</sup>

司馬光和劉摯一樣，不贊成擁立特定注疏為標準答案的作法。他鼓勵學生在應考時要「引用古今諸儒之論及己見」，而答題時應該：「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對司馬光

<sup>21</sup> 有關元祐時期對科舉制度的爭論，見《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頁 154-168。

<sup>22</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71，頁 8976。

<sup>23</sup> 特別的是，元祐更化時唯一受到出題限制的學說只有道家。元祐二年，朝廷頒令曰：「自今舉人程試……考試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故自宋初以來，科場中好出道家考題的趨勢便暫時歇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4，頁 9593；卷 371，頁 8978。

而言，考生在解釋經典之前，應先博覽諸家說法，掌握注解異同，才有可能得出正確的解釋。為了反映學生的博學程度，考題範圍自然應該放寬。<sup>24</sup>

然至紹聖後新黨重掌朝政，經義、詩賦兼考制立遭廢棄，考題範圍再形縮減。宋廷首罷詩賦考試。《宋會要輯稿》曰：

紹聖元年（1094）五月四日，詔：「進士罷試詩賦，專治經術，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第一場試大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試中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子史時務策二道。」<sup>25</sup>

此後至北宋覆滅，詩賦考試未再復行。紹聖三年（1096），又止令考生專習一經，科場漸復熙寧制度。<sup>26</sup>此外，由於史學屬於「元祐學術」，又受到強力打壓。馬端臨總結曰：

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崇（崇寧，1102-1106）、觀（大觀，1107-1110）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荊舒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羣儉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真以為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sup>27</sup>

故科場中，歷史幾無出題可能，士人備考皆不顧之，導致歷史知識低落：政和（1111-1118）、宣和（1119-1125），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從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竦聽。惟公（金彥亨）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其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sup>28</sup>

<sup>24</sup> 持同樣意見者還有蘇轍：「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8，頁 9939；卷 374，頁 9060。

<sup>25</sup> 《宋會要輯稿》，第 5 冊，〈選舉三·科舉條例〉，頁 4289。

<sup>26</sup> 國子司業龔原上言曰：「將來科場，只令依舊專治一經。」《宋會要輯稿》，第 5 冊，〈選舉三·科舉條例〉，頁 4289。

<sup>27</sup> 馬端臨，《文獻通考》，第 1 冊，卷 31，〈舉士〉，頁 296。

<sup>28</sup> 周必大，《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46，〈跋金給事彥亨文集〉，頁 19。

可見史學水準已經降低，導致即使號為博學的狀元，亦未能具備相稱的歷史知識。

因此，紹聖之後，考題大抵由經書與諸子中出。經書解釋則惟《新義》是用，而諸子又以道家為首。元祐二年（1087），《老子》、《莊子》與《列子》三書原被禁止出題，至紹聖二年（1095）則詔除此禁。徽宗時蔡京當國行三舍法，由於徽宗愛好道教，政和七年（1117）又將《御注道德經》與《聖濟經》增入考題範圍。輕視史學，專用經、子，是紹聖後士人考題範圍的特色。<sup>29</sup>

#### （四）再興期：南宋初（1127-1180）

宋室南渡，首先採用元祐時期的科場規定，故考題範圍再次加大。

（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赦：「科舉之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才之士，何由而出？可自後舉，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庶學者近正。」

由文中可見，宋廷企圖採行經義、詩賦兼考制，應考進士科者必先通習經義、詩、賦、策、論五種考試項目。而經義考試又規定「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出己意」<sup>30</sup>，亦即承襲劉摯、司馬光等人的主張，目的即欲學生博學泛覽，由精轉博。

然而不到一年，宋廷立刻又修正考試制度，行經義、詩賦選考制。建炎二年（1128）：

定詩賦、經義取士，第一場詩賦各一首，習經義者本經義三道，《語》、《孟》各一道；第二場並論一道；第三場並策三道。殿試策如之。<sup>31</sup>

<sup>29</sup> 《宋會要輯稿》，第5冊，〈選舉三·科舉條例〉，頁4289。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110，〈選舉三〉，頁3668。

<sup>30</sup> 脫脫，《宋史》，卷156，〈選舉二〉，頁3628。

<sup>31</sup> 《宋史》，卷156，〈選舉二〉，頁3625。

經義、詩賦選考制似乎是一種調和性的制度。它將經義和詩賦設為選考，而論、策設為必考。所以它和經義詩賦兼考制相同，保留了經義、詩、賦、策、論五種考試項目，但又容許考生在經義與詩賦之間二擇。此後，經義、詩賦選考制一直是南宋考試制度的基本結構。<sup>32</sup>

在經義詩賦選考制之下，根據選考項目的不同，考題範圍也會有差異。如果考生選考詩賦，那麼考題範圍就相當寬泛。俞成（約淳熙時人）指出，當時「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遍知」，所以他提議題目需加註出處，否則考生根本無法作答。<sup>33</sup>如果考生選考經義，就可以專意研讀經典，考題範圍可能比較狹隘。然而，無論考生選考經義或是詩賦，都無法避考策、論。北宋的論考範圍大抵「許於經、史、子通出。」<sup>34</sup>，但至南宋，名人文集也可能出題，可說經、史、子、集四種領域無所不考。<sup>35</sup>策考的範圍在北宋主要來自經、史、子以及時務。<sup>36</sup>但寧宗嘉泰元年（1201）的政府命令更顯示，南宋策試的考題常常涉及一般考生根本無法知悉的政府檔案，導致考試競爭不公。如果考生無法掌握這些檔案，考試成績就會大幅下降。

《國史》、《實錄》等書禁民私藏，惟公卿子弟因父兄得以竊窺，冒禁傳寫，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為策問，寒士無絲盡知。<sup>37</sup>

可見南宋的考題範圍之寬泛，實不在元祐時期之下。

考題範圍對考生備考的方式影響甚鉅。由於識題是答題的首要條件，若考生不知題目出處，文筆再好也無用武之地。因此在考題範圍過寬，

<sup>32</sup> 南宋於紹興十三年（1143）與紹興二十九年（1159）曾復行經義詩賦兼考制，但至紹興三十一年（1161）後，便再無更動。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對南宋科考制度的變革過程記載簡明，可以參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上冊，卷13，〈四科〉，頁261。

<sup>33</sup> 俞成，《螢雪叢說》（臺北：藝文出版社，1965），卷1，〈注題目出處〉，頁7。

<sup>34</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66，頁11128。

<sup>35</sup> 譬如韓愈的《文集》曾於紹興八年列入考試範圍。《宋會要輯稿》：「（紹興）八年五月十二日，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牾於聖人之道者，並許出題。』從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請也。」《宋會要輯稿》，第5冊，〈選舉四·舉士十〉，頁4303。

<sup>36</sup> 《宋會要輯稿》，第5冊，〈選舉三·科舉條例〉，頁4273。

<sup>37</sup> 《宋史》，卷156，〈選舉二〉，頁3635。

題目難測的情況下，考生無不博覽眾書，廣搜題庫。南宋的舉業名師真德秀（1178-1235）便曾告誡舉子，考試必以博聞多學應之，方有中舉希望。

西山先生曰：「……不可測者，如宣和間順州〈進枸杞表〉，固非場屋中出，萬一試日或遇此題，平時不知枸杞為何物，焉能作靈根夜吠之語哉？須燈窗之暇，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如《初學記》、《六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廣博搜覽，多為之備。」<sup>38</sup>

然而，博覽群書雖為不二法門，但博學實非一日之功。究竟該如何以最少的時間獲取大量的知識？以下將分析呂祖謙的舉業課程。吾人會發現，呂祖謙主要透過三種方式提升學習效率，幫助學生備考。

## 二、呂祖謙的備考方式

呂祖謙提供考生三種訓練方式。第一、培養博覽群書的習慣；第二、刪節閱讀材料以增加閱讀時間；第三、善用分類增進閱讀效率。

### （一）博覽群書的習慣

從元祐更化之後，呂氏家族就致力於培育博學的學風。呂公著（1018-1089）是呂祖謙的五世祖，他同時也是司馬光的首要支持者。司馬光去世後，貫徹司馬光遺志的人正是呂公著。元祐二年（1087）時呂公著公佈與司馬光構想相同的命令，反對一家之說，並視博學為學者要務。<sup>39</sup>巧妙的是，當時呂氏家族似乎也配合政策的轉向，開始發展「不

<sup>38</sup> 王應麟，《玉海》，（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據清光緒九年（1883）浙江書局刊本影印），卷 203，〈辭學指南〉，頁 3706。

<sup>39</sup> 呂公著也是第一個列入《宋元學案》的呂氏成員。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 1 冊，卷 19，〈范呂諸儒學案〉，頁 787-789。《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4，頁 9593。

主一門，不私一說」的學術立場。呂公著的兒子呂希哲及曾孫呂本中（1084-1145）皆以此立場著稱。他們不願固守一家之說，而是企圖博綜諸儒觀點。呂氏家學的學習方式適合應付考題範圍寬泛的考場環境，呂祖謙「博學鴻辭」科的頭銜就是最好的證明。呂祖謙進一步將家學應用在舉業教學上。<sup>40</sup>

在南宋，呂祖謙教授的課程素以「博雜」聞名。此評價見仁見智：有人正面稱讚他是「博覽強記」，但也有人批評他的教法不過是「誦書徒多」。<sup>41</sup>淳熙三年（1176），朱熹（1130-1200）和呂祖謙曾通信討論課程內容。兩人意見相左，但也突顯呂祖謙博雜的課程特色。

在信中，呂祖謙主張「兼看經史」，並提議朱熹採用相同方式。然而，朱熹雖承認兼講經史的課程有其優點，因為「史書鬧熱、經書冷淡」，課程比較吸引人，容易招攬學生。但朱熹卻只想教授四書五經，因為他認為兼講史學將使學生負擔過重：「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史）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sup>42</sup>朱熹希望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首先應該專精研讀經典，其他領域的學問僅居次要地位。

呂祖謙的想法與朱熹不同。呂氏的學生大多是考生，所以他比較希望學生博覽眾書，吸收各種領域的知識，才有可能中舉。因此，他偏好設計豐富的課程。他認為一個恰到好處的課程，應該是經學、史學、文

<sup>40</sup> 呂希哲向諸儒求學，其中還包括王安石。朱熹，《伊洛淵源錄》，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0冊，卷7，〈呂侍講家傳略〉，頁1009。

<sup>41</sup> 「誦書徒多」是來自陳葵（1139-1194）的意見。此外，陳氏也批評朱熹的教學「修方不療」。陳氏是處州士人，正好位於婺、溫、建三州之間，所以他可能對三地教師的教學特色都有瞭解。陳氏後來選擇投入溫州魏謙光（字益之，平陽縣人）門下。見黃宗羲，《宋元學案》，第3冊，卷61，〈徐陳諸儒學案〉，頁1970。葉適，《水心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第2冊，卷17〈陳叔向墓誌銘〉，頁6。

<sup>42</sup> 朱熹對史學帶有一點輕蔑感。《朱子語類》載：「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這可能也是朱熹當時不願教授史學的原因。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18冊，卷123，〈陳君舉〉，頁3871。

學三者皆具，最好每天「一經一史為常課，而以詩文之類為餘課。」<sup>43</sup>在經學方面，他要求學生要深入鑽研經學：「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sup>44</sup>此外，學生不能只讀經文，廢棄傳注，最好遍讀各家解釋：「後生於傳注中，須是字字參考始得。」<sup>45</sup>；經文不能草草閱過而是要「逐字讀」。他的規定至少與朱熹的要求一樣嚴格。呂祖謙的史學要求也很高。他希望學生能「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sup>46</sup>也就是說，學生應該要通貫瞭解從春秋至宋代的各朝歷史。這意味著學生至少要閱畢《左傳》、《國語》及十七史，份量甚鉅。同時，呂祖謙也教授當代史，記載中他至少講解過六本宋代《實錄》的閱讀方法。他的史學課程多樣化而富有挑戰性。最後，除了經史研讀外，呂祖謙也指導時文寫作。學生需要觀摩各家文體，並接受十天一次的模擬考試。<sup>47</sup>如果學生是應屆考生，呂祖謙還會特別加強他的作文課程。向他求學的舉子在考前要用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時間，每天專門練習試文。<sup>48</sup>他設計的課程能向學生灌輸大量知識，也有利考試，但有時容易造成學生吸收不良。有些學生便說：「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朱熹則批評呂氏的課程說：「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sup>49</sup>

呂祖謙的課程對弟弟呂祖儉的影響最大。呂祖儉自幼受業其兄，自

<sup>43</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第1冊，卷10，〈與內弟曾德寬〉，頁503。

<sup>44</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外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5，〈雜說〉，頁715。

<sup>45</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外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5，〈己亥秋所記〉，頁729。

<sup>46</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外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5，〈雜說〉，頁715。

<sup>47</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7，〈與朱侍講〉，頁398。

<sup>48</sup> 朱熹的長子朱塾（1153-1191）曾於乾道九年（1173）至十年間跟隨呂祖謙訓練舉業。當時呂祖謙就要求他，在應考前的一年內，至少要花2至3個月練習寫作試文。這種過程又被稱為「專整頓」。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8〈與朱侍講〉，頁415。

<sup>49</sup>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頁3850-3851。

然也繼承博覽眾書的習慣，故呂祖謙曾笑稱其為「書癡」。<sup>50</sup>朱熹對呂氏兄弟的學習方式很不以為然，曾經寫信告誡呂祖儉說：「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又批評他「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眾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sup>51</sup>但呂祖儉從來沒有改變自己的治學風格，他一直堅持呂祖謙的教法，因此「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當呂祖儉去世時，朱熹只能感嘆地說：「子約一生辛苦讀書。」<sup>52</sup>

呂祖謙的學生們受到的影響更明顯，他們不但喜愛大量讀書，也對寫作作文情有獨鍾。朱熹寫信批評呂氏的學生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又統言曰：「婺州朋友專事聞見」、「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有時也批評他們的文章如同試文，「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對朱熹而言，只追求博閱群書就是舉子的特徵，「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而呂氏的學生簡直就如同一群考前閉門苦讀、拼命練習試文的考生。<sup>53</sup>而當呂祖謙晚年病弱時，很可能也是呂祖儉與其他學生接下了舉業教學的棒子。<sup>54</sup>

在考題寬泛的環境下，博覽眾書可能是南宋士人普遍的舉業訓練方

<sup>50</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9，〈與周丞相子充〉，頁451。

<sup>51</sup> 兩封信皆書於乾道九年（117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2冊，卷47，頁2165-2166。

<sup>52</sup>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7，頁2202。《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頁3857。

<sup>53</sup> 又如論呂氏弟子鞏豐（1148-1217）之奏議中，字句「頗似舉子文」。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6，頁2142；卷47，〈答呂子約〉，頁2193；卷49，〈答陳虜仲〉，頁2268；卷48，〈答呂子約〉，頁2207；卷58，〈答宋容之〉，頁2775。卷64，〈答鞏仲至〉，頁3102。

<sup>54</sup> 實際上，在呂祖謙晚年時，朱熹的兒子朱塾的舉業訓練很有可能正是由呂祖儉與其他學生負責。所以呂祖謙在淳熙六年（1179）時曾說：「時文卻不曾與人看。受之（朱塾字）在此受課，亦只是舍弟輩為之點檢也。」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8，〈與朱侍講元晦〉，頁434。

式之一。像是溫州士人林淵叔（1144-1195），備考期間不只修習選考的本經，更日課經、史、文學，所習課程頗重，「不專習舉子一經，日自為程，以若干晷課某經，又若干晷課某史，而後誦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掇取其說，間出己意。」<sup>55</sup>另一位福州的朱姓舉子一天要讀八種不同書籍，閱讀量更大，朱熹曾希望他放棄這種讀書方式：「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sup>56</sup>然而，朱熹雖用意良善但卻很難說服士人。因為在南宋考題範圍難測的情況下，士人備考「惟以多求劇讀為功。」<sup>57</sup>朱熹「貴專而不貴博」的要求實與科場趨勢相違抗。

博覽眾書只是一種基本的備考方式。舉子的時間寶貴，必須在短暫時間內吸取大量知識並應用於寫作。紹興十八年（1148），一位鄭姓舉子在準備舉業時，就完全沒有時間閱讀試文範本以外的材料，汪應辰形容他：「急於應舉，惟是夙夕誦舉子試中之文不輟，模倣馳逐，庶幾及之。姑無望其如漢儒之明經，雖諸子歷代史亦不暇涉獵之矣。」<sup>58</sup>呂祖謙則透過兩種方式幫助學生增進閱讀效率，其一是「刪節」閱讀材料，其二是善用「分類」。

## （二）刪節

考生需要閱讀的書籍數量龐大，應該如何增進備考的效率？呂祖謙教導考生，最有效的備考方式莫過於「刪節」。也就是說，考生應當在

<sup>55</sup> 陳傅良，《止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49，〈林懿仲墓誌銘〉，頁11。

<sup>56</sup>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0，〈答朱朋孫〉，頁2870。

<sup>57</sup>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6，〈答潘叔昌〉，頁2142。

<sup>58</sup> 汪應辰，《文定集附拾遺》（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卷9，〈送鄭允升序〉，頁99。

閱讀前，便先將書中與考試無關的部份刪去，以此增加閱讀效率。在宋代，經過刪節處理的書籍被稱為「節書」。

透過「節書」的幫助，學生在研讀巨著時可以省下大量時間。譬如，司馬光《資治通鑑》是無人不曉的史學名著，然而要將《通鑑》閱畢卻絕非易事，故呂祖謙曾曰：「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採，若不能採，不過博聞強記而已。」<sup>59</sup>所以南宋考生在備考時便利用節書去其雜蕪。樓鑰（1137-1213）即曰：「《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自言精力盡於此書，而士夫鮮有能遍讀者。始則以科舉而求簡便，世所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一本好的節書能將「繁辭細故，悉刪去之」，對考生幫助頗大。<sup>60</sup>但南宋的節書品質不一，故俞成抱怨說：

今之節書甚亡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說，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為，如何使人易於檢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sup>61</sup>

呂祖謙的《十七史詳節》是南宋節書中少有的傑作。呂祖謙曾曰：「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sup>62</sup>他希望學生治史必須首尾該貫，但他也明白通讀史書並不容易，《十七史詳節》就是為克服閱讀材料過多的問題而設計的作品。它將十七部正史精簡裁制，成為應付史學最有效的一套考試用書。<sup>63</sup>

《十七史詳節》究竟能為考試帶來多少效益？十七史總卷數高達1574卷。對一般考生而言，想在有限時間內將諸史閱讀完畢有相當難度。

<sup>59</sup> 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第2冊，卷8，〈門人集錄史說〉，頁218。

<sup>60</sup> 樓鑰，《攻媿集·拾遺》（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第5冊，〈通鑑總類序〉，頁3。

<sup>61</sup> 俞成，《螢雪叢說》，卷1〈文字節要〉，頁8。

<sup>62</sup>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5，〈雜說〉，頁715。

<sup>63</sup> 在南宋，十七史指《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等正史

北宋末期考試不出史題，史學知識粗淺亦可應考。然而南宋考題範圍擴大，閱讀史籍勢必難免。《詳節》能夠解決考生的困境。它將十七史輕量化，保存重要的內容，節本的份量遠較原本為少。譬如，《史記》卷數原為 130 卷，但《詳節》將其縮為 20 卷，僅原本 15.3%。《史記》若未加注疏，內文仍超過四十六萬八千餘字，而《詳節》即使包含註釋也只有十四萬五千餘字，僅為原本 30%。換句話說，如果一位學生需要十個月才能完成研讀原本《史記》，那麼利用《詳節》，閱讀時間能縮短為三個月。同時，這也代表學生對考題的掌握會更好，因為他有三倍的時間能熟記重點。「刪節」對考生的價值不言而喻。總體而言，十七史卷軼浩繁共 1574 卷，但《十七史詳節》只有 273 卷，僅佔原份量的 17.3%，考生研讀歷史的時間能夠縮短為五分之一。

呂祖謙設計的節書幫助舉子在最短時間中吸取最多知識。如果比照朱熹的《學校貢舉私議》會發現，在朱熹的規劃中，舉子應以 12 年的時間將秦漢至宋的各種史書研讀完畢。朱熹希望學生將讀書當作長久工夫，而不是囫圇吞棗地在一次考試中讀畢所有資料。<sup>64</sup>然而，呂祖謙的想法顯然不同。他的節書能讓考生以大約兩年半的時間就能通讀十七史，正好趕上三年一度的考試。呂祖謙並未提出改造科舉制度的規劃，而是試圖適應體制，讓考生在現有條件下表現更好。

### (三) 分類

呂祖謙教導舉子另一項的備考方式是善用「分類」。也就是改變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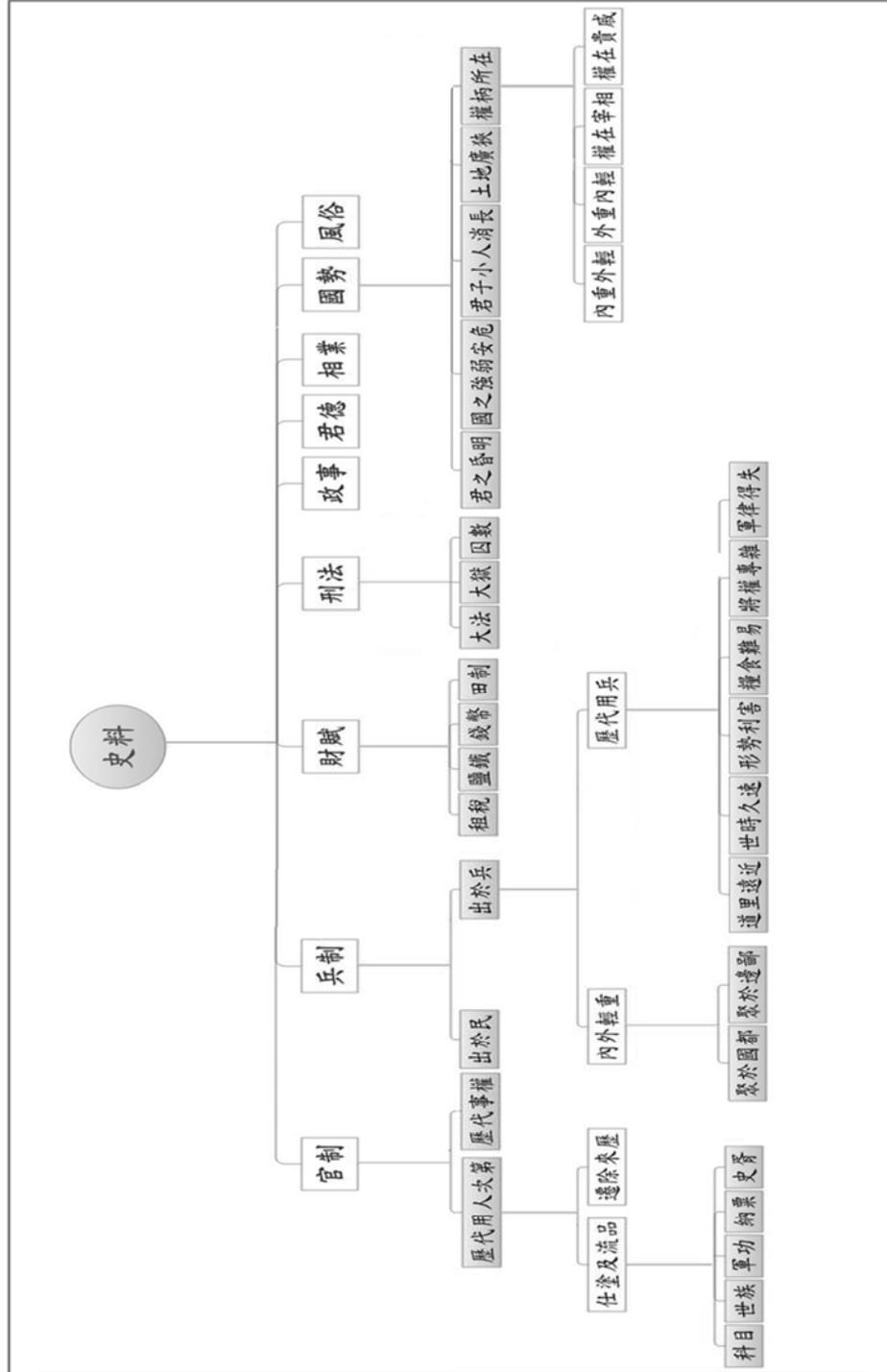
<sup>64</sup> 在朱熹的規劃中，每一年的考試範圍都應該被強力限縮。考生在每一次的考試中，只需要閱讀部分的書籍就能應考，而不需要囫圇吞棗地閱讀過所有書籍。如果不幸落榜，那麼他在下一次的考試中需要閱讀的則是全新的範圍，如果當他應考四次之後，他還完成了完整的學術訓練。朱熹的規劃似乎可視為對考試範圍嚴重擴張情況的一種解決方法，但很明顯地，他傾向直接改造制度。呂祖謙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反而試圖適應宋廷的制度，希望幫助考生在最短時間內吸收最多的知識。見 Hilde de Weerd, "Changing Minds through Examinations: Examination Cr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6.3 (2006):369-372.

讀材料原本的排列方式，代之以新的分類方式。這種經過分類重整的書籍，就被稱為「類書」。類書和節書相似，是因應科舉而產生的一種學習工具，岳珂（1183-?）指出：「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為先，故凡編類條目、撮載綱要之書，稍可以便檢閱者，今汗牛充棟矣」，書商因此常販售類書供舉子使用。<sup>65</sup>然而，呂祖謙不僅教導學生使用類書。他在〈讀史綱目〉一文中，更教導學生如何在閱讀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分類。

〈讀史綱目〉是一篇示範性的文章，目的在教導一種更有效率的史料分類方法。首先，呂祖謙建議學生為史料建立數種基本分類，他在〈綱目〉中舉出九種分類作為示範：官制、兵制、財賦、刑法、政事、君德、相業、國勢、風俗。其次，學生在基本分類下再分立數項細目。譬如，在〈國勢〉之下，可分為六項子目：「君之昏明、國之強弱安危、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土地之廣狹、戶口之多少、權柄所在。」最後，在「權柄所在」之下，又可分為四項子目：「內重外輕、外重內輕、權在宰相、在貴戚。」呂祖謙也特別提醒學生不可混淆每種分類之間的差別。由〈圖一〉可以發現，〈讀史綱目〉展示的是一種樹狀式的檔案整理系統。

---

<sup>65</sup> 岳珂，《愧郈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9，〈場屋編類之書〉，頁12-13。



樹狀系統能增進讀者檢索與背誦的效率。它解散史籍的舊有結構，配合讀者需求重新組織內容。它將散亂的內容變得系統化，讀者檢閱速度故為之提升。此外，由於同類型的資料大多匯聚於一處，學生不僅易於比較史料也更容易背誦。學生只要稍加變化，大多數的閱讀材料都能應用樹狀系統進行分類。呂祖謙編有五本類書，每一本主題都不同，但基本上都運用〈讀史綱目〉的分類方式。<sup>66</sup>這些分類對考試寫作也有相當助益，《左傳類編》和《東萊博議》能幫助吾人釐清類書與寫作的關係。

《東萊博議》是一本時文範本集，作於乾道四年（1168），當時呂祖謙剛開始教授舉業，但缺乏試文範本，所以他自言此書「為諸生課試所作」。《博議》由 168 篇時文組成，題目都出自《左傳》，所以它也被稱作《左氏博議》。《博議》不但自呂祖謙在世時就已備受歡迎，直到今日都是架上的作文參考書。<sup>67</sup>相反地，《左氏類編》這本類書很少受到注意，它的著作年代不詳，但很有可能比《東萊博議》更早。《左氏類編》刊刻於 13 世紀，在此之前，它與它的分類系統一直留在婺州由呂氏的學生們所獨佔，它的價值也很少被外人理解。<sup>68</sup>但實際上，《左氏類編》可能是《東萊博議》的基礎，它具有幫助考生寫作試文的功能。

<sup>66</sup> 呂祖謙的第一本類書是《觀史類編》。此書最早出版，所以結構也最簡單，只有六個分類。第二本類書是《詩律武庫》，它包含十九個分類，專門收集詩句，是一本應付詩賦考試的備考書籍。第三本類書是《歷代制度詳說》，有十五個分類。《四庫全書總目》曰：「蓋采輯事類，以備答策，本家塾私課之本」，所以《制度詳說》是專門用來答策的考試用書，主要行於元代。泰定三年（1326）時，彭飛就指出，元代「科復策興，書肆版而行之。」《制度詳說》又受到學生重視。第四本類書是《兩漢精華》，它針對《漢書》與《後漢書》進行分類，應用了十四個分類。最後一本類書是《左傳類編》，它專門整理《春秋左氏傳》，有十九個分類。這五本類書中，除了《觀史類編》已經亡失，大多應用樹狀式的分類方式。

<sup>67</sup> 今日出版之《東萊博議》，依筆者可見者，有民國八十年李振興的《新譯東萊博議》（臺北：三民書局，1991）；民國八十七年馮作民的《白話東萊博議》（臺北：星光出版社，1998）；民國九十一年吳紹志的《新注新譯東萊博議》（臺北：世一出版社，2002）；民國 98 年李振興的《新譯東萊博議》再版。可見《東萊博議》在今日古典作文範本的市場中仍佔有一席之地。

<sup>68</sup> 據詹義民言，此書刊行於嘉定三年（1210）。呂氏的學生們對這本書一定相當熟悉。《宋史·藝文志》中記載呂氏門人後來又編了一本《左氏國語類編》，明顯是《左氏類編》的續作。詹義民，〈歐公本末跋〉，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9 冊，頁 395。《宋史》，卷 155，〈藝文志〉，頁 5064。

《東萊博議》中有一篇時文名曰〈隱公問族於眾仲〉。它是一篇論文，旨在證明「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呂氏的論點看似違反常識。按常理言，古事久遠故難於考索，今事近身則詳而易知，為甚麼呂祖謙認為春秋時代的氏族反而比宋代更容易瞭解呢？呂氏的觀點啟人疑竇，也顛覆考官過去的看法，故能成功引起考官的注意。在文中，呂祖謙又進一步加強考官對古代氏族舊有的看法。

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有以先氏之諡為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為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枝分派別，千塗萬轍。<sup>69</sup>

照呂氏所言，古代的氏族複雜。父字、諡名、官名、邑名都是氏姓來源，本就難以瞭解，考官的看法應該是正確的，文章的論點似乎無法成立。然而，呂氏筆鋒一轉立刻證明，實際上想釐清古代氏族的資訊並不困難。

（氏族）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

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

游、國、豐、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

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

樂、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

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sup>70</sup>

在文中，呂祖謙將魯、鄭、宋、齊四國的氏名清楚地在考官面前一一條列。透過這種排比與列舉的筆法，呂祖謙試圖展示，古代氏族雖然混亂，但是他卻有能力將「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的史料，整理成「有綱有條，猶如指掌焉」的知識。最後呂氏下結論說：「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以此證明文章的論點。

<sup>69</sup> 呂祖謙，《左氏博議》，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6冊，卷2，〈隱公問族於眾仲〉，頁52-53。

<sup>70</sup> 呂祖謙，《左氏博議》，卷2，〈隱公問族於眾仲〉，頁53。

〈隱公問族於眾仲〉展示了深思熟慮的寫作策略。首先，作者先用悖理的論點引起考官注意，接著又讓考官堅信自己舊有的常識，最後再回頭推翻考官的觀點，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對考生來說，獲得考官青睞也許是最重要的目的。其次，作者不僅僅滿足於向考官證明一項奇特的論點，他還試圖在推論過程中展現他整理史料的優異能力。淳化元年（990）出版的《左傳》，內文合其注疏超過一百萬字，在典籍中最稱浩繁。<sup>71</sup> 何況各國氏族記載散見書中，要在大量史料中彙整各種散亂資訊並不容易。因此，考官對作者博學強記的能力自然讚嘆有加。

但考官不瞭解，實際上，透過類書，這些複雜的氏姓早已被整理的「猶如指掌」，並記載於《左傳類編》的〈氏族〉類之中。〈氏族〉是《左傳類編》十九個分類之一，它記載春秋諸國氏族，並附加其年份出處。以鄭、齊、魯三國為例。

鄭，子人氏弟語之後，見桓十四；洩氏洩駕見隱五年；孔氏孔叔，僖五年；七穆……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

齊，鮑氏鮑叔牙，見莊八年；高氏高傒，見莊九年；陳氏陳公子，完莊二十二年入齊；國氏見僖十二年……；崔氏崔杼，見宣十；慶氏慶克，成十七年。

魯，季孫氏……見莊二十五年；孟孫氏……見莊二年；叔孫氏……見莊三十二年；臧孫氏……見隱五；東門氏公子遂，僖二十六；叔仲氏叔仲惠伯，文七。<sup>72</sup>

此外尚有晉、宋、衛、楚數國之氏族，使用者只要挑選所需氏名便可應用於文章之中。分類因此能幫助考生快速整理閱讀資料中龐大的資訊，並應用於寫作之中，進而向考官展現自我能力。

<sup>71</sup> 宋國子監刻本《春秋經傳集解》共 36 萬字，《春秋左傳正義》約 68 萬字。阮元，《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卷 61，〈後序〉，頁 1064。

<sup>72</sup> 呂祖謙，《左傳類編·氏族》，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6 冊，頁 146-147。

### 三、小結

本章追索考題範圍從北宋至南宋初的寬窄變化，指出在不同時期，舉業課程的份量亦有不同。北宋初期考題範圍似無界線，士人備考務求博學；神宗變法，士人得專精一家之說；元祐更化雖一度擴張考題範圍，紹聖後又漸趨狹窄，士人備考以經、子為主，史學旁落。南宋考制類於元祐而考題範圍亦堪等之。在南宋考題範圍寬泛的情況下，呂祖謙設計了豐富的課程，希望學生能廣博地涉獵經學、史學、文學各種領域的知識，同時又透過刪節與分類，增進學生的閱讀效率。這些作法都是適應南宋科場趨勢而發展出來的學習方式。他比較傾向順從科場規則而非改造之。然而所謂「博學」、「刪節」與「分類」，都只是考試訓練的一環，似無培養士人道德品行的功能。為甚麼呂祖謙作為一知名道學家要從事考試教學呢？下一章將試圖考察呂氏從事舉業教學的原因。吾人從中可以發現，呂祖謙的舉業教學不止是他個人維生的工具，更與道學的發展及推廣息息相關。



## 第四章 為何而教？舉業教學的目的

在第三章，吾人提及呂祖謙（1137-1181）教導學生如何應付日益擴大的考題範圍，並更有效率地準備科舉考試。然而，諸如「刪節」或是「分類」等技術，其最終目的皆在增加考生通過科舉的機會，和南宋（1127-1279）道學家向來倡導的德行教育似乎沒有太大關係。呂祖謙亦云：「舉業乃至細至末事，須別得輕重分明乃善。」<sup>1</sup>這就意味著，他始終將德行培養與實踐看得比準備考試更為重要。那麼，他為何還要花時間教導舉業？南宋道學家對科舉大抵批評多於肯定，對於從事舉業也抱持著謹慎小心的態度。其中一些主要的學術人物如朱熹（1130-1200）、張栻（1134-1181）或是陸九淵（1139-1192），不是很少指導舉業，就是根本未曾插手考試教學。對他們而言，學生專為考試學習無疑是捨本逐末。為甚麼作為一名著名的道學家，呂祖謙反而致力教導學生考試的技巧呢？「為何而教」，本章旨在發掘呂祖謙從事舉業教學的各種目的。

### 一、推廣學術

在科舉社會中，教授舉業是許多士人賴以維生的方式。大部分的情況下，舉業教學的主要目的大抵都是為了維生。例如婺州義烏縣的姚獻可（?-1196）就是相當典型的舉業教師。他是一個長年投考失敗的士人，讀書甚勤卻逾二十年未得功名，因此生活極貧，「應科場，學習詞賦銳甚，……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鹽醢。」<sup>2</sup>對姚氏而言，利用平日所學賺取溫飽是最合理的方式，而維生則是他教舉業唯一的目的。同樣的情況似乎也適用於呂祖謙。呂氏雖然來自一個著名的官僚家族，但

<sup>1</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10，〈答潘叔度〉，頁494。

<sup>2</sup> 葉適，《水心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第2冊，卷14，〈姚君俞墓誌銘〉，頁12-13。

生活並不富裕。呂氏家族在北宋（960-1127）覆滅之際只能攜帶一些寶貴的文獻倉促南渡，無法保留其世代累積的資產。淳熙三年至八年（1176-1181）間，從呂祖謙寫給周必大的一系列信件的内容就能發現，祠祿是呂家的重要經濟來源。<sup>3</sup>而且，直到淳熙六年（1179）前，呂家一直是在婺州「佃廢地為居」，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子。<sup>4</sup>呂家似乎未能在婺州厚植物產以作為經濟來源。因此舉業教學也許是呂祖謙的重要收入之一。

但是，呂祖謙的舉業教學並不僅僅是一種餬口的手段而已，因為他從來沒有將舉業當成主要課程，這使他與一般的舉業教師區別開來。據呂氏自稱，以考試為導向的課程只佔他全部課程的十分之一；他將大部分的心力都放在士人的德行培養上。這顯示，他並不想利用舉業牟取利益。那麼，為甚麼呂祖謙要採用這種混合式的教學型態呢？我認為與他在推廣學術時遭遇的困境有關。

在 12 世紀的南宋，道學仍然處於尋找信徒的推廣階段。道學家們不斷的推廣努力，使它的教義在 12 世紀至 13 世紀初之間在南方擴散。它的跟隨者則遍佈浙江、江西與福建，甚至遠及至四川、湖南與湖北。<sup>5</sup>在宋末，道學甚至突破國家的藩籬進入北方的金朝。<sup>6</sup>然而，由於道學尚未取得官方認可的正統地位，推廣仍遭遇到不少困難。

所有南宋的道學大師都面臨一項問題：許多士人缺乏學習道學著作的動因。首先，道學與舉業訓練的聯繫通常隨著朝廷當權者的好惡而時強時弱。南宋初，趙鼎（1085-1147）主政時道學曾一度抬頭，考生研讀道學的機會自然大增。但自秦檜（1090-1155）掌權，道學著作又一度被

<sup>3</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9，〈與周丞相子充〉，頁 444-450。

<sup>4</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 冊，卷 1，〈年譜〉，頁 748。

<sup>5</sup> 劉子健曾指出，道學家推廣的方式大抵有，一、投身建立地方福利機構，二、在各地建立先賢祠，三、建設學校或重振書院，四、投身於教育。種種努力皆使道學吸收不少信徒。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 126-129。

<sup>6</sup> 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收入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二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頁 217-224。

禁，士人自無研讀之必要。<sup>7</sup>此後直至 13 世紀之前，宋廷始終未曾明令以道學為科場出題的標準內容。因此，道學既非常時具備科舉必考的特性，道學大師們的著作亦非考生所必讀。在與科舉脫鉤的情況下，欲備考作官的士人研讀道學便偏離了利祿之道，無疑使考生對道學喪失不少興趣。如林之奇（1112-1176）所言，世俗士人之所以學，目的大抵皆為謀求利祿：

諺有之曰：「世無科舉，人不教子；朝無利祿，士不讀書。」……此言疑厚誣天下之人，然而亦非過論也。今父兄之所以教，與子弟之所以學，雖不皆為科舉，而其本心豈有不由科舉利祿而來乎？

8

既然道學無法為士人獲取官位與利祿，那又有多少士人可能研讀道學的著作呢？

此外，北宋至南宋，參與科舉考試的士人有增無減，考生可說是道學家面對的主要聽眾。<sup>9</sup>許多考生的價值觀卻與其有相當落差。<sup>10</sup>對於以儒為職的士人來說，官位與俸祿是維持社會地位與家計的重要因素之一。通過科舉考試常可說是許多士人的首要任務，而考試結果也往往成為衡量士人是否成功的主要標準。這種價值首先反映在一般人的教育觀中，呂祖謙說：

或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緣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sup>11</sup>

<sup>7</sup> 黃寬重，〈秦檜與文字獄〉，《大陸雜誌》86.6(1993):13-22。

<sup>8</sup> 林之奇，《拙齋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9，〈答黃晦叔仙尉〉，頁 6。

<sup>9</sup> 據賈志揚的估計，宋代參與考試的人數從十一世紀初的二萬至三萬人，增加至十三世紀中葉的四十萬人。考生的數量幾乎成長了近二十倍。這些考試參與者是理學家推廣理念時無法迴避的重要群體。賈志揚，《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56-58。

<sup>10</sup> 關於科舉社會中的價值觀，見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頁 340-345。

<sup>11</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外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 冊，卷 5，〈門人周公謹所記〉，頁 723。

可見在官位第一的價值觀中，宋人教育子弟首重考試攻略而忽略德行培養，所謂「恭謹」、「不輕忽」、「不躐等」等等教養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而且，不僅學生一心一意準備考試，其父母長輩也視之為理所當然。以考試為重的觀念世代相傳變得根深蒂固。

然而，為考試而學習正是眾多學者大力批評的現象。陸九淵的〈白鹿洞書院講義〉便極力倡言士人之終極目標應以「成聖成賢」為志向，而非計較考試成敗，此或可視為道學家之一貫立場。

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sup>12</sup>

陸九淵及其他道學家並非全盤否定科舉，反而承認士人參加考試是為一必經過程：「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而，他們平時之言行卻常常使他人產生理學與舉業之間水火不容的印象。陸九淵本人經常貶低考試文章，甚至以「闕時文」而聞名士林。<sup>13</sup>朱熹則曾說出「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如此激烈的批評，以致前來向他就學的士人黃謙以為，跟隨朱熹就代表他必須放棄舉業。《朱子語類》記載：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sup>14</sup>

朱熹的回答相當開明。至少，他認為在妥善分配時間的情況下，士人同

<sup>12</sup> 持同樣立場者如張栻，其曰：「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為準。」張栻，《南軒集》（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第2冊，卷19，〈寄周子充尚書〉，頁7。陸九淵，《象山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23，〈白鹿洞書院論語講義〉，頁275-276。

<sup>13</sup> 陸九淵，《象山集》，卷34，〈語錄上〉，頁408。

<sup>14</sup>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4冊，卷13，〈學七·力行〉，頁416。

時準備舉業與研讀道學著作並不是不可能。但黃謙的舉動卻顯示，對一些人來說，舉業與道學之間的確存在著非此則彼的選擇。<sup>15</sup> 有些士人甚至回頭譏笑道學的跟隨者在科場必定失敗，這也使不少人對道學望之卻步。呂祖謙在弟子李誠之（1152-1221）鄉試奪魁時就曾提到：

李茂欽作魁，大可喜。年來為學有意鄉嚮者，多為儕輩笑侮，往往不能自立，因此可稍強其志氣。雖學不待外，然就渠地步上說，則殊有補爾。又可使世俗知本份為學者初不與科舉相妨，所繫殊不小也。<sup>16</sup>

上文透露出一項很重要的事實：道學的追隨者實際上仍面對著一定的世俗壓力，即使他們「有意鄉嚮」。但由於道學被視為「與科舉相妨」，與世俗普遍「以一第為成材」的期待不符，故其追隨者就常被「笑侮」而「不能自立」，這無疑降低許多士人接觸道學的意願。李誠之的成功正好證明，成為道學家的追隨者也能取得很好的考試成績。而呂祖謙的教學則展現道學與舉業的成功結合。他證明士人在「求道」的同時也能「求祿」，化解士人的兩難處境，增加其接觸道學的意願。<sup>17</sup>

由此觀之，呂祖謙的舉業教學實可視為一種推廣學術的手段。而且這種方法還相當有效，所以呂氏的同輩中也有人採用相同的策略。薛季宣（1134-1173）就曾延請工於程文的陳傅良（1137-1203）擔任教師以誘導學生讀書。所以張栻曾寫信勸誡薛氏：

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剝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為薄，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sup>18</sup>

<sup>15</sup> David S. Nivison, "Protest against Conventions and Conventions of protest."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ed. Arthur F. Wrigh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82-192.

<sup>16</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10，〈與學者及諸弟〉，頁 509。

<sup>17</sup> 黃謙面臨的兩難局面並不會發生在呂氏弟子身上。實際上，黃謙後來成為呂祖謙的學生。可以說，士人對道與祿的需求，在呂祖謙的門下能夠同時滿足。

<sup>18</sup> 張栻，《南軒集》，卷 19，〈答湖守薛士龍寺正〉，頁 9。

從張栻平日書信中就可發現他對舉業教學可說是全無好感，所以當他聽到薛氏以舉業誘人讀書的作法時便充滿疑慮。同樣地，另一位大師朱熹也考慮過類似的作法。朱熹與一位朋友在討論教學方法時，曾建議擇取品行優良的學生為同儕表率。特別的是，他還希望這些學生擅長舉業。

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

19

朱熹的想法與薛士龍和呂祖謙差不多，同樣都是要用舉業誘進後生。可見這些大儒十分清楚舉業對學生的吸引力，並且試圖在有限度的情況下，利用它誘發學生向學的意願。而呂祖謙對舉業教學的態度可說最為寬容，實踐最為徹底。但當吾人更進一步檢視呂氏的理想時便可發現，呂祖謙的舉業教學之目的並不止於推廣學術。他一生都為招募志同道合的伙伴而努力，並希望提高同志為官的機會。舉業對士人的吸引力及其考試導向的訓練內容，對增加同志數量以及培養官員都有相當的幫助。

## 二、招徠同志

呂祖謙和其他著名的學者一樣，素有任道之志。<sup>20</sup>但他不認為改善世界的任務僅僅是個人的使命。相反地，他倡導「共扶此道」，認為行道應該是一個群體的共同任務。而這個群體的成員常被他稱為「善類」或「同志」，因為他們都具有相似的道德修養與目標。<sup>21</sup>呂祖謙甚至特別推重一些前輩學者作為這個群體的領袖。第一位呂祖謙認定足以統率善類的人，是呂氏的老師汪應辰（1119-1176）。乾道三年（1167），呂祖謙

<sup>19</sup>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3冊，卷62，〈答常鄭卿〉，頁3008。

<sup>20</sup>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台北：允晨文化，2003），第2冊，頁81-92。

<sup>21</sup>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一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420-421。

曾寫信給汪氏，稱其：「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皆無在侍郎丈右者。」可說推崇至級。另一位被呂祖謙視為具有領袖潛質的是張栻。乾道七年（1170）時，當呂祖謙第一次拜訪張栻，呂氏似乎認為自己遇到了一個難得的同志。於是他寫信告訴張栻：「海內之士，共徯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今茲旌纛之來，萬目所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道之盛衰。」對呂祖謙而言，張栻可說是「世道所繫」的關鍵人物，一舉一動皆能影響道之顯晦。<sup>22</sup>

但道的實現與否除了要依靠領袖人物的作為之外，也必須多引善類。此即呂祖謙所謂「推轂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sup>23</sup>他在給張栻的〈啟〉中也提到相同的觀點：

君子之誠本無息，而儒者之效久不明。在昔諸賢，固嘗有志，或遠近未孚而奪於時命，或內外未合而窒於物情。羈評交興，疑信相半。思少伸於此恨，願將付於何人？歷訪縉紳，咸推牆仞。<sup>24</sup>

檢視呂祖謙的人生就能發現，他一直在履行「歷訪縉紳，咸推牆仞」的承諾。他認為提誘後進、培育人材，實為行道的重要步驟，所以呂祖謙曰：「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sup>25</sup>他喜歡薦引人材，廣招善類，「薦士」是他的書信常見的內容之一。乾道五年（1169），呂氏向劉清之（1134-1190）推薦潘景憲（1134-1190）與彭仲剛（1143-1194），兩人皆為呂祖謙的學生，可說是標準的道學人士。特別是潘景憲，呂祖謙認為他「專勤篤信，同志間皆莫及。」乾道六年（1170），呂氏向朱熹推薦劉德循，謂其「有志於學。」乾道九年（1173）向汪應辰推薦趙焯（？-1183）和王遇（1142-1211）。呂祖謙稱讚他們「有志向學，且練達世故，於流輩中不易得。」趙焯後來成為汪應辰的學生，而王遇則遍游

<sup>22</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7，頁388-390，394-395。

<sup>23</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9，〈與周丞相子充〉，頁443。

<sup>24</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4，〈通張巖州啟〉，頁76。

<sup>25</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7，〈與朱侍講〉，頁400。

朱熹、張栻與呂祖謙之門，成為大力的道學支持者。<sup>26</sup>同年，他又向朱熹推薦陸九齡(1132-1190)兄弟。淳熙三年(1176)則向周必大(1126-1204)推薦沈煥(1139-1191)；淳熙四年(1177)向朱熹推薦劉堯夫。沈劉二人皆曾事師陸氏兄弟，亦可說是道學中人。特別是劉堯夫，後事朱熹，為官時「立朝敢言。……排斥權倖甚勇。」<sup>27</sup>可說展現了道學家的風骨。淳熙七年(1180)九月，呂祖謙病體孱弱之時，仍不忘推薦學生毛大方。<sup>28</sup>數十年間積極不斷的薦士，目的皆為提高善類的人數聲勢。<sup>29</sup>

此外，呂祖謙不但自身力行薦士，同時也敦促朋友平時要留意人材。乾道元年(1165)，他寫信給汪應辰說：「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鑒裁之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宜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類似的叮嚀在給劉清之、朱熹、李燾(1115-1184)與陳亮(1143-1194)的信中皆可發現，呂祖謙對援引善類一直不餘其力。<sup>30</sup>

舉業教學可說是呂祖謙用來招徠同志的一個手段。他曾告訴朱熹自己的舉業教學有利於招募同志：「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sup>31</sup>輔廣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宋元學案》說他：「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可能一開始是受呂氏舉業教學的吸引，才投入門下。但輔廣似乎慢慢受到道學的吸引，最後也變成道學中人，最後還曾向朱熹學習數月。而且在道學黨禁風行期間，輔廣更是少數幾個依然對道學保持忠誠的人：「偽學禁嚴，學徒多

<sup>26</sup> 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3冊，卷69，〈滄州諸儒學案上〉，頁2295。

<sup>27</sup> 黃宗羲，《宋元學案》，第3冊，卷77，〈槐堂諸儒學案〉，頁2602。

<sup>28</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8，〈與朱侍講〉，頁436。

<sup>29</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7，頁398，400；卷8，頁416，423，436；卷9，頁445，453，490。

<sup>30</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5，〈與李侍郎〉，頁702；卷7，〈與汪聖錫端明〉，頁388；卷8，〈與朱侍講〉，頁417；卷9，〈與劉衡州〉，頁454；卷10，〈與陳同甫〉，頁466。

<sup>31</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7〈與朱侍講〉，頁398。

避去，先生不為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腳定者甚難，惟漢卿（輔廣）風力稍勁。』<sup>32</sup>但即使呂祖謙的手段小有成效，舉業教學依然引起諸友質疑。張栻便批評說：「去年間聞從學者甚眾，某殊謂未然。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sup>33</sup>對張栻而言，為舉業而前來向呂祖謙問學的學生，與道學的追隨者實有本質的差異。前者的主要目的是求利，而後者則是求義。考生豈能成為真正的求道者。

張栻的質疑並非全無道理。像輔廣一樣的士人可能不多。實際上，許多考生與呂氏的師生關係並不深厚。這些學生求學只為考試技巧，並不受道德性命的講論陶冶。譬如毛椽，呂祖謙曾說：「此郎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可見毛氏學完舉業便與呂祖謙極少往來，大概沒有受到影響。而淳熙八年（1181）五月呂氏又說：「今年緣絕口不說時文，門前絕少人跡。」當時呂祖謙的病已入沈痼，但學生只要課程不講舉業，鮮少拜訪。難怪呂祖謙感慨，在舉業教學的吸引下，「士子相接者甚多，但志趣堅確，規摹開廣，蹈履淳篤者，殊不多見。」但呂祖謙依然持續教授舉業，因為他認為，雖然能夠成為同志者少之又少，但只要能遇到一兩個優秀人材，幫助仍然很大。所以他說：「後生可畏，就其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醇厚篤實，而後辨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sup>34</sup>

在一些記載中也可發現，呂祖謙並不像張栻一樣介意考生與道學跟隨者之間的差別。他注重人之所同而非其所異。自命清高，強調自己與他人有所不同，是呂祖謙最反對的態度。其曰：

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為禍最大，此一段正是學者大戒。……大抵為學須當推廣人心，凡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踈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蓋

<sup>32</sup> 黃宗羲，《宋元學案》，第3冊，卷64，〈潛庵學案〉，頁2053。

<sup>33</sup> 張栻，《南軒集》，卷25，〈寄呂伯恭〉，頁5。

<sup>34</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8，〈與朱侍講〉，頁43；卷10，〈與陳同甫〉，頁466，471，482。

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嘗有內外？人人有此心，和氣自然薰蒸，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sup>35</sup>

又曰：

天下之患，在於妄分清濁。如人之一身，無手則不能執，無足則不能履，又何必愛手而惡足？<sup>36</sup>

在〈乾道四年九月規約〉中，「妄分清濁」甚至被納入實際學規，嚴格禁止，可見其重視程度。因此，在呂祖謙的門下，無論是真心求道的士人，或是只求舉業的考生，「凡執卷皆是同志」，學生可說一律平等。

張栻並不認同呂祖謙的想法。他認為利用舉業招攬同志對群體的發展不僅無益，甚至可能有害。張栻說：「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但呂祖謙反駁：「所謂州平、幼宰之徒，初豈大過人！孔明惓惓之意，乃至於是，故身後猶留數番人材。社稷不隕者數十年，其原蓋在此也。」<sup>37</sup>呂祖謙相當推崇諸葛亮（181-234）。諸葛亮是歷史上賢相的代表。但對呂祖謙而言，諸葛氏最大成就不在政策，而是對官員的培養有過人之處。呂祖謙曾向學生解釋：

諸葛亮治蜀之規撫，有後人不能盡知。其耕戰之法，立國之紀綱，賞罰之信必，此人所共知。最是亮死後，其規撫猶足以維持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菽粟不分，而蜀不亂，此誰能及？……只猶亮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撫有以維持之也。<sup>38</sup>

呂祖謙認為諸葛亮培養的官員是蜀漢得以維持國祚的主要原因。因此，呂祖謙也致力於將善類送入官場。從事舉業教學顯然有其特殊目的。

<sup>35</sup> 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2冊，卷8，〈門人集錄史說〉，頁223-224。

<sup>36</sup> 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卷8，〈門人集錄史說〉，頁228。

<sup>37</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7〈與張荊州〉，頁396。

<sup>38</sup> 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卷8，〈門人集錄史說〉，頁228。

### 三、從考生到官員

呂祖謙從事舉業教學的動機，部分是來自他對官員素質的憂心。呂氏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央做官，所以他有能力長期觀察朝政。這是呂氏與其他主要的道學人物一個很大的差別。朱熹和陸九淵大部分的人生都在地方教學；張栻由於父親張浚（1097-1164）的地位，曾一度有機會進入權力核心。但他在乾道七年（1171）後就離開臨安，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中央。呂祖謙的情況與他的朋友們正好相反。他唯一擔任過的地方官職是乾道六年（1170）時派任的嚴州教授，此後除賦閒在家之外，他都在首都臨安任官。幸而如此，在乾道六年至淳熙七年（1170-1179）這段期間，呂祖謙留下不少他對道學在朝中發展情況的觀察紀錄。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發現，他對朝中善類不足的情況一直感到不滿。

道學在 12 世紀 70 年代的發展之路崎嶇。親近道學的官員人數一直很少，敵視者卻舉目皆是。其中，道學人士的最大敵手即為「近習」。乾道六年（1170），張栻入京，有機會面謁孝宗，可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上節已提及，張栻可說是呂祖謙心中的道學領袖人物之一，因此呂氏當時高興地說：「近事頗有陽復之漸。」似乎得君行道的理想將要實現。但到乾道七年（1171）時，情勢卻急轉直下，孝宗任命近習張說（?-1180）為執政，引發張栻不滿，極諫孝宗。這樣的舉動觸怒宰相虞允文（1110-1174）。果然，不出數月張栻便出知袁州，從此再也沒有回京任官的機會。有些道學人士如楊萬里（1127-1206）、陳良翰（1108-1172）都直言聲援張栻，但勢單力薄而無力回天。呂祖謙因此感嘆地說：「張丈去國，群陰崢嶸，陽氣斷續。」乾道八年（1172），孝宗又執意任命張說為簽書樞密院事，同樣引來數位親道學人士的不滿，但他們卻接連遭到貶官甚至罷免。呂祖謙氣餒的說：「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sup>39</sup>可見數年間親近道學的官員或貶或

<sup>39</sup> 文中王、芮兩人應指王十朋(1112-1171)和 芮燁 (1114-1172)，唯劉之身分尚待考察。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7，〈與朱侍講〉，頁 404。

亡，導致朝中善類一空。<sup>40</sup>

淳熙二年（1175），親道學的龔茂良（?-1178）任參政，實際行宰相事，情勢對道學的發展似乎轉趨有利。但道學與近習之間的明爭暗鬥還是激烈進行中，所以呂祖謙依然憂心「目前善類單寡。」果然，淳熙四年（1177），近習曾覲（1109-1180）欲為其孫謀求入仕，卻遭龔茂良阻擾，道學與近習之間的衝突已達無以調解的地步。最後龔茂良遭到報復，被指控「植黨」，遠貶英州而抑鬱而終。道學在政治上的發展又遭一大挫敗。呂祖謙當時便說：「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腳不牢者，往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在他眼中，朝中同志數量屈指可數，根本無力抵抗反道學勢力的攻擊。最後，呂祖謙對道學在官場的發展作出結論：「一二年來小小灌溉，豈無萌蘖之生，但寒者眾耳。」對他來說，「善類」與「寒者」的數量實在不成比例，道學之所以挫敗，和善類在朝中為官的人數有很大的關係。<sup>41</sup>

從上述紀錄可以發現，呂祖謙非常關心「善類」在官場中的數量。他與朋友談論朝政時很少談論政策，因為他認為皇帝的支持比政策更重要。而善類的數量又直接影響皇帝的信任。因此，他主張「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呂祖謙對朱熹說：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倣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稅之類。竊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倘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眾口譁然，終見沮格。<sup>42</sup>

「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可說是呂祖謙長期觀察朝政之後得出的治國良方。換句話說，他期望作為善類的官員數量能不斷增加，這樣才能發

<sup>40</sup> 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頁 83-93。

<sup>41</sup> 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頁 93-101。

<sup>42</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7，〈與朱侍講〉，頁 404。

揮不斷進諫皇帝的職責。其曰：

上高明開納如此，若常得正人吉士啟沃浸灌，事安有不回之理？所恨此氣脈不復接續耳。……自此以往，若善類來者浸多，則事庶幾可為也。<sup>43</sup>

又曰：

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sup>44</sup>

因此，呂祖謙一有機會就提拔善類，將親近道學的士人送入官場，甚至左右其名次以提高他們獲得重用的機會。根據謝康倫（Conard Schirokauer）的研究，乾道八年（1172）之前道學和反道學陣營成員的中舉數大體相當，但至乾道八年後，反道學陣營的中舉數突然下滑，而道學陣營的中舉數則大幅上升。他指出這是當時的考官尤袤（1124-1193）和呂祖謙所致，兩者皆與道學有所聯繫。<sup>45</sup>實際上，這並不是呂祖謙第一次影響科場選士的結果。早在乾道六年（1170）的太學補試中，呂祖謙就曾洩題給永嘉學派的成員，甚至還提示答法：

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陳武，字蕃叟）、蔡行之（蔡幼學，字行之，1154-1217）、陳益之（陳謙，字益之，1144-1216），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芮燁，字國器，1114-1172）為祭酒，東萊為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sup>46</sup>

第二章已經提及，永嘉地區的士人是呂祖謙學生的主要來源之一。其中自然有不少人受呂祖謙青睞。這些士人的學術取向雖不全與道學相同，但政治立場卻頗為一致。譬如陳傅良，在學術史上歸於永嘉學派，但在

<sup>43</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10，〈答潘叔度〉，頁443。

<sup>44</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8，〈與朱侍講〉，頁426。

<sup>45</sup> 謝康倫（Conard Schirokauer），〈論偽學之禁〉，收入於黑格爾（John Winthrop Haeger）著，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162-163。

<sup>46</sup> 吳子良，《林下偶談》（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卷4，〈東萊以譽望取士〉，頁9。

政治上卻無疑為道學之同路人。<sup>47</sup>此外，淳熙五年（1178）呂祖謙任殿試考官時，更曾利用職務遷動考生名次，以提拔葉適（1150-1223）、徐元德（字居厚）、王自中（字道甫，1134-1199）等永嘉士人。所以陳亮明白的說，這些士人的殿試成績之所以高人一等，都是呂祖謙所為。其曰：「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sup>48</sup>為了讓善類能擠身仕途，呂祖謙可說用盡一切方式。

就此角度而言，呂祖謙的舉業教學頗有助於善類進入仕途。一般道學家的教學只能培育德行優良的士人，但若要成為士大夫，只能靠學生私下的努力與機運。但呂祖謙的學生卻能透過舉業訓練，提高進入官場的機會：「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隨窮達皆有益，政當同致力也」。在呂祖謙平時教學的紀錄中也可發現，他總是將學生當成未來的官員，因此常常勉勵他們將來要為民表率：「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此外，若有機會更需負起進諫皇帝的責任，不能計較自身利害：「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又曰：「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這些告誡都是以學生能進入仕途為前提所提出的。由此可見，呂祖謙的目標不僅止於教養德行健全的士人，其致力舉業教學實為培養優秀同志成為官員，從而達成得君行道之理想。<sup>49</sup>

#### 四、從考生到考官

呂祖謙的確訓練了不少士大夫。第二章已經提及目前所知呂氏學生共有 193 名，其中就有 72 人成為官員。他的學生為官的比例顯然大大超過其他的道學家。然而，72 名官員在整個官僚集團中，仍然不能算是

<sup>47</sup> 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頁 90-91。

<sup>48</sup> 陳亮，《龍川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卷 19，〈與呂伯恭正字〉，頁 221。

<sup>49</sup> 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卷 9，〈門人所記雜說一〉，頁 242，250；卷 10，〈門人所記雜說二〉，頁 260。

很高的數量。呂祖謙透過舉業教學提升善類為官，對整體官僚素質的影響相當有限，只能說稍稍提高善類們面君陳道的機會而已。那麼呂祖謙的努力究竟有甚麼意義？有跡象顯示，呂祖謙的舉業教學的確提高學生擔任考官的機會，從而提升往後研讀道學著作的士人通過科場的可能性。

在《宋會要輯稿》中，留存了一份孝宗隆興元年至寧宗嘉定十六年（1163-1223）21次省試的考官名單，人名與職位都記載於其中（見〈表五〉、〈表六〉、〈表七〉）。在宋代，考官通常是開科詔下才臨時指派。為了公平，雖然偶有重複，基本上每一年的人選都不相同。每次貢舉的考官主要分成四種職位：知貢舉、同知貢舉、參詳官和檢點試卷。參詳和檢點是真正執行審核考卷的職位。知貢舉和同知貢舉的任務則是監察參詳和檢點。每一次省試，數千名考生的命運就掌握在這30名左右的考官手中。這些考官因此能夠左右科場的取仕標準：從修辭方式、學派立場、地域取向、黨派傾向。如上節所見，乾道八年（1172）時，當考官的立場偏向道學，立場相近的人士通過科場的機會就相對增加。因此，吾人有必要先釐清考官資格究竟如何認定。

從表面看來，考官的指派似乎是完全隨機的。官品並非成為考官的條件。考官中除了最高級的知貢舉與同知貢舉例由高官擔任之外，參詳與點檢試卷官的官品基本上雜亂無章，缺乏一致的模式。同樣的，官職也不能用來判斷官員是否更有機會擔任考官。幾乎每一屆的考官原本的官職都不相同，吾人很難判斷究竟那些職位更有機會擔任考官。

然而，如果再仔細檢驗這些考官的資歷就不難發現，的確有兩個條件會左右考官資格。首先，在某些特定時期，官員的「政治色彩」是指派考官與否的重要依據。在偽學黨禁實行期間，考官的政治立場就被嚴格檢驗。慶元五年（1199）的31名考官中，幾乎沒有人能與道學搭上關係。反而是胡紘、劉三傑、陳謙（1134-1221）、程松、高似孫與林采等等以攻擊道學出名的官員擔任科場的監督者。同樣地，當道學抬頭的時期，親近道學人士就比較容易獲此重責大任。嘉定元年（1208）的35

名考官中，富有道學色彩的考官就有 10 名，曾反對韓侂胄（1152-1207）的考官則有 3 名，而曾攻擊道學或親近韓氏的官員則付之闕如。<sup>50</sup>

其次，無論在甚麼時期，「科舉考試成績」都是考官之所以獲派重任的重要原因。這項條件甚至比政治色彩更為基本。原因顯而易見，評分考卷本來就需要對考試文體有精闢的解析能力，選取考試成績優良的官員擔任考官也是理所當然。因此，在考官群中，不難發現具有狀元、省元與上舍釋褐等等資格的考試高手出現，列名前甲的士大夫亦不在少數。僅以寧宗朝為例，幾乎每一屆貢舉都有這些考試成績優秀的前考生參與。慶元二年（1196）的余復，嘉泰二年（1202）的木待問（1140-1212）、王容（1163-1206），開禧元年（1205）的鄒應龍（1172-1244）、許奕（1170-1219）、程卓（1153-1223），這些考官全都曾是「進士第一」。曾為狀元的曾從龍（1175-1236），更是連續在嘉定元年至七年（1208-1214）間的三屆貢舉中擔任考官。可以說，考試技巧越優秀，考試成績越好，選為考官的機會就越大。

在這種情況下，熟練考試技巧的呂氏學生們擔任考官的機會自然增加不少。實際上的確如此，譬如慶元二年（1196）曾為進士第六的潘友端，嘉泰二年（1202）曾為進士第二的朱質，紹熙四年（1193）曾為省元的邵康，都是呂祖謙的學生。他們之所以擔任考官，與他們優秀的考試表現頗有關係。又如嘉定元年（1208）的李誠之與許文蔚也是呂門弟子，兩人皆為上舍釋褐，許氏更連中進士。他們在科場的優秀成績也為其贏得擔任考官的機會。值得一提的是樓昉，這位呂門弟子是著名的時文作家，著有《崇古文訣》。對考試文體的深厚知識使他入選為嘉定元年（1208）與十年（1217）兩屆貢舉的考官。可以說，呂祖謙的舉業教學不僅訓練考試高手，他也間接培育了許多考官。

不但如此，呂祖謙的學生擔任考官的次數，也比其他道學家的弟子更多。〈表八〉整理了朱熹、張栻、呂祖謙與陸九淵這四位道學家的門

<sup>50</sup> 具濃厚道學色彩者的十位考官為樓鑰（1137-1213）、葉時、真德秀（1178-1235）、柴中行、林至、喬行簡（1156-1241）、陳剛、樓昉、李誠之以及許文蔚。曾反韓者則為蔡幼學（1154-1217）、倪思（1147-1220）以及章傑。

人在隆興元年至寧宗嘉定十六年（1163-1223）擔任考官的次數：

〈表八〉南宋道學家（朱陸張呂）弟子歷朝擔任考官次數表<sup>51</sup>

	孝宗	光宗	寧宗	總計(次)
總考官人數	287	67	319	673
呂祖謙	2	3	15	20
朱熹	0	3	10	13
張栻	1	5	6	12
陸九淵	0	0	3	3
其他	19	15	19	53
總計	22	26	53	101
佔總考官人 次百分比	7%	38%	17%	15%

在表中可以發現幾項重要的事實。其一，無論那一位道學大師，他們的弟子都很少在孝宗時擔任考官。張栻只有 1 位學生而呂祖謙則有 2 位，至於朱熹和陸九淵的學生則完全缺席。這種情況很容易理解，因為孝宗時道學大師的弟子仍處於潛心學習的階段，必須等到光寧之間才在官場中漸露頭角。但張呂二人很早成名，他們的學生入仕為官的人數較多也較早。呂祖謙 72 名入仕的學生中，就有 38 人是在乾淳年間通過科舉。入仕較早，先擔任考官的機會自然較多。

其二，朱、呂、張三人的學生在光宗時擔任考官的次數大抵相當。

<sup>51</sup> 資料來源：見〈表五〉、〈表六〉、〈表七〉。

在光宗時，張栻的學生擔任考官的次數稍多，共有 5 人次，朱呂的學生皆為 3 人次。但從總體次數來說，差距並不大。但到寧宗時，三人的差距就顯現出來。呂祖謙的學生高居榜首，有 15 人次擔任考官，張栻最低，只有 6 個人次，兩人相差 9 個人次，而朱熹的學生表現正好居於兩人之間。總計來說，呂祖謙的學生在孝光寧三朝共有 20 人次擔任考官，在所有道學大師中排名第一。朱熹則有 13 人次，與張栻的 12 人次大抵相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陸九淵的學生擔任考官的次數非常低，孝光二朝的考官都沒有陸氏門人。即使到了寧宗也只有 3 個人次。這也許和陸氏學生包含一般平民以及他對科舉的排斥態度有關。<sup>52</sup>

其三，無論是呂祖謙、朱熹、張栻、陸九淵的弟子及其他具有道學色彩的人士，他們擔任考官的次數隨著時間推移一直在增加。唯一例外的是歸類於「其他」之下的考官，在孝宗年間有 19 人次，到了光宗時便降為 15 人次，似乎呈現下滑的趨勢。但吾人必須注意，孝宗時共開科 10 次，平均每次貢舉只有 1.9 位道學人士曾任考官；但光宗只開科 2 次，平均每次貢舉就有 7.5 位道學人士擔任考官。所以道學在科場中的影響力實際上是增加的。從總體來說，孝宗時擔任考官者共有 287 人次，其中有 22 名道學考官，佔總人次 7%；光宗時擔任考官者共有 67 人次，其中有 26 位道學考官，佔 38%；寧宗時擔任考官者共有 299 人次，其中有 53 名道學考官，佔 17%。從孝宗到寧宗，科場中具有道學色彩的考官至少增加了一倍。很可惜的是，《宋會要輯稿》沒有留存理宗年間的考官名單，無法再進一步確認道學考官的人數增長。但我認為這仍多多少少顯示，道學從 12 世紀中至 13 世紀初，在科場中的影響力的確漸趨擴大。

由上述可知，呂祖謙的舉業教學對於培育學生成為考官的確頗有成效。他的學生也許不能完全影響宋廷的官員組成，但仍提高了親道學的考官人數。最明顯的是嘉定元年的貢舉情況。上節已經提及，當年有 10 名具有道學色彩的考官。但仔細檢視就會發現，其中竟有 5 名是呂祖謙

<sup>52</sup> 田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頁 437。

的學生。呂門學生之所以能佔有一半比例，似乎和他們接受過專門的舉業訓練很有關係。這使呂祖謙的學生在道學得勢的時期，比其他道學士大夫更有機會擔任考官。

那麼，呂祖謙培育的道學考官，是不是真的能幫助其他研讀道學著作的學生通過科場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呂祖謙自身在擔任考官時，提拔善類不遺餘力，他的學生同樣繼承了老師的作法。最有代表性是葛洪。葛洪是東陽人，他是呂氏在婺州教書時所收的學生。慶元年間

(1195-1201) 偽學黨禁，所有參與科舉的考生，都必須在家狀中聲明自己和道學沒有關係。

(慶元三年，1197) 九月，……時有詔：「監司、帥臣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sup>53</sup>

可見當時防範道學成員入仕，可說無所不用其極。但這些措施仍有漏洞，道學人士仍然能通過考試。據《金華府志》記載，葛洪是「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第。時方禁道學(1196)，為考試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既足舉員。」<sup>54</sup>可見，即使在學禁雷厲風行之際，呂祖謙的學生依舊遵循呂氏一貫的作法，利用考官身份幫助同道通過考試。葛洪的行為似乎沒有受到懲處，在紹定元年(1223)時更位居參政。葛洪的例子提示吾人，呂氏其他的學生很有可能都透過相同的作法讓道學的發展持續茁壯。

另一位值得吾人注意的呂氏學生，是曾擔任慶元二年(1196)考官的喬行簡(1156-1241)。喬行簡是第一位晉身宰執的道學弟子。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曾經指出，喬行簡是道學弟子中官運最好的一位，比起其他道學家的學生，喬氏更有能力影響宋廷對道學的態度。的確，真德秀(1178-1235)及魏了翁(1178-1237)都沒有他在朝為官的時間長。喬行簡位至右丞相又任平章軍國重事，這種權位讓他能更有效地推廣道

<sup>53</sup> 《齊東野語》則曰：「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偽學者，甘伏朝典』之辭。」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11，〈道學〉，頁202-203。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5，頁82。

<sup>54</sup> 王懋德，《金華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明萬曆六年刊本)，卷16，頁20。

學。朱熹在理宗端平元年（1234）能夠進入孔廟陪祀，喬氏可說功不可沒。<sup>55</sup>葛洪和喬行簡是呂祖謙用舉業教學送入官場最成功的兩個士人。兩人都擔任考官，後來又都成為高官。他們憑藉著官職，為道學的發展各自做出貢獻。這是純粹的德行教育無法達到的成就。

## 五、小結

本章旨在釐清呂祖謙從事舉業教學的各種目的。對所有舉業教師而言，舉業的基本目的僅為維生。然而作為一位著名的道學家，呂祖謙的教學混雜了舉業訓練與德行教養，這使他與普通舉業教師區別開來。舉業教學對呂祖謙而言，是一種增加士人接觸道學理念的推廣方式。同時，舉業教學的吸引力也讓他能夠接觸更多士人，甚至從中吸收道學中人成為善類的一份子。最後，呂祖謙長年在中央為官的經驗使他認為，有必要提升親近道學的官僚數量以此影響皇帝的心術與行為。舉業教學正好具有訓練士人成為士大夫的特殊功能。他的努力也許沒有辦法真正做到得君行道的理想，但從孝光寧三朝的考官名單中可以發現，呂祖謙的舉業教學依然提高了學生擔任考官的次數，從而增加日後研讀道學者通過科場的機會。

---

<sup>55</sup>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頁 420-421。

## 第五章 餘論

從先秦開始，儒家人物就以教師的身份在歷史上活躍。孔子（前 551-前 479）、孟子（約前 372-前 289）與荀子（前 313 年-前 238）都被視為是偉大的教師，他們的思想則被視為是學生課程的主要內容。然而，自隋代（581-619）舉行科舉取士之後，被稱為「舉業」的考試訓練在儒士的日常生活中便慢慢成為一門獨立的課程。當科舉的影響在宋代越顯擴大之際，舉業更成為所有意圖進入官場的士人必學的日常訓練。在科舉時代，吾人很難將士人的課程完全等同於教師的思想，而忽略掉其中的舉業訓練。但很可惜的是，現代研究的焦點大多放在教師個人的思想，對舉業的研究相對不足，這使吾人對大部分士人的日常課程依然缺乏瞭解。史料中缺乏對舉業的相關記載是助長吾人忽略舉業的主要原因之一。歷來的教育思想家對舉業多無好感，即使認真從事考試訓練的士人，也不見得認為舉業有任何重大的價值。這讓書寫歷史的知識份子認為，舉業似乎「上不了檯面」，著墨於舉業課程似乎多此一舉，即使它在現實中是如此的普遍。的確，歷史中曾經從事舉業的士人數量是如此龐大，但他們從事的舉業就像吾人的日常生活，因為過於普遍而反被遺忘。

同樣被歷史遺忘的，還有靠著教授舉業維生的大量教師。有些教師本身就是考生，利用教授平日所學賺取日常所需。有些教師則以提供專門的考試訓練著名，當他們的學生功成名就時，便為教師的事業招攬更多學生。<sup>1</sup>但總體而言，這些教師大抵名不見史載。在歷史上留名，又同時保存各種教學資料的舉業教師並不多見，本書的研究對象呂祖謙就是一個稀有的例子。在學術史上，呂祖謙（1137-1181）與朱熹（1130-1200）、張栻（1134-1181）和陸九淵（1139-1193）同享盛名。近來諸多研究都

---

<sup>1</sup> 何忠禮，〈科舉制度與宋代文化〉，收入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92-93。梁庚堯，〈福州士人與舉業〉，《東吳歷史學報》11(2004):175-213。

對吾人瞭解呂祖謙很有幫助。<sup>2</sup>但呂祖謙通常被當作一名道學家或思想家看待。他作為舉業教師的身份很少受到重視。本書第二章的目的就是要考察呂祖謙如何成為一名舉業教師，以及他在舉業教學方面投注的心力和成就。在文中，筆者描述了呂祖謙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參加科舉的動機，並指出他如何在通過考試之後又投身考試教學。最後，筆者找出呂祖謙的學生仍見於史籍者共 193 名，並據其統計出呂氏學生的中舉率和入仕率。研究的結果富有意義，37.8%的中舉率以及 48.4%的入仕率都顯示，呂祖謙的教學性質和其他道學家差別很大。他不只培養士人的德行，也提高學生當官的可能性。吾人不能將他的教學視為是純粹的德行教育。

第三章的目的則在探討呂祖謙的舉業教學究竟如何訓練學生準備考試。但要瞭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先釐清宋代考生備考時到底會遇到甚麼難關。一般來說，吾人只知道宋代的科舉考試主要是用經義、詩、賦、論、策這五種文體當成考試項目，因此考生必須熟習這些文體的書寫形式，模仿名家文章因此成為舉業的主要訓練。然而，筆者以為寫作文章並不是考生最大的負擔。對考生而言，真正的難題應該是如何在浩瀚的書海中找出容易出題的內容並熟讀之。換句話說，掌握出題範圍才是考試關鍵。從宋初到南宋，科舉出題的範圍經歷了數次變化，大體而言是由寬變窄，又由窄變寬。到了呂祖謙的時代，考生若不博學不能應之。因此吾人發現，呂祖謙為了幫助考生應付日益擴大的考題範圍，首先應用的方式就是要學生培養博覽群書的習慣，使考生成功作答的機率大增。其次，呂祖謙又透過「刪節」與「分類」，增加考生閱讀的效率以及對考題的熟悉程度。博覽群書後來成為呂氏教學的特色。甚至在呂祖謙死後，婺州學人仍以博學著稱。譬如呂祖謙的徒孫時少章：「天才絕出，博極群書，談經多出新意，而於史學尤精。」<sup>3</sup>而且，即使時至宋末元初，博學依舊是婺州學人的問學特色。譬如王柏（1197-1274），在 30 歲接觸

<sup>2</sup> 田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一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133-205。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2003），第 2 冊，頁 81-92。

<sup>3</sup> 王懋德，《金華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明萬曆六年刊本），卷 16，頁 40。

道學之前，一直是以博覽群書的方式治學：

為人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群書如干將莫邪，所向肯綮，迎刃而解。……如論河圖、洛書、九疇、洪範及詩、大學格致章、中庸古本皆卓識獨見。外至天文、地志、律曆、井田，旁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sup>4</sup>

又如王柏的學生金履祥（1232-1303），在 19 歲前一直是以博覽群書的方式準備考試：「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曆律之書，歷不研究其微而充極其用。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師魯齋王文憲公。」<sup>5</sup>因此筆者認為博學學風一開始的形成，和舉業的準備方式頗有關連。

第四章則企圖探討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為甚麼呂祖謙作為一名道學家卻要投身於舉業教學呢？本書指出，呂祖謙教授舉業的原因一開始可能和一般的舉業教師相同，都是為了維生。然而，他從事舉業教學還有更複雜的動機。推廣學術，吸收同志，培養官員都是他教學的目的。這使呂祖謙與一般教師區別開來。吾人可以發現呂祖謙一直嘗試著扮演考生的教師，一方面又試圖在擔任考官時提拔善類。他試著讓仕宦的大門向道學人士敞開。即使在呂祖謙去世之後，他的學生依然循著相同的作法，不斷讓具有相同理念的士人進入官場，從而使道學的發展更為樂觀。

最後，本書希望藉著呂祖謙的舉業教學討論道學人物經營地方與中央的傾向。1982 年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提出，從北宋到南宋，中國的菁英家族經歷了重要的轉型：職業官僚菁英（Professional Bureaucratic Elite）漸漸讓位給地方士紳菁英（Local Gentry Elite）。對地

<sup>4</sup>王懋德，《金華府志》，卷 16，頁 42-43。

<sup>5</sup>此外，金履祥的學生柳貫（1270-1342）與許謙（1270-1337）都有這種博學的傾向。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受經於蘭谿金履祥……。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為文章，極肆演述，春容紆徐，人多傳誦之。」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受業金履祥之門……。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釋老之說靡不該貫。」王懋德，《金華府志》，卷 16，頁 51-53。

方士紳菁英而言，當官只是諸多選擇之一，教書或是商業都是可以考慮的職業。這些地方士紳參與科舉考試的目的，與其說是要取得官職，還不如說是為了確認自己的社會地位。<sup>6</sup>韓明士（Robert P. Hymes）延續郝氏的論調，他界定南宋菁英的特性，將其稱為「地方主義」。他認為南宋的菁英一方面傾向在全國性的事務退縮，一方面則踴躍參與地方性的事務。<sup>7</sup>

包弼德（Peter K. Bol）則與郝若貝及韓明士相呼應，在道學崛起的議題上提出類似的意見。他認為南宋激烈的科舉考試使許多南宋的士人難以入仕。因此用來界定士人身份的要素也變成是「教育」而不是「官職」。參與考試只不過是為了取得士人身份的證明而已。而這時興起的道學正好吸引了眾多地方士人的注意與支持。以朱熹為領袖的道學集團實具有「地方主義」的傾向。比起入朝為官，道學成員對耕耘地方社會更感興趣。朱熹的學生組成反映了這個傾向。在朱氏 488 名學生中，只有 29% 擔任官職。<sup>8</sup>筆者認為包教授對朱熹的觀察大抵正確。但正如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給予吾人的啟示，宋學研究不能侷限於朱熹一人身上，從而忽略其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學者。<sup>9</sup>同樣的，瞭解道學對地方與中央的興趣也不能過於強調朱熹的代表性，從而忽略其他的道學家的作法。正如本書第二章所做出的統計，呂氏 193 名學生中，有 93 人曾擔任官職，也就是 48.4%。比起朱熹的學生，呂祖謙的學生顯然對做官充滿興趣。如果說朱熹的學生反映的是道學成員不求仕進的態度，那麼呂祖謙的學生又反映了甚麼呢？

筆者認為，呂祖謙的學生反映的正好是宋代社會中另一群決意入仕的士人。誠如包弼德所言，南宋參與考試的人數一直節節攀升。<sup>10</sup>吾人

<sup>6</sup>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1982):411-420.

<sup>7</sup>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10-218.

<sup>8</sup> 包弼德，〈對余英時宋代道學研究方法的一點反思〉，《世界哲學》4（2004）：99-102。

<sup>9</sup>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頁 422-445。

<sup>10</sup> 包弼德所使用的數據來自於賈志揚（John W. Chaffee）。見賈志揚（John W. Chaffee），《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56。

可以瞭解，這種狀況勢必使社會中無法入仕的士人數量遠大於成功通過棘圍的人。這些考試的失敗者很有可能從此絕意官場，轉而向地方事業發展。其中許多人也成為道學的忠實聽眾。然而，考生數量的不斷增長同時代表著，宋代社會中自認有希望通過考試的人持續在增加。在史籍中，不難發現這些不因考試的激烈競爭而退縮，反而不斷試圖挑戰科舉的士人。譬如衢州士人劉愚（1133-1215）自幼備考，83年的人生歲月有一半都在參加考試：「入太學凡三，中上舍積歲月始升名，比脫紵袍五十餘矣。」又如越州士人孫椿年（1141-1199），屢叩闈門而終不得志：「寒鈔署講，寢食失期，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通，采章錯綜，機神融液，往往心悟所以然。……君負其能，踏省門五六，然終不得名於進士，髮謝齒落，遂於槁死。」<sup>11</sup>可以說，孫氏一心一意只想入朝為官，從來沒有因為考試競爭太過激烈而放棄。對於這些士人來說，朱熹、張栻或陸九淵這些道學家的吸引力可能就不夠大，因為他們無法提供科舉考試的訓練。不過由於呂祖謙特殊的教學型態，這些士人依舊能夠成為道學家的學生。但基於他們對做官的渴望，「地方主義」恐怕不足以涵蓋這些成員的特性。

的確，和一般常見的道學事業諸如社倉或書院相比，呂祖謙的舉業教學缺乏直接改善地方社會的功能。儘管他招收的學生絕大多數是來自地方社群，但這些學生接受呂氏指導舉業的目的仍然是為了通過科舉考試並入朝為官。從這點看來，筆者認為呂祖謙的舉業教學反而顯示，道學中依然有成員對經營中央抱持著高度興趣。在本書第四章的討論中吾人可以發現，呂祖謙為官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朝中度過。皇帝的心術、官僚集團的組成，至始至終是呂祖謙最重視的問題。他的舉業教學則是希望能塑造一批能夠影響朝廷，並由中央推動事務的官員。呂祖謙對科舉活動的積極參與，可以看成是道學家為了影響中央所做的一項嘗試。

為甚麼呂祖謙對中央具有如此濃厚的興趣呢？這似乎與呂祖謙的

---

<sup>11</sup> 葉適，《水心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第2冊，卷16，〈孫永叔墓誌銘〉，頁7；卷21〈劉靖君墓誌銘〉，頁10。

家族背景有關。呂祖謙來自郝若貝所謂的職業官僚菁英家族。即使到了南宋，呂氏家族仍舊保留著與其他職業官僚菁英通婚的傳統模式。<sup>12</sup>呂氏家族的成員如呂蒙正（946-1011）、呂夷簡（979-1044）或呂公著（1018-1089）皆為北宋中央的高官，他們一直是以「由上而下」的模式治理國家。如果吾人稍微留意一下更會發現，在朱、陸、張、呂這四位道學人物的文集中，只有呂祖謙著有〈官箴〉。〈官箴〉是為官的心得與要訣。在呂氏的文集中一共留有兩篇官箴，一篇〈官箴〉是呂祖謙自己的作品，一篇〈舍人官箴〉則是呂祖謙的伯祖呂好問（1064-1131）的作品。<sup>13</sup>這兩篇官箴都被視為「家範」，是呂氏家族長期為官的經驗心得。可以說，「入朝為官」一向是呂家的傳統。呂祖謙很自然受到先祖們的影響。當呂氏從事教學時，他對學生也是抱著相同的期望。

本書對於舉業、道學以及呂祖謙的探討顯然依舊不足。許多議題仍然需要持續關注。道學後學對舉業的態度與教學，13世紀道學在科場中的地位，甚至是明代（1364-1644）理學與舉業關係，皆為值得深入探索的有趣議題。希望諸位學者對本書提出的各種疏漏不吝指教，給予批評。

---

<sup>12</sup> Beverly J.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7-170.

<sup>13</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6，〈官箴〉，頁36-367；〈舍人官箴〉，頁368-372。

附表

〈表一〉 呂祖謙學生名單

一、兩浙東路

(一) 婺州地區，共 95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毛大方,字仲益	金華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第 1 冊，卷 10〈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頁 149-150。
2	毛大年	金華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 冊，卷 10〈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頁 149-150。
3	王介 (1158-1213) ，字元石	金華	紹熙元年 (1190)進士 第三名。	京西安撫 使，從四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 第 3 冊，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37。
4	王洽，字伯禮	金華		當塗知縣，從 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第 3 冊，卷 73〈麗澤諸儒 學案〉，頁 2438。
5	王瀚 (?-1211)，字 伯海	金華		階至朝奉 郎，正七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38。
6	汪大亨，字時升	金華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3。

7	汪大明，字時晦	金華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3。
8	汪大度，字時法	金華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2。
9	汪大章，號約叟	金華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2。
10	汪仲儀	金華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1〈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頁 171-172。
11	汪淳	金華		吉州教授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2。
12	呂孝祥，字仲平	金華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 冊，卷 3〈呂仲平等〉，頁 784-785。

13	呂祖儉 (1146-1198) ，字子約	金華	恩蔭	太府寺丞，正八品。	黃宗羲著，《宋元學案》，卷 51〈東萊學案〉，頁 1681。
14	杜旗，字伯高	金華	淳熙、開禧兩 以制科薦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1。
15	宋銜 (1153-1195) ，字茂叔	金華	紹熙元年 (1190)進士	廣東西路鹽 事司主管官。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1〈嶽麓諸儒學案〉，頁 2393。
16	邵度	金華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金華邵度〉，頁 816。

17	邵津，字元通	金華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門人金華邵津〉，頁 810。
18	夏明誠，字敬仲	金華	慶元二年 (1196)進士 第三名。	安慶府推 官，從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2。
19	郭治	金華		知江山縣，從 八品。	王梓材，馮雲濠輯，張壽鏞校，《宋元學案補遺》 (台北：世界書局，2002)，第 6 冊，卷 69〈滄州 諸儒學案補遺〉，頁 155-156。
20	潘時 (1126-1189) ，字德鄴	金華		尚書左司郎 中，從六品。	王懋德，《金華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卷 16，頁 29。

21	潘友端，字端叔	金華	淳熙十一年 (1184)進士。	太學博士，從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1〈嶽麓諸儒學案〉，頁 2394。
22	潘景憲 (1134-1190) ，字叔度	金華	隆興元年 (1163)進士。	太平教授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39-2440。
23	潘景愈，字叔昌	金華	太學解魁，又取進士，年代未著，最遲至淳熙十四年 (1187)。	知縣，從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39-2440。楊簡，《慈湖先生遺書續集》(山東：山東友誼出版社，1991)，卷 19〈祭潘叔昌知縣文〉，頁 17。
24	潘景良	金華	曾取進士，年代未著。		吳師道，《敬鄉錄》(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卷 13，頁 8-9。

25	戚如琥，字少白	金華	紹熙元年 (1190)登進 士丙科。	知袁州，從五 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1。
26	戚如圭 (1113-1174)	金華	乾道年間 (1165-1173) 進士	嵯縣縣尉，從 九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1。
27	戚如玉	金華	淳熙年間 (1174-1189) 進士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1。
28	曹起宗	金華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1〈金華曹君墓 誌銘〉，頁 179。
29	曹世昌	金華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1〈金華曹君墓 誌銘〉，頁 179。

30	張垓，字伯廣	金華		階至承信郎，從九品。	王懋德，《金華府志》，卷 16，頁 67。
31	葉邽，字子應	金華		大治縣主簿，從九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34-1235。
32	葉秀發，字茂叔	金華	慶元二年 (1196)進士	知高郵軍，正九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39。
33	趙善珍，字子良	金華	乾道八年 (1172)進士	溫州推官，從八品。	王梓材，馮雲濠輯，張壽鏞校，《宋元學案補遺》，第 6 冊，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26。
34	鄭宗強，字南夫	金華		階至朝請大夫，正五品上。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2。
35	何逮，字思順	東陽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1。

36	李大同，字從仲	東陽	嘉定十六年 (1223)進士	寶謨閣直學 士知平江 府，正四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6。
37	李大有 (1159-1224) ，字謙仲	東陽	慶元二年 (1196)進士	太常博士，正 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51〈東萊學案〉，頁 1686。
38	李誠之 (1152-1221) ，字茂欽	東陽	慶元元年 (1195)上舍 釋褐	知蘄州，從六 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36。
39	邵康，字侶之	東陽	淳熙十一年 (1184)省元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補遺〉，頁 31。
40	倪千里，字起萬	東陽	淳熙十四年 (1187)進士	除起居舍 人，從六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53〈止齋學案〉，頁 1728。

41	胡居仁	東陽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1。
42	郭津，字希呂	東陽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5。
43	郭澄 (1150-1179) ，字伯清	東陽		以蔭補將仕郎，從九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51〈東萊學案〉，頁 1686。
44	郭江，字伯山	東陽		盱眙軍錄事參軍，從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51〈東萊學案〉，頁 1686。
45	郭溥，字伯廣	東陽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51〈東萊學案〉，頁 1686。
46	陳黼，字斯士	東陽	淳熙八年 (1181)進士	階至著作郎，官國子博士，從七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3-2444。

47	喬行簡 (1156-1241) ，字壽朋	東陽	紹熙四年 (1193) 進士	拜右丞相，平 章軍國重 事，正一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36。
48	喬夢符，字世用	東陽	淳熙二年 (1175) 進士	監察御史，從 七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38。
49	葛洪，字容甫	東陽	淳熙十一年 (1184) 進士	參知政事，正 二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35。
50	趙彥柅，字周錫	東陽	隆興元年 (1163) 進士	眉州通判，從 七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6。
51	趙彥穉，字周實	東陽		階至承直 郎，正六品 下。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補遺〉，頁 23-24。

52	趙游夫，號潢山	東陽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3。
53	毛炳，字伯光	義烏	寶慶二年 (1226) 進士	官至寶謨閣 學士，從三 品。	諸自穀等修，程瑜等編，《義烏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第 2 冊，卷 14〈儒林〉，頁 2-3。
54	王自得	義烏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外集》，卷 5〈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頁 689。
55	朱質，字仲文	義烏	紹熙四年 (1193) 進士 第二人	階至右正 言，權吏部侍 郎，從四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39。
56	徐侃	義烏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2。

57	徐倬	義烏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2。
58	陳錫	義烏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1〈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頁 175。
59	揚誠之	義烏	淳熙十一年 (1184)進士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5-36；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門人揚誠之〉，頁 817。
60	樓孟愷	義烏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0。
61	樓仲愷	義烏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0。
62	樓叔愷	義烏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0。

63	樓季愷	義烏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0。
64	龔世宏	義烏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0。
65	龔世隆	義烏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0。
66	龔世廣	義烏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0。
67	龔世思	義烏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0。
68	龔世昌	義烏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0。

69	龔世英	義烏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0。
70	王綸	武義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鄭堂卿等〉，頁 789。
71	徐一夔	武義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外集》，卷 5〈徐君墓誌銘〉，頁 693-694。
72	郭粹中	武義		龍游縣尉，從九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0-2451。
73	郭敏中	武義		江山主簿，從九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0-2451。

74	郭允中	武義		曾應進士舉。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0-2451。
75	郭時中	武義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0-2451。
76	逸登發	武義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鄭堂卿等〉，頁 789。
77	鞏峴，字叔子	武義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7-2448。
78	鞏豐 (1148-1217) ，字仲至	武義	淳熙八年 (1181)進士	提轄左藏庫 卒，低於八 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7-2448。

79	鞏嶠 (1151-1221) ，字仲問	武義	淳熙二年 (1175)進士	大理寺丞，正 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7-2448。
80	鄭良臣，字唐卿	武義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鄭堂卿等〉， 頁 789。
81	包子謙	蘭溪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補遺〉，頁 31。
82	金異卿	蘭溪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補遺〉，頁 31。
83	時瀾 (1156-1222) ，字子瀾，一字 叔觀	蘭溪	淳熙八年 (1181)進士	台州通判，從 七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7。

84	時灃，子雲，一字伯江	蘭溪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7。
85	時鎬	蘭溪 時氏		甌寧縣尉，從九品。	吳師道，《敬鄉錄》，卷 13，頁 1-4。
86	時錡	蘭溪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2〈金華時君德輔墓誌銘〉，頁 188-189。
87	時淇，字叔瞻	蘭溪	紹熙元年 (1190) 進士		吳師道，《敬鄉錄》，卷 13，頁 1-4。
88	時涇，字仲淵	蘭溪	嘉泰二年 (1202) 進士	充浙東幹辦公事。	吳師道，《敬鄉錄》，卷 13，頁 1-4。
89	葉誕，字必大	蘭溪	乾道五年 (1169) 進士	吳縣縣令，從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51。

90	石範 (1148-11213) )，字宗卿	浦江	紹熙元年 (1190)進士	泉州通判，從 七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39。
91	傅如松	浦江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 遺〉，頁 31。
92	傅如川	浦江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 遺〉，頁 31。
93	王頤	永康		太學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2〈永康王君墓 誌銘〉，頁 187。
94	王深源	婺州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52。
95	洪無競，字求仲	婺州	乾道八年 (1172)進士	侍講學士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6〈洪無競字序〉， 頁 104-105。

(二) 處州，共 7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羊永德	處州 縉雲	紹興年間 (1131-1162) 進士	徽州通判，從 七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6。
2	葉季韶，字韶之	處州 縉雲	曾舉進士	臨安府學教 授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補遺〉，頁 28。
3	周介，字公謹， 一作叔謹	處州 括蒼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1〈門人周公謹 介所記〉，頁 717。
4	葉重開	處州 松陽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0〈松陽葉君墓 誌銘〉，頁 192。

5	陳希點 (1144-1209) ，字子與	處州 青田	淳熙八年 (1181)進士 第六名	起居郎兼權 中書舍人，四 品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24-25。
6	潘景伊	處州 松陽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2〈潘朝散墓誌銘〉，頁 192。
7	潘景夔	處州 松陽		知鹽官縣，從 八品。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2〈潘朝散墓誌〉，頁 192。

(三) 溫州，共 8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王自中 (1134-1199) ，字道甫，一作 道夫	溫州 平陽	淳熙五年 (1178) 進士	知興化軍，正 九品。	淳熙元年 (1174) 漕試 詩賦第一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2〈王主簿道夫〉，頁 773。
2	章用中 (?-1181)，字 端叟	溫州 平陽	淳熙年間 (1174-1189) 進士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53〈止齋學案〉，頁 1725-1726。
3	彭仲剛 (1143-1194) ，字子復	溫州 平陽	乾道年間 (1165-1173) 進士	提舉浙東常 平司，正九品 至從六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8-2449。

4	林居實 (1142-1175) ，字安之	溫州 瑞安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2〈林安之墓誌銘〉，頁 190。
5	徐元德，字居厚	溫州 瑞安	淳熙五年 (1178) 進士	知通州，從 六品。	進士第四名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2〈徐推官居厚〉，頁 771。
6	陳謙 (1144-1216) ，字益之	溫州 永嘉	乾道八年 (1172) 進士	江西湖北宣 撫副使，從四 品。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2〈陳教授益之〉，頁 774。
7	葉適 (1150-1223) ，字正則	溫州 永嘉	淳熙五年 (1178) 進士 榜眼	寶文閣待 制，兼江淮制 置使，從四 品。	〈祭文〉中自 稱門人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 卷 50，頁 756。

8	戴溪 (?-1315)，字 尚望，一作少 望。	溫州 永嘉	淳熙五年 (1178)別頭 省試第一	龍圖閣學 士，權工部尚 書，正三品。	著《續呂氏家 塾讀詩記》。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53〈止齋學案〉，頁 1722-1723。
---	----------------------------------	----------	--------------------------	--------------------------	------------------	---------------------------------------

## (四) 明州，共 9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沈煥 (1139-1191) ，字叔晦	明州 鄞縣	乾道五年 (1169) 進士	舒州通判，從 七品。	〈竹州三先生書院記〉： 「沈氏之學，實兼得明 招一派。」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收入朱鑄禹校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 中冊，卷 16〈竹州三先生書院記〉，頁 1042-1043。
2	袁燮 (1144-1224) ，字和叔	明州 鄞縣	淳熙八年 (1181) 進士	龍圖閣直 學士，從三 品。	〈行狀〉：「公 從之游，所得 益富。」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5〈絜齋學案〉，頁 2525-2526。

3	姜炳，字子謙	明州 鄞縣	紹熙四年 (1193)進士	知鍾離 縣，從八 品。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26。
4	樓鏞	明州 鄞縣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1。
5	孫應時 (1154-1206) ，字季和	明州 餘姚	淳熙二年 (1175)進士	邵武軍判 官，從八品。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門人孫應時〉，頁 817。
6	舒璘 (1136-1198) ，字元質	明州 奉化	乾道八年 (1172)進士	宜州通判，從 七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6〈廣平定川學案〉，頁 2544-2546。

7	李充庭，字伯振	明州 奉化		階至承奉 郎，從八品 上。	太學生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7〈槐堂諸儒學案補遺〉，頁 27-28。
8	樓昉，字暘叔， 迂齋先生	明州 鄞縣	紹熙四年 (1193)進士	階至朝奉 郎，守興化軍 卒，正六品上	著《崇古文 訣》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35。
9	樓昞，字季文	明州 鄞縣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35。

(五) 台州，共 2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丁希亮 (1156-1192) ，字少瞻	台州 黃巖			〈祭文〉：「希亮登門雖後，辱教無媿。」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55〈水心學案〉，頁 1807-1808。
2	吳洪	台州 天台		階至奉直大夫，江西提舉，正六品。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3。

## (六) 越州，共 3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石斗文 (1129-1189) ，字天民	越州 新昌	隆興元年 (1163)進士	知武岡軍，正 九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7〈槐堂諸儒學案〉， 頁 2578。
2	石宗昭，字應之	越州 新昌	乾道八年 (1172)進士	侍從，正四品 至從二品 <sup>1</sup>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石教授應 之〉，頁 799。
3	邢世材 (1140~1176) ，字邦用	越洲 會稽	曾舉進士	金華縣丞，從 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4-1445。

<sup>1</sup> 據《朝野類要》，「侍從」謂：「翰林學士（正三品）、給事中（正四品）、六尚書（從二品）、八侍郎（從三品）是也。」趙升，《朝野類要》（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2〈侍從〉，頁 45。

(七) 衢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鄒補之，字公 袞。	衢州 開化	淳熙初 (1174-1176) 進士	江寧府通 判。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0。

## 二、兩浙西路

### (一) 嚴州，共 1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王中孚	嚴州 分水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1〈分水王君墓誌銘〉，頁 175-176。
2	王中實	嚴州 分水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1〈分水王君墓誌銘〉，頁 175-176。
3	徐文虎	嚴州 分水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1〈分水徐君墓誌銘〉，頁 182-183。

4	邵朴，字德醇	嚴州 分水	淳熙五年 (1178)進士	秘書郎，正 八品。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邵主簿德醇〉，頁 803。
5	胡子廉	嚴州 淳安		〈麗澤諸儒 學案〉：「不 屑科舉之 學。……終身不 仕。」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5。楊守仁修，徐楚纂，《〔萬曆〕嚴州府志》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 獻出版社，1990)，卷 15〈人物志三·理學〉，頁 352。
6	盧汝琰	嚴州 淳安		嚴州州學學 生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50。
7	盧汝瑄	嚴州 淳安		嚴州州學學 生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50。
8	郭頤，字養正	嚴州 壽昌	舉進士	軍器監主 簿，從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7。

9	宋天則，字秉彝	嚴州 遂安		嚴州學錄	嚴州州學學生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27-28；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嚴州學生宋天則〉，頁 815。
10	詹長民，字子期	嚴州 遂安		階至承奉 郎，從八品 上。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2。
11	詹儀之，字體仁	嚴州 遂安	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	吏部侍郎，從 三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4。

(二) 臨安，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徐安國，字衡仲	臨安 富陽	乾道二年 (1166) 進士	提舉廣東常 平司。	嚴州州學學 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持服徐安國〉，頁 808。

(三) 常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沈有開 (1134~1212) ，字應先	常州		知太平州，直 龍圖閣，正七 品。	從東萊於臨 安太學。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1〈嶽麓諸儒學案〉， 頁 2385-2396。葉適，《水心集》(臺北：中華書局， 1966)，第 2 冊，卷 21〈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 公墓誌銘〉，頁 1。

(四) 嘉興，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輔廣，字漢卿	嘉興 崇德			漕試四舉不第。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64〈潛庵學案〉，頁 2053-2054。

### 三、福建路

#### (一) 福州，共 7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李泳，字深卿	閩人		新昌縣丞，從八品。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曾附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2〈李縣丞深卿〉，頁 778-779。
2	朱塾 (1153-1191) ，字受之	福州		階至中散大夫，正五品上。	朱熹之子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49〈晦翁學案下〉，頁 1591。

3	潘子儀 (1145-1193)	福州	淳熙十一年 (1184) 進士	昭武戶曹	太學學生	福建通志局纂，《福建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卷 11，〈潘戶曹墓志〉，頁 11221。
4	陳孔碩，字膚仲	福州 侯官	淳熙二年 (1175) 進士	秘閣修撰，從 六品。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陳司戶膚仲〉，頁 801。
5	陳孔夙，字仁仲	福州 侯官	慶元五年 (1199) 進士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69〈滄州諸儒學案〉，頁 2277。
6	林謨 (1135-1193) ，字丕顯	福州 連江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29。

7	林穎，字叔嘉	福州 福清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2。
---	--------	----------	--	--	--	-----------------------------------

(二) 建寧府，共 3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馬王仲，字次辛	建寧 建陽	紹熙元年 (1190) 進士	歷官州縣	私淑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3。
2	劉燾 (1144-1216) ，字晦伯	建寧 建陽	乾道八年 (1172) 進士	權工部尚 書，正三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69〈滄州諸儒學案上〉，頁 2263。

3	劉炳，字韜仲	建寧 建陽	淳熙五年 (1178)進士	兵部郎中，從 六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69〈滄州諸儒學案上〉， 頁 2264。
---	--------	----------	------------------	---------------	--------------------------------------

## (三) 南劍州，共 2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黃渙，字德亨	南劍 光澤	淳熙五年 (1178)第二 人	守岳州，從六 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3。
2	黃謙，字德柄	南劍 光澤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3。

(四) 漳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王遇 (1142-1211) ，字子合	漳州 龍溪	乾道五年 (1169) 進士	累官右司郎 中，正六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69〈滄州諸儒學案上〉， 頁 2295。

#### 四、江南西路

##### (一) 建昌，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陳剛，字正己	建昌 軍盱 江	曾舉進士	教授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7〈槐堂諸儒學案〉， 頁 2580。

(二) 贛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吳必大，字伯豐	贛州 興國		吉水縣丞，從 八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69〈滄州諸儒學案上〉， 頁 2318。

(三) 撫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黃人傑，字叔萬	撫州 南城	乾道二年 (1166) 進士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門下士黃 人傑〉，頁 814。

(四) 袁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趙汝燧，字明翁	袁州	嘉泰二年 (1202) 進士	知溫州，從六 品。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4。

(五) 吉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劉德循，字循之	吉州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10〈答潘叔度〉，頁 487。

## 五、江南東路

### (一) 徽州，共 4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方琚	徽州歙縣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0〈滄州諸儒學案補遺〉，頁 40。
2	方琥	徽州歙縣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0〈滄州諸儒學案補遺〉，頁 40。
3	方璟	徽州歙縣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0〈滄州諸儒學案補遺〉，頁 40。

4	許文蔚，字衡甫	徽州 休寧	紹熙元年 (1190)上舍 釋褐又中進 士	著作郎兼權 兵部郎官，從 六品。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補遺〉，頁 28。
---	---------	----------	--------------------------------	------------------------	---------------------------------------

(二) 宣州，共 2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胡伯虎，字用之	宣州 寧國	淳祐七年 (1247)進士	和州防禦判 官，從八品。	私淑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補遺〉，頁 29。

2	胡季虎	宣州 寧國	淳祐四年 (1244)進士	權發遣桂陽 軍，正七品。	私淑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29。
---	-----	----------	------------------	-----------------	----	-----------------------------------

(三) 信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柴淵，字益深	信州 永豐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5。

## 六、荆湖南路

(一) 永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唐復，字子立	永州零陵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2。

## 七、廣南西路

(一) 兌州，共 1 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戴衍，字在伯	兌州	嘉定十年 (1217) 進士	奉議郎知常 熟縣，正八 品。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6〈戴衍字序〉， 頁 103。

八、 未知居住地，共27人

編號	姓名	籍貫	功名	官職官品	附記	出處
1	于悅道				〈祭于悅道文〉：「自子束書，從予游於明招，八年于茲矣。」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8〈祭于悅道文〉，頁 127。
2	方自牧				祭文中自稱學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江必東等〉，頁 788。

3	王抑			祭文中自稱 學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江必東等〉， 頁 788。
4	王莘叟			作呂氏《古 易》十二卷音 訓。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 《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第 5 冊，卷 82，〈書臨漳所刊四經後〉，頁 3888-3890。
5	毛椽			〈與朱侍 講〉：「此郎 舊雖相從作 舉業，不登門 久矣。」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8〈與朱侍講〉， 頁 438。
6	江注，字必東			祭文中自稱 學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江必東等〉， 頁 788。

7	李知微，字中甫			知信州，從六品。	祭文中自稱門人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李知微〉，頁 805-806。
8	李厚之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23。
9	吳友聞，字季益			縣丞，從八品。	祭文中自稱學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3〈吳縣丞季益〉，頁 796；《東萊呂太史外集拾遺》，卷 5〈為吳友聞作謝發解啟〉，頁 690。
10	吳儀鳳				祭文中自稱學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江必東等〉，頁 788。
11	孟行古				哀詩自稱門人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門人孟行古〉，頁 817。
12	俞厚，字德載			太平州司戶參軍，從九品。	祭文中自稱門人。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俞司戶德載〉，頁 800。

13	高觀，字元晦			祭文中自稱門人。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高元晦等〉，頁 810。
14	徐暄			哀詩自稱門人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壬寅仲秋二十有五日門人徐暄哭東萊先生之墓〉，頁 813。
15	徐堯臣			〈祭徐堯臣文〉：「麗澤之會，子復來居。乃鈔乃誦，以窮朝晡。」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8〈祭徐堯臣文〉，頁 128。
16	徐宗卿			嚴州學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8〈祭徐堯臣文〉，頁 129。

17	康文虎,字炳道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6。
18	康文豹,字衛道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頁 2446。
19	張蒙			邵武縣主簿,從九品。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35。
20	張成招			曾標注《左氏博議綱目》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55〈藝文志一〉,頁 5064。
21	張季清			〈祭張季清文〉:「子之在吾門,侃侃和飭,執經不怠。」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8〈祭詹子齊文〉,頁 132。

22	路德章			曾任官	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 73〈麗澤諸儒學案補遺〉，頁 2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9〈答竇文卿〉，頁 2822。
23	詹子齊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8〈祭詹子齊文〉，頁 130。
24	趙燁 (1138-1185) ，字景明	祖籍 開封		江東提刑 祭文中稱門 人。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趙提刑景明〉，頁 793。

25	趙焯 (?-1183)，字 景昭	祖籍 開封	乾道八年 (1172)進士	司直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46〈玉山學案〉，頁 1463。
26	趙善談			瓊莞安撫 使，從四品。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3〈麗澤諸儒學案〉， 頁 2446。
27	盧琰			祭文中自稱 學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 3〈江必東等〉， 頁 788。

〈表二〉 呂祖謙學生的地域分佈

排名	路級單位	州、府、軍	學生數量(位)	佔總學生數量比(%)
1	兩浙東路	婺州	95	
		明州	9	
		溫州	8	
		處州	7	
		越州	3	
		台州	2	
		衢州	1	
		<b>合計</b>	<b>125</b>	
2	兩浙西路	嚴州	11	
		臨安	1	
		常州	1	
		嘉興府	1	
		<b>合計</b>	<b>14</b>	
3	福建路	福州	7	
		建寧府	3	
		南劍州	2	
		漳州	1	
		<b>合計</b>	<b>13</b>	

4	江南東路	徽州	4	
		宜州	2	
		信州	1	
		<b>合計</b>	<b>7</b>	<b>4.2%</b>
5	江南西路	建昌軍	1	
		贛州	1	
		撫州	1	
		袁州	1	
		吉州	1	
		<b>合計</b>	<b>5</b>	<b>3%</b>
6	荆湖南路	永州	1	
		<b>合計</b>	<b>1</b>	<b>0.6%</b>
7	廣南西路	兗州	1	
		<b>合計</b>	<b>1</b>	<b>0.6%</b>
		學生數量總計	166 <sup>1</sup>	

<sup>1</sup> 尚有 27 名學生未知籍貫。

〈表三〉 南宋婺州歷年進士名單

西元	帝號	年份	狀元	進士名單	人數
1128	高宗	建炎二年	李易	胡邦直、范涓	2
1132	高宗	紹興二年 <sup>1</sup>	張九成	鄭剛中、唐堯封、樓圖南、 賈廷佐、章服、徐若訥、施 稱、陳良臣、徐憲、范大辨、 方庭實	11
1135	高宗	紹興五年	汪應辰	徐良能、潘良能、許直可、 盧燦、范端弼、范端許	6
1138	高宗	紹興八年	黃公度	鞏廷芝、陳巖尚、范端□。	3
1142	高宗	紹興十二年	陳誠之	應汝礪、鞏湘、何紳、陳存	4
1145	高宗	紹興十五年	劉章	王淮、潘良翰、楊定、楊永 言、陳良能	5

<sup>1</sup> 此科原於紹興元年（1131）舉行殿試，然因故拖延。據《宋會要輯稿》：「（紹興）三年二月一日，尚書省言：『昨建炎四年八月（1130），依條發解，合至紹興元年省試、殿試。緣當年行明堂大禮，展至紹興二年三月殿試。』」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第5冊，卷10649〈選舉16·發解〉，頁4513。

1148	高宗	紹興十八年	王佐	徐存、周邵、楊昴、王師愈、 葉衡、金鼎、季時亨、邵穎、 管文顯、楊旦	10
1151	高宗	紹興二十一年	趙達	范嗣蠡、潘慈明、唐仲友、 陳武子、王師伊、陳昭、劉 大辨、徐端卿、朱綬、湯烈	10
1154	高宗	紹興二十四年	張孝祥	曹冠、王師古、唐仲溫、陳 良祐、范端臣、范處義	6
1157	高宗	紹興二十七年	王十朋	張湔、周懋、喻良倚、喻良 能、應材、趙公丑、倪履信、 倪允才、范端旻	9
1160	高宗	紹興三十年	梁克家	唐仲義、何恪、林大中、章 涓、葉秀實、陳公亮、朱若 虛、范津、楊克忠	9
1163	孝宗	隆興元年	木待問	呂祖謙、時鑄、邵浩、潘景 憲、杜喬、馬之純、厲汪、 朱如璋、楊起巖、應孟明、 方果、范端方	12
1166	孝宗	乾道二年	蕭國梁	邵暹、何松、趙師尹、宗武、 陳炳、胡達可、徐木、徐若 睦、方晟	9
1169	孝宗	乾道五年	鄭僑	邵自明、徐總、湯麟、葉誕、 方秉哲	5
1172	孝宗	乾道八年	黃定	嚴福、楊潛、洪無競、湯覺、 羅端誠、趙善珍	6

1175	孝宗	淳熙二年	詹駉	喬夢符、葉惟休、包克、包安、繆友臯、陳志同、章程、俞厚、應子和、楊大瀾、鞏嶸	11
1178	孝宗	淳熙五年	姚穎	何坦、傅芷、葉維芑、包敏、曹莊	5
1181	孝宗	淳熙八年	黃由	邵困、時瀾、唐燁、陳黼、吳大用、李翱、陳之純、陳之綱、李彙、范九疇、鞏豐、葉介	12
1184	孝宗	淳熙十一年	衛涇	金式、邵康、王公邁、王謙之、楊誠之、許中應、唐吉先、葛洪、章徠、應雄飛、劉景修、徐鉅、劉三傑、范端光、潘友端。	15
1187	孝宗	淳熙十四年	王容	王益之、徐澄、徐孝、徐僑、葉禾、倪千里、孫灼、葉蓁、康仲穎、吳大成、葉南夫、戚如玉、羅宗祐	13
1190	光宗	紹熙元年	余復	王介、方宗元、潘自覺、時淇、邵繼元、戚如琥、倪瑀、趙彥柅、趙希伋、徐堯佐、徐次鐸、徐千秋、喻不伐、應謙之、胡棗、王碩、劉渙、唐仁傑、石範、宋甦、邵相。	21
1193	光宗	紹熙四年	陳亮	陳亮、朱質、黃畊、滕強恕、徐邦憲、陳震、喬行簡、朱群、王世冬、邵持遇	10

1195	寧宗	慶元元年		李誠之	1 <sup>2</sup>
1196	寧宗	慶元二年	鄒應龍	夏明誠、章如愚、王象之、潘自牧、葉秀發、姜彝、李大有、徐大年、何器、潘(水火臣)、應淡、方璿	12
1199	寧宗	慶元五年	曾從龍	應鏞、姜鏞、喻侃、胡儼、林慥、潘有開、潘子高、趙傳霖、應茂之	9
1202	寧宗	嘉泰二年	傅行簡	傅熙、王公袞、時涇、喬嘉、何達、曹煥、賈昉之、劉裕、陳殊、陳振、應純之、章時可、陳登、吳大年、喻演。	15
1203	寧宗	嘉泰三年		何淡、楊邁	2 <sup>3</sup>
1205	寧宗	開禧元年	毛自知	陶木、邵伯、邵式、邵熙元、徐雄、朱必強、朱倞、吳岐、方文煥	9
1208	寧宗	嘉定元年	鄭自誠	王望之、姜必達、范鐘、范鎔、孫瀾、周平之、呂殊、楊忱中、徐閏、趙汝金、邵自防	11
1211	寧宗	嘉定四年	趙建大	傅涇、喬元龍、趙汝鍵、趙汝鈞、趙汝蓋、許彥知、許彥能、徐介	8

<sup>2</sup> 上舍釋褐。

<sup>3</sup> 上舍釋褐。

1214	寧宗	嘉定七年	袁甫	楊焯、康植、陳申甫、厲仲銓、胡巖起、李衛、胡似、潘頓、石璞、徐興邦、呂康年	11
1217	寧宗	嘉定十年	吳潛	童居易、俞斐、陳武、趙希偈、許堪、許復道、喻國衡、童必大、李采、胡鳴鳳、劉晉之、邵自信	12
1220	寧宗	嘉定十三年	劉涓	劉涓、王桎、王植、王三才、劉沂、羅汝穎、徐煥、郭宗儀、陳林、徐夢發、石籌、葉之璩、郭始中	13
1223	寧宗	嘉定十六年	蔣重珍	虞復、朱元龍、龔應之、方應龍、樓大年、喬從龍、陳宣子、呂有德、何怡、李大同、郭伯中、王萬、阮煒、戴燭、張崑之、胡植、邵有開	17
1226	理宗	寶慶二年	王會龍	王公友、王定、馬光祖、趙希侈、趙希發、趙希山、毛炳、周勇、胡侁、章大醇、應松鑑、洪坎、洪鑑、盧子安	14
1229	理宗	紹定二年	黃朴	應文籍、楊點、楊貫、陳大猷、王鎔、趙與慥、趙汝奉、喬幼聞、高士龍、徐時升	10

1232	理宗	紹定五年	徐元杰	杜幼節、陳惟月、趙時政、 陳常武、鞏峻、楊瑱、楊樵	7
1235	理宗	端平二年	吳叔告	王龜鼎、王夢得、賈南金、 施朝宗、何塾、邵自衡、吳 希賢、吳因雷、王世傑、楊 夢高、葉謨、潘墀	12
1238	理宗	嘉熙二年	周坦	王困金、許子良、郭拯、劉 汝礪、樓祥、孫德之、徐璇、 樓晏、樓子固、趙時範、方 嘉錫、洪毅、邵忱、呂撫、 邵復、蔣厚、張翔、范士表	18
1241	理宗	淳祐元年	徐儼夫	邵纂、王夢達、朱傑、劉士 龍、何夢祥、呂遇龍、李自 立、馬潤祖、郭必大、厲孟 龍、陳謙亨、趙亮夫	12
1244	理宗	淳祐四年	留夢炎	王邁、盧斐之、何夢然、呂 開元、葉夢河、趙崇袍、范 應龍	7
1247	理宗	淳祐七年	張淵微	王璪、許觥、金昌年、高夢 虬、楊炳、吳應之、王若訥、 趙孟僊、陳一中、徐彬、徐 祐、徐庚金、胡庭芝、杜幼 丙、何子舉、胡居仁、盧時	25

				中、趙崇信、金之焱、毛洪、趙汝沓、方策、方安分、方安性、李恃。	
1249	理宗	淳祐九年		胡時敏、胡時可	2
1250	理宗	淳祐十年	方逢辰	倪普、潘鎬、方麒、俞能千、何揆、厲能、王自、朱金、黃夢炎、徐繩祖、楊峴、周臯。	12
1252	理宗	淳祐十二		胡時亨、胡漢符	2 <sup>4</sup>
1253	理宗	寶祐元年	姚勉	時少章、孫繼學、杜幼屋、劉仲淵、厲文翁、趙若墀、趙若(土臯)、杜幼存、吳遇吉、黃燦文、朱謙亨、胡雲龍、趙時嘉、呂圭、趙汝祥、張夢弼、何明仲、呂直之	18
1256	理宗	寶祐四年	文天祥	方永仁、方安國、方安邦、趙孟瀾、趙必偶、趙時恚、趙西泰、倪澄、徐希林、徐紘、陳英發、朱天與、盧深夫、鄭自立、馬光國、何忭、趙崇淦	17

<sup>4</sup> 漕貢進士

1259	理宗	開慶元年	周震炎	章榘、劉仲實	2
1262	理宗	景定三年	方山京	徐昺獻、施郁、朱應象、呂應焱、何夢開、許元沐、章光謙、李應符、方權、趙崇賀、蔣思	11
1265	度宗	咸淳元年	阮登炳	許子宏、陳君采、趙與暹、趙與調、趙與濩、趙時歷、徐元善、趙若恢、朱津龍、朱夢周、陳文傑、何逢年、章天昇、趙孟璫、章桂、趙汝僊、趙崇萊、趙崇澆、趙崇節、呂然	20
1268	度宗	咸淳四年	陳文龍	施南一、朱夢魁、朱叔麒、朱宗周、徐文潤、趙孟瓊、葉壽朋、曾應魁、邵述、胡能	10
1271	度宗	咸淳七年	張鎮孫	徐鑑、徐木潤、曾應革、李貫、龔愷、章如玉、趙若焱、陳松龍、趙孟璫。	9
1274	度宗、咸淳	甲戌、十年	王龍澤	王龍澤、朱炎、趙孟孫、陳霖、陳夢魁、胡之純、呂榮孫、胡與權、周夢桂、陳合、趙必霖、盧粟之、方啟源、方三讓	14

一般進士	527
國學、太學、漕貢	9
總計	536



〈表四〉 北宋初期（973-1063）殿試歷年考題<sup>1</sup>

年代	詩題	出處	賦題	出處	論題	出處
太祖開寶六年 (973)	懸爵待士	《舊唐書》	未明求衣	《梁書》		
八年(975)	龍舡習水戰	新題	橋梁渡長江	新題		
太宗太平興國二 年(977)	主聖君賢	新題	訓兵練將	新題		
三年(978)	二儀合德	《莊子》	不陣而成功	桓溫《鹽鐵論》	登講武臺觀習 戰	新題
五年(980)	明州進白鸚鵡	新題	春雨如膏	新題	文武何先	新題
八年(983)	鸚鵡上林	新題	六合為家	《史記》	文武雙興	新題
雍熙二年(985)	烹小鮮	《老子》	穎川貢白雉	新題	玄女授兵符	道教典故

<sup>1</sup> 表中共 35 次考試，94 道題目：40 題出自儒典，17 題出自史籍，13 題出自道家典籍，2 題為道教典故，12 道新題；此表本由林天蔚所整理，後為林岩所轉引，唯二氏皆未標明題目出處，姑以此續貂。見林天蔚，《宋史試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18-21。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72-74。

端拱元年（988）	堂上有奇兵	《戰國策》	一葉落知天 下秋	《淮南子》		
二年（989）	五色一何鮮	曹丕〈芙蓉池〉	聖人不尚賢	《老子》	禹拜昌言	《尚書》
淳化三年（992）	射不主皮	《儀禮》	卮言日出	《莊子》	儒行	《禮記》
真宗咸平元年 （998）						
二年（999）						
三年（1000）	崇德報功	《尚書》	觀人文以化 成天下	《易經》	為政寬猛先後	《舊唐書》
五年（1002）	高明柔克	《尚書》	有物混成	《老子》	君子黃中通理	《易經》
景德二年（1005）	德輶如毛	《詩經》	天道猶張弓	《老子》	以八則治都鄙	《周禮》
大中祥符元年 （1008）	明徵定保	《尚書》	清明象天	《禮記》	盛德大業	《周易》
二年（1009）	神無方	《周易》	大德曰生	《周易》	升降者禮之末 節	《禮記》
四年（1011）	神以知來	《周易》	禮以承天道	未詳	何以為大道之 序	《莊子》

五年（1012）	天險不可升	《周易》	鑄鼎象物	《春秋左氏傳》	以人占天	《法言》
七年（1014）	沖氣為和	《老子》	道無常名	道教經典	天地何以猶橐籥	《老子》
八年（1015）	君子以恐懼修省	《周易》	置天下如置器	《大戴禮記》	順時慎微其用何先	《尚書》
天禧三年（1019）	君子居易以俟命	《禮記》	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	日宣三德	《尚書》
仁宗天聖二年（1024）			德車結旌	《禮記·曲禮》		
五年（1027）	南風之薰	《禮記》	聖有謨訓	《尚書》	執政如金石	未詳
八年（1030）	博愛無私	董仲舒〈賢良對策〉	藏珠於淵	《莊子》	儒者可與守成	《史記》
景祐元年（1034）	和氣致祥	《漢書》	房心為明堂	《周禮》	積善成德	《大戴禮記》
五年（1038）	鯤化為鵬	《莊子》	富民之要在節儉	《史記》	廉吏民之表	《漢書》
慶曆二年（1042）	吹律聽鳳鳴	《隋書》	應天以實不以文	《漢書》	順德者昌	《漢書》

六年（1046）	形鹽象武	《春秋》	戒祀國之大 事	《春秋左氏傳》	兩漢循吏孰優	新題
皇祐元年（1049）	日昃不暇食	《尚書》	蓋軫象天地	道教典籍	天聽君人之言	《史記》
五年（1053）	吹律聽軍聲	《周禮》	《圓丘象天 賦》	《後漢書》	《樂本人心論》	《禮記》
嘉祐二年（1057）	鸞刀	《詩經》	民監	《尚書》	重巽命	《易經》
四年（1059）	求遺書於天下	《漢書》	堯舜性仁	《孟子》	易簡得天下之 至理	《周易》
六年（1061）	天德清明	《詩經》	王者通天地 人	未詳	水幾於道	《老子》
八年（1063）	樂通神明	《漢書》	寅畏以饗福	郭璞〈省刑疏〉	成敗之幾在察 言	《後漢書》

〈表五〉 南宋孝宗朝（1163-1189）省試考官名單

開科紀年	知貢舉	同知貢舉	參詳官	點檢試卷
孝宗 隆興元年 (1163)	洪遵	周葵、張震	胡銓、楊民望、宋似孫、 錢豫、吳龜年、魏杞、陳 良翰、芮燁 (共 8)	唐閱、陳天麟、尹穡、龔茂良、王悅、吳祇若、惠迪、 鄒樗、張之剛、王東里、方燾、張宋卿、鄭丙、陶去 秦、劉敦義、高遜、陳禾、單時、范成大、潘慈明、 俞曄、劉大辯、莫冲 (共 23)
乾道二年 (1166)	蔣芾	林安宅、梁克家	胡沂、陳巖尚、汪大猷、 王伯庠、張敦實、單時、 沈洵、黃石 (共 8)	徐良能、李遠、丘鐸、李彥穎、梁介、王銜、施師點、 劉大辯、李簡能、龔滂、蔣繼周、嚴煥、林信厚、郝 升卿、潘慈明、曾元、吳湯輔、萬鍾、葉份、鄭昺 (共 20)
乾道五年 (1169)	汪應辰	梁克家、陳良祐	汪大猷、胡襄、李燾、晁 公遯、陶去泰、芮燁、陳 禾、劉季裴 (共 8)	施元之、楊興宗、劉惇、盧傳霖、錢俣、薛鳳、劉國 瑞、周祐、陳從古、鄭昺、樓鑄、施知彰、朱璩、陳 善、宋敦書、胡鎬、張駒、袁樞、程宏圖 (共 19)

乾道八年 (1172)	王曦	趙雄、葉衡	黃鈞、劉季裴、顏度、趙思、留正、林光朝、楊興宗、趙汝愚(共8)	尤袤、蕭國梁、崔淵、楊恂、王質、王公袞、木待問、丁時發、呂祖謙、唐仲友、蔡戡、柴衛、王卿月、邵說、姚宗之、陳自修、沈瀛、曾植、俞光疑、李嘉言(共20)
淳熙二年 (1175)	王淮	胡元質、范仲芑	王晔、王希呂、鞏湘、江溥、薛元鼎、傅伯壽、王公袞(共7)	吳飛英、何萬、沈揆、曾植、葛邲、朱繹之、劉溥、劉甄夫、石起宗、蓋經、樂備、彭椿年、胡一之、何澹、胡南逢、王維之、蔣雛、張駟、周碩、陳易、鄭鏐(共21)
淳熙五年 (1178)	范成大	程大昌、蕭燧	齊慶胄、戴幾先、傅淇、閻蒼舒、何伯謹、潘緯、徐詡、周必大(共8)	沈揆、劉溥、袁說友、林元奮、章謙、宇文作、吳天驥、鄭鑑、何鹿、胡晉臣、葉山、胡南逢、陳資深、黃閣、吳博古、萬鍾、張商卿、周文擢、高栗、陳義(共20)
淳熙八年 (1181)	王希呂	鄭丙、黃洽	杜民表、沈揆、吳宗旦、余端禮、顏師魯、朱時敏、袁樞、范仲藝(共8)	汪義端、王藺、李嘉謀、徐誼、郭明復、奚商衡、詹駉、李巖、趙彥中、熊克、楊輔、趙大猷、劉光祖、王謙、吳天驥、樊抑、周震來、徐玠、劉德秀、方有開(共20)

淳熙十一年 (1184)	王佐	王藺、蔣繼周	朱安國、王信、史彌大、 沈揆、朱時敏、張叔椿、 何澹、范仲藝 (共 8)	李嘉言、黃倫、趙善譽、趙大猷、方有開、趙鞏、張 濤、王三恕、程宏圖、彭仲剛、梁汝永、莫叔光、章 穎、謝修、胡長卿、張遜、王厚之、張伯垓、計衡、 郭彖 (共 20)
淳熙十四年 (1187)	洪邁	葛邲、陳賈	吳博古、沈揆、朱時敏、 楊萬年、范仲藝、石起宗、 鄭汝諧、黃倫、梁汝永、 李詳。	宋之瑞、謝修、劉崇之、謝深甫、倪思、黃黼、張濤、 鄭湜、馮震武、沈清臣、王齊輿、黃唐、戴履、陳杞、 鄧駟、王厚之、趙伯成、曾三復、霍箎、周擘、孫逢 吉、李知己、毛壺、沈有開 (共 24)

資料來源：《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十》



〈表六〉 南宋光宗朝（1190-1194）省試考官名單

開科紀年	知貢舉	同知貢舉	參詳官	點檢試卷
紹熙元年 (1190)	鄭僑	何澹、陳騏	丘密、謝源明、謝深甫、倪思、張濤、邵驥、黃艾、鄧駟、衛涇、黃由(共 10)	孫逢吉、曾三復、李寅仲、陳士楚、王叔簡、虞儔、石宗昭、徐楸、鄭公顯、丘泳、黃灝、李謙、孟浩、何異、俞言、祝禹圭、呂宗孟、李大異、方廷堅、王源、彭龜年、彭寅、陳棟(共 23)
紹熙四年 (1193)	趙汝愚	黃裳、胡瑑	王厚之、黃艾、汪義端、李謙、鄭公顯、沈有開、彭龜年、李唐卿(共 8)	彭演、范仲黼、陳棟、楊大法、蔡幼學、李景和、楊大全、范蓀、邵康、曾秘、陳峴、王源、李大異、田澹、顏械、陳崑、雷孝友、吳獵、孫元卿、蘇大任(共 20)

資料來源：《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十二》

〈表七〉 南宋寧宗朝（1195-1224）省試考官名單

開科紀年	知貢舉	同知貢舉（監試）	參詳官	點檢試卷
慶元二年 （1196）	葉翥	倪思、劉德秀	張濤、高文虎、鄭公顯、張貴謨、衛涇、胡紘、姚愈、王奭、顏棫、李壁（共10）	范蓀、羅克開、陳樸、宋思遠、楊大全、費士寅、劉誠之、陳廣壽、余復、陳峴、張經、陳希點、黃聞、商飛卿、周莘、沈繼祖、曾漸、楊寅、潘友端、陳暉、吳仁傑、王申、鍾必萬、葉挺（24）
慶元五年 （1199）	黃由	胡紘、劉三傑	楊王休、趙介、陳謙、程松、李景和、孟必先、奚士遜、易祜（8）	鍾必萬、許開、李埴、王輝、趙夢極、徐似道、汪文振、余崇龜、蕭達、高似孫、楊濟、俞亨宗、林采、王已、陳晦、胡元衡、王克勤、馬惟和、朱慶弼、朱茂良（20）
嘉泰二年 （1202）	木待問	王容、施康年	宇文紹節、孟綸、鄧友龍、張布、蕭達、汪文振、胡元衡、陸峻（共8）	盛庶、趙夢極、朱欽則、周夢詳、葉宗魯、張訴、鍾將之、曾槐、黃景說、陳鑄、林行可、葉時、朱質、談鑰、李蔓卿、黃謙、顧杞、黃樞、王庭之、尚朴（共20）

開禧元年 (1205)	蕭達	陸峻、李大異、 李璧	陳樸、陳峴、雷孝友、汪 文振、趙夢極、鄒應龍、 葉時、朱質(8)	陳嘉猷、蘇士能、卓洵、商許、留駿、莫若冲、張從 祖、許奕、蘇大璋、高文善、常褚、黃疇若、晁伯談、 喬夢符、程卓、余嶸、范子長、唐吉先、陳振(19)
嘉定元年 (1208)	樓鑰	倪思、蔡幼 學、葉時	曾從龍、王柟、商許、陳 晦、曹莊、章良肱、劉庶、 何刻、莊夏(9)	陳模、林至、劉允濟、章徠、耿羽、潘涓、真德秀、 滕強恕、陳剛、林瑒、李琪、黃以寧、孫杓、蔣惟曉、 喬行簡、柴中行、樓昉、胡林卿、孔煒、李誠之、林 復之、許文蔚(22)
嘉定四年 (1211)	汪達	劉榘、曾從龍、 范之柔	張斗南、丁端祖、程卓、 趙汝謐、林復之、薛紱、 李道傳、趙崇憲(8)	陳璧、陳卓、程遇孫、應武、石宗萬、金式、劉靖之、 俞建、張方、陳貴誼、丁焞、朱端常、黃伯劑、葉蔡、 羅仲舒、應元袞、陳殊、許儀、王同、謝伯常(20)
嘉定七年 (1214)	曾從龍	范之柔、鄭昭 先、劉燾	黃宜、劉靖之、林夢英、 楊汝明、吳格、蔡闢、曾 煥、袁韶(8)	周槃、任一鶚、吳困、楊迪、盛章、李楠、馮令圖、 鄭之悌、陳黼、孔煒、方秉哲、趙崇猷、張已之、余 鑄、孔元忠、楊宏中、王仁、傅雍、陳公益、王淪(20)
嘉定十年 (1217)	黃疇若	任希夷、黃 序、袁燮	楊汝明、林岳、丁焞、孔 煒、趙愼夫、施累、李鳴 鳳、范擇能(8)	孔元忠、張處、張已之、徐澄、趙元儒、王夢龍、蕭 舜咨、趙希齊、陳德豫、何應龍、方秉哲、朱憲、王 珪、樓昉、徐鳳、許應龍、陳公益、葛從龍、黃灝(19)

嘉定十三年 (1220)	宣繒	俞應符監試，楊 汝明、李安行	王棐、林岳、臧格、陳德 豫、馮多福、方猷、何應 龍、徐鳳(8)	王藻、李鼎、李畏、盧祖臯、何剡、牛斗南、趙汝伋、 應鏞、許應龍、周端朝、陳公益、宋倚、曾噩、陳無 損、徐範、皇甫曄、林棐、謝興甫、楊邁、潛敷(20)
嘉定十六年 (1223)	程秘	朱著、鄭自誠、 李伯堅	方猷、曾煥、吳格、魏了 翁、秦季標、盧祖臯、王 克恭、鍾震、陳公益、葛 從龍(10)	丘櫛、陶崇、楊邁、方淙、趙至道、馮特卿、李大有、 陳觀、李勳、李知新、楊璘、王與權、高熙績、李宗 勉、周直方、陳登、葉武子、富皞、林良顯、李劉、 潛敷、田克悉、戴栩、照略(24)

資料來源：《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十二》



〈表八〉 南宋道學家（朱陸張呂）弟子擔任考官次數表

	孝宗	光宗	寧宗	總計(次)
總考官人數	287	67	319	673
呂祖謙	2	3	15	20
朱熹	0	3	10	13
張栻	1	5	6	12
陸九淵	0	0	3	3
其他	19	15	19	53
總計	22	26	53	101
佔總考官人 次百分比	7%	38%	17%	15%

資料來源：據〈表五〉、〈表六〉、〈表七〉

## 徵引書目

### 一、中日韓文徵引書目

#### (一) 史料

不著撰人，《宋寶祐四年登科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不著撰人，《慶元黨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不著撰人，《十先生輿論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不著撰人，《羣書會元截江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方頤孫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初三山方氏刊本。

王安石，《周官新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王明清，《揮塵錄》，《歷代筆記叢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王治國編，趙泰牲增修，《金華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 497 號，共 2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增刊本影印。

王梓材，馮雲濠輯，《稿本宋元學案補遺》，北京：北京圖書館，2002，據清道光十八（1838）42卷本影印。

王梓材，馮雲濠輯，張壽鏞校，《宋元學案補遺》，共8冊，台北：世界書局，2002，據清道光二十（1840）100卷本影印。

王應麟，《玉海》，共8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據清光緒九年（1883）浙江書局刊本影印。

\_\_\_\_\_，〈辭學指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王懋竑，《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清乾隆十七年（1752）白田草堂初刻本影印。

王懋德等修，陸鳳儀等編，《金華府志》，《中國方志叢書》第498號，共5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明萬曆六年（1578）刊本影印。

全祖望，《鮚埼亭集內編》，收入朱鑄禹校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收入朱鑄禹校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司馬遷著，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臺北市：鼎文書局，200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_\_\_\_\_，〈伊洛淵源錄〉，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_\_\_\_\_，〈朱子語類〉，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 14-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_\_\_\_\_，〈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 20-2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_\_\_\_\_，〈近思錄〉，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朱熹，呂祖謙，〈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錄〉，南宋末建安曾氏刊本，

李心傳，〈道命錄〉，〈知不足齋叢書〉第 251-253 冊，臺北：藝文出版社，1966。

\_\_\_\_\_，〈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據《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_\_\_\_\_，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共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

李燾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共 20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阮元，〈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阮元聲，〈東萊呂成公年譜〉，收入于浩輯，〈宋明理學家年譜〉第 7 輯，北京：北京圖書館，2005。

沈藻等修，朱謹等編，〈永康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 528 號，共 3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本影印。

呂希哲，〈呂氏雜記〉，〈四庫全書珍本別輯〉第 21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呂祖謙，〈十七史詳節〉，共 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少儀外傳〉，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2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古文關鍵〉，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左氏博議〉，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6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左氏傳說〉，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7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左氏傳續說〉，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7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左傳類編〉，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6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東萊呂太史文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東萊呂太史外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東萊集注觀瀾文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0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東萊標注三蘇文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 1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兩漢精華〉，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7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春秋集解〉，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5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皇朝文鑑〉，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2-14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詩律武庫〉，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6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歷代制度詳說〉，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9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麗澤集詩〉，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5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麗澤論說集錄〉，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續增歷代奏譯麗澤集文〉，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6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_\_\_\_\_，〈精騎〉，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婺州永康清渭陳宅刊本。

\_\_\_\_\_，〈論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汪應辰，《文定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據《聚珍版叢書》本影印。

吳子良，《林下偶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據明《寶顏堂秘笈》本影印。

吳師道，《敬鄉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周必大，《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林駟，黃履翁著，《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臺北：洪浩培印行，1969，據國防研究院藏明未翻刻方圓沙分院本影印。

林駟，黃履翁著，《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4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林表民，《赤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真德秀，《文章正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_\_\_\_\_，《續文章正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班固著，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並附編二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97。

俞成，《螢雪叢說》，《叢書集成初編》第 10 冊，臺北：藝文出版社，1965。

俞文豹，《吹劍錄附外集》，《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祝穆，《方輿勝覽》，全 3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據宋刻本影印。

\_\_\_\_\_，《事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25-92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徐用檢修，《蘭谿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 517 號，共 2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原刊，清康熙間補刊本影印。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共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據北平圖書館藏本影印。

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出版社，1958，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袁采，《袁氏世範》，《叢書集成新編》第 3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

袁燮，《絜齋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據《聚珍版叢書》本影印。

陸九淵，《象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章如愚，《群書考索》，《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36-9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陳思，《兩宋名賢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2-13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陳亮輯，《歐陽文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2-11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陳亮，《龍川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據《金華叢書》本影印。

陳亮輯，《蘇門六君子文粹》，《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455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陳淳，《北溪字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_\_\_\_\_，《北溪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陳傅良著，方逢辰批點，《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0 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據明成化六年（1470）朱暉嚴陵郡齋刻本影印。

\_\_\_\_\_，《止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_\_\_\_\_，《永嘉先生八面鋒》，《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陳繹曾，《精選增入文筌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元刊本。

張栻，《南軒文集》，全 4 冊，臺北，故宮博物院，1981，據宋刊本影印。

\_\_\_\_\_，《南軒集》，全 2 冊，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清道光年間（1821-1850）刊本。

\_\_\_\_\_，《南軒論語解》，臺北：藝文出版社，1966，據《通志堂經解》本影印。

脫脫，《宋史》〔新校本〕全 40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黃榦，《勉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黃震，《黃氏日抄》，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據日本立命館大學圖書館藏宋本影印。

黃宗羲著，陳金生點校，《宋元學案》，共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據道光二十六年（1846）何汝霖刻本影印。

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全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據清同治十年（1871）涂宗瀛刻本影印。

葉適，《水心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據四部叢刊明刻黑口本影印。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清光緒十一年（1885）瑞芳黃體芳刻本。

詹大和等著，裴汝誠點校，《王安石年譜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

劉達可，沈懷，《璧水群英待問會元選要》，《續修四庫全書》第 12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南京圖書館藏明麗澤堂本影印。

熊節編，熊剛大注，《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元建刊本。

諸自穀等修，程瑜等編，《義烏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 82 號，共 2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清嘉慶七年（1802）刊本影印。

鄭剛中，《北山文集》，全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據《金華叢書》本影印。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

潘自牧，《記纂淵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30-93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謝枋得，《文章軌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樓昉，《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樓鑰，《攻媿集》，《叢書集成初編》第 2003-2022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36，據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影印。

歐陽修著，周必大編，《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2-11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魏天應編，林子長標注，《論學繩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全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據《聚珍版叢書》本影印。

戴溪，《石鼓論語答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譚金孫，《新刊精選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前集》，臺北：藝文出版社，1972，據《聚珍版叢書》本影印。

薛季宣，《浪語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二) 專書

孔東，《宋代東萊呂氏之族望及其貢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王一勝，《宋代以來金衢地區經濟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王水照編，《新宋學》第 2 輯，浙江：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王建秋，《宋代太學與太學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王德毅，《宋史研究論集：第二輯》，臺北：鼎文出版社，1972。

- 田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 《朱熹的思維世界》, 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增訂版。
- 田浩, 《功利主義儒家: 陳亮對朱熹的挑戰》,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
- 田浩編, 《宋代思想史論》,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 包弼德 (Peter K. Bol), 《斯文: 唐宋思想的轉型》,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
- 弗洛里安·茲納涅茨基 (Florian Znaniecki), 《知識人的社會角色》,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02。
- 寺田遵, 《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臺北: 稻禾出版社, 1995。
- 朱剛, 劉寧主編, 《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李弘祺, 《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 臺北: 聯經出版社, 1994。
- 李弘祺編, 《中國與東亞的教育傳統 (一) 中國的教育與科舉》, 臺北: 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2006。
- 李兵, 《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
- 李伯宏, 周生春主編, 《江南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 (960-1850)》,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 狄百瑞著, 李弘祺譯, 《中國的自由傳統》,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9。
- 杜保瑞, 《北宋儒學》,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5。
- 余英時, 《朱熹的歷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全 2 冊, 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_\_\_\_\_，〈《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1976。

沈兼士，〈《中國考試制度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台灣學生出版社，2009。

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昌彼得，〈《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出版社，1974。

柳立言編，〈《宋元時代的法律思想與社會》〉，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

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發行，2006。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書局，2001。

\_\_\_\_\_，〈《宋代的州縣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

周夢江，〈《葉適與永嘉學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荒木敏一，〈《宋代科舉制度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9。

浙江師範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編，〈《江南文化研究第一輯：呂祖謙與浙東學術研究專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高明士，〈《中國教育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_\_\_\_\_，〈《中國教育制度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

\_\_\_\_\_，《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收入王水照編，《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陳安金，王宇，《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崛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陳飛，《歷史的苦澀：舉子的命運》，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

\_\_\_\_\_，《唐代試策考述》，北京：中華書局，2002。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陳茂同，《中國歷代職官沿革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陳弱水，王汎森主編，《思想與學術》，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臺北：學生出版社，1988。

\_\_\_\_\_，《朱子門人》，臺北：學生出版社，1982。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

程水龍，《《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全4冊，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全2卷，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

黃寬重，《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_\_\_\_\_，《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

海格爾（John Winthrop Haeger）著，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

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0。

賈志揚（John Chaffee），《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_\_\_\_\_，《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劉子健，《兩宋研究史彙編》，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

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

劉昭仁，《呂東萊之文學與史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劉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_\_\_\_\_，《科舉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_\_\_\_\_，李兵，《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社，2006。

甯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

潘富恩，徐餘慶著，《呂祖謙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錢穆，《國史大綱》，全二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_\_\_\_\_，《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蘭臺出版社，2001。

鄭健行，《科舉考試文體論稿—律賦與八股文》，臺北：臺灣書局，1999。

聶崇岐，《宋史叢考》，台北：華世出版社，1986。

關長龍，《兩宋道學的命運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三) 期刊論文

小島毅，〈宋學諸派中之朱學地位〉，收入漆俠編，《宋史研究論文集：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九屆年會編刊》，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頁 516-528。

王宇，〈南宋科場與永嘉學派的崛起——以陳傅良與《春秋》時文為個案〉，《浙江社會科學》2(2004.03): 151-156。

王章偉，〈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以河南呂氏家族為例〉，《新史學》4.3(1993.09): 18-56。

王夢鷗，〈晚唐舉業與詩賦格樣〉，《東方雜誌》16.9(1983.03): 18-56。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1(2002.03): 165-204。

\_\_\_\_\_，〈論陳亮與道學的關係——以宋刻本《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中的漢論為中心〉，《大陸雜誌》78.2(1989.02): 1-5。

\_\_\_\_\_，〈重尋歷史上的呂祖謙〉，《大陸雜誌》91.2(1989.02): 1-12。

包弼德，〈蘇軾作品在南宋婺州研讀情況考〉，收入王水照編，《新宋學》第2輯，浙江：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頁292-308。

\_\_\_\_\_，〈地方史的興起：宋元婺州的歷史和文化〉，《歷史地理》21(2006): 432-452。

\_\_\_\_\_，〈論停滯與失敗——思想意識形態與歷史：兩個初步的問題之一〉，《清華大學學報》21.2(2006): 5-16。

杜海軍，〈論呂祖謙研究中的偏見〉，《浙江師範大學學報》33.4(2007.07): 1-4。

宋鼎宗，〈宋儒春秋攘夷說〉，《成功大學學報（科技人文篇）》18(1983.03): 7-29。

\_\_\_\_\_，〈宋儒春秋尊王說〉，《成功大學學報（科技人文篇）》19(1984.03): 1-36。

林素芬，〈呂祖謙的辭章之學與古文運動〉，《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8.2(1995.12): 145-161。

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3(1986.09): 553-584。

馬愷之 (Kai Marchal)，〈論呂祖謙、朱熹的諫君思想與政治哲學內涵〉，收入浙江師範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編，《江南文化研究第一輯：呂祖謙與浙東學術研究專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110-129。

浙江省武義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呂祖謙與浙東明招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梁庚堯，〈南宋的貢院〉，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24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 239-282。

\_\_\_\_\_，〈南宋教學行業興盛的背景〉，收入田慶餘等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559-570。

\_\_\_\_\_，〈宋代的義學〉，《臺大歷史學報》，24(1999.12): 177-224.

\_\_\_\_\_，〈士人在城市：南宋學校與科舉文化價值的展現〉，收入劉翠溶，石守謙主編，《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中央研究院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 265-326。

\_\_\_\_\_，〈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33 輯，臺北，蘭臺出版社，2003，頁 49-124。

\_\_\_\_\_，〈宋代福州士人與舉業〉，《東吳歷史學報》11(2004.06): 175-213。

夏長樸，〈從李心傳《道命錄》論宋代道學的成立與發展〉，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36 輯，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65。

陳芳明，〈宋代正統論的形成背景及其內容〉，收入陳弱水等編，《思想與學術》，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106-123。

陳開勇，〈呂夷簡與婺州呂氏的家族佛學傳統〉，《浙江師範大學學報》32.4(2007.07): 8-11。

陳慶新，〈宋儒春秋尊王要義的發微與其政治思想（上）〉，《新亞學報》10.1（上）(1972.12): 269-368。

陳寶良，〈秀才學問與舉業文章——明代學術史一隅〉，《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3.1(2003.03): 29-50。

黃寬重，〈從和戰到南北人——南宋時代的政治難題〉，收入黃寬重，《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3-26。

甯慧如，〈朱熹論科舉〉，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33 輯，臺北：蘭臺出版社，2003，頁 125-166。

鄒重華，〈宋代民間藏書與地方文化發展之關係：以四川地區為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4(2004): 33-58。

廖咸惠，〈祈求神啟——宋代科舉考生的崇科行為與民間信仰〉，《新史學》15.4(2004.12): 41-92。

劉子健，〈王安石曾布與北宋晚期官僚的類型〉，《清華學報》2.1(1960.05): 109-129。

\_\_\_\_\_，〈南宋君主和言官〉，《清華學報》8.1/2(1970.08): 340-349。

\_\_\_\_\_，〈從儒將的概念說到歷史上對南宋初張浚的評論〉，收入楊聯陞等編，《國史釋論（下冊）》，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頁 481-490。

劉祥光，〈中國近世地方教育的發展：徽州文人、塾師與初級教育，1100-180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 1-45。

\_\_\_\_\_，〈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2000.05): 57-90。

\_\_\_\_\_，〈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2(1996.09): 46-68。

劉海峰，〈科舉制的起源與進士科的起始〉，《歷史研究》6(2000.12): 3-16。

鄭芳祥，〈葉適《習學記言序目》論呂祖謙《宋文鑑》研究〉，《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2006.06): 209-236。

謝康倫 (Conrad Schirokauer)，〈論偽學之禁〉，收入海格爾 (John Winthrop Haeger) 等著，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

#### (四) 博碩士論文

陳佑昌，《呂祖謙《左傳》人物評論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8。

吳春山，《呂祖謙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

林文騰，《呂祖謙《皇朝文鑑》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林建勳，《呂東萊的春秋學》，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官志隆，《呂祖謙麗澤書院講學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胡昌智，《呂祖謙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

馬秀嫻，《呂祖謙之理學研究》，香港：香港大學新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許佩珊，《呂祖謙教育理論與實踐》，台中：私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許修嘉，《陳亮與呂祖謙學術思想異同——思想合流契機》，台中：私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許愛蓮，《呂祖謙及其《東萊博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黃淑娟，《呂祖謙教育思想及其成學背景之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甯慧如，《南宋儒者的入仕與教學——特別關注道學家的重實踐》，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 二、西文徵引書目

### (一) 專書

Bol, Peter Kees.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ffee, John William, and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d.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Chow Kai-wing.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e Weerd, Hilde Godelieve Dominique.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Hymes, Robert Paul.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Hymes, Robert Paul,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Lee, Thomas H.C., ed. *The New and The Multiple: Sung Senses of the Pas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Lo, Winston Wa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Yeh Shih*.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74.

\_\_\_\_\_.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of Sung China: With Emphasis on Its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Smith, Paul Jakov,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 *The Su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Wilson, Thomas A. *Genealogy of the Way: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Walton, Linda A. *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二) 期刊論文

Elman, Benjamin A. "The Formation of "Dao Learning" as Imperial Ideology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eds. Theodore Hunter,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8-82.

Bol, Peter Kees.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Wuzhou ca. 1200 -- Finding a Place for Pan Zimu and the Complete Source for Compositio." 收入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秘書處編輯,《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96,頁738-788。

\_\_\_\_\_. "Examinations and Orthodoxies: 1070 and 1313 Compared." In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eds. Theodore Hunter,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9-57.

\_\_\_\_\_. “Zhang Ruyu, the Qunshu kaosuo,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Evidence from Dongyang County in Wuzhou.” 收入田慶餘等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 644 -673。

\_\_\_\_\_.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n Jinhua.” *Ming Studies* 40 (1998): 5-12.

\_\_\_\_\_.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 no. 1 (June 2001): 37-76.

\_\_\_\_\_.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s. Richard von Glahn and Paul Smi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241-83.

de Weerd, Hilde Godelieve Dominique. “Canon Formation and Examination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Guwen and Daoxue Traditions.”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no.29 (1999): 93-134.

\_\_\_\_\_. “Byways in the Imperial Chinese Information Order: The Dissemination and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State Document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 no.1 (2006): 145-188.

\_\_\_\_\_. “Changing Mind Through Examination: Examination Cr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6, no.3 (2006): 370-374.

\_\_\_\_\_. “Content and Composi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Lqian” Examination Teaching.” 收入浙江師範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編，《江南文化研究第一輯：呂祖謙與浙東學術研究專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 92-109。

Gardner, Daniel K. “Principle and Pedagogy: Chu Hsi and The Four Book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4, no.1 (June 1984): 57-81.

- \_\_\_\_\_. "Transmitting The Way: Chu Hsi and His Program of Learn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9, no.1 (June 1989): 141-172.
- \_\_\_\_\_. "Modes of Thinking and Modes of Discourse in the Sung: Some Thoughts on the Yü-lu("Recorded Conversations")Text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no.3 (August 1991): 574-603.
- \_\_\_\_\_. "Confucian Commentar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no.2 (May 1998): 397-422.
- 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no.2 (December 1982): 365-442.
- Tillman, Hoyt Cleveland. "Ch'en Liang on Statecraft: Reflections From Examination Essays Preserved in a Sung Rare Book."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 no.2 (December 1988): 403-431.
- \_\_\_\_\_. "Encyclopedia, Polymaths, and Tao-Hsueh Confucians: Preliminary Reflec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ang Ju-Yu."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no.22 (1990-1992): 89-108.
- \_\_\_\_\_.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üeh." *Philosophy East & West* 42, no.3 (July 1992): 455-474.
- \_\_\_\_\_. "The Uses of Neo-Confucianism, Revisited: A Reply to Professor de Ba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 no.1 (January 1994): 135-142.
- \_\_\_\_\_. "One Significant Rise In Chu-Ko Liang's Popularity: An Impact of the 1127 Jurchen Conquest." *Chinese Studies* 14, no.2 (December 1996): 1-34.
- \_\_\_\_\_. "Zhu Xi's Prayers to the Spirit of Confucius and Claim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Way." *Philosophy East & West* 54, no.4 (October 2004): 489-513.